

郭树清省长高度重视史志工作

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去年以来先后8次对史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史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彰显了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史志事业发展。

2014年6月5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郭树清省长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编史修志是传承文明、垂鉴后世的事业，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齐鲁文化魅力，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全省广大史志工作者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方志文献，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希望你们发扬成绩，改革创新，编修更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搞好史志成果普及和史志资源开发利用，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修志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史志事业作为重要职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不断推进全省史志工作跨上新的台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去年郭树清省长连续作出重要批示，对省史志办提出明确要求。9月29日，郭树清在《文化部简报》上批示：“全省各地都应参考借鉴临沂、烟台的经验，搞好红色文化的普查和整理工作，这既是精神财富，也是物质财富。对其他历史文化遗址、旧址、纪念地也要高度重视，不能停留在议论上，要有计划、规划和工作部署。”

2015年1月27日，郭树清省长在省十二届四次人代会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把挖掘和利用好丰富的齐鲁文化资源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在12600余字的工作报告中，这部分内容用了1800多字，科学阐释了齐鲁文化的丰富内涵，并对下步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尤其是明确提出了“推进第二轮地方志编修”、“举办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等有关史志工作的内容。

郭树清还特别将史志工作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全省科学发展的大局统筹考虑，赋予史志工作新的内涵，为史志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4年12月28日，郭树清批示：“临沂的做法应推广到其他市县。抗战以后，山东境内有多片根据地，每个地方都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宣传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可以形成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请各地党委、政府、党校、党史、史志、文化、旅游、教育等部门重视起来，组织行动起来。”2015年2月8日，郭树清省长在审阅省史志办呈报的《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安排》，作出重要批示：“史志工作对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具有重要意义。去年十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山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利用丰富的齐鲁文化资源，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很关键的要求。你们有巨大的舞台，能演出什么样的活剧来，就要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态度、能力和韧性了。”对史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



2015 · 03, 2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陈光在山东敌后（下） 武清禄 04

【峥嵘岁月】

跳圈 王六生 10

回忆沂蒙山区回民警卫连 麻 俊 15

红色的电波 武清忠 18

【名人素描】

玉碎沂蒙之一：常恩多 高 雷 21

大智若愚的刘宋开国宰相徐羨之 王真慧 27

【文化掇英】

颜之推：一部家训导万世 酒量犹豪人渐枯 33

【探索发现】

臧克家为刘鸣銮烈士题字始末 高 军 39

抗战文物之一——

朱瑞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高 昂 44

【蒙山沂水】

“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三）

李 泮 45

【史料辑存】

王小古年谱（续） 刘瑞轩 50

【影像沂蒙】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巾幗铁流（三）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54

【诗画赏析】

- 抗战歌曲选——《纪念常故师长》 本 编 56
孙仲阳石阙铭 大荒堂主 57

【文史论坛】

- 王汝涛先生与琅琊文化研究补述 薛宁东 58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下） 赵丹峰 65

【沂蒙名医】

- 挺立在国际讲坛的沂蒙脊梁
——注目吉立新 刘凤才 70

【沂蒙乡亲】

- 付华廷：缔造“龙江第一村” 史宗河 76

【史志动态】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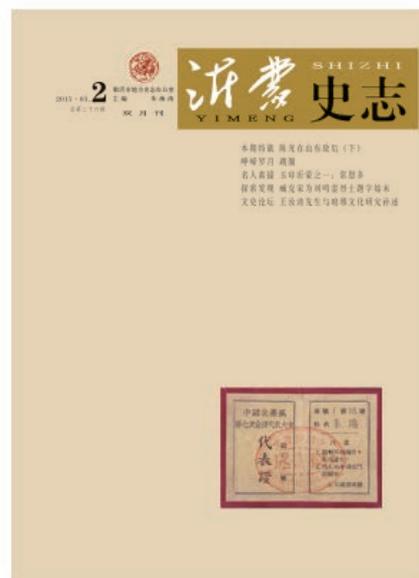
封面：朱瑞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朱瑞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封底：“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

祸之所由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夙绝之。”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陈光在山东敌后 (下)

武清禄



陈光在广阳战斗中观察日军动向

夺取沂蒙山区反“扫荡”的胜利

青纱帐已倒，敌占城市及周围据点开始增兵，并且调动频繁。1941年11月初，日伪军5万余人，在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下，开始向山东根据地中心之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妄图把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沂蒙地区的武装部队全部围歼。11月3日夜，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山东分局、战工会等机关，转移到沂水以南之留田村一带。这时，陈光回到师司令部。他回机关后，就和罗荣桓一起了解敌情，参与反“扫荡”的指挥。

11月4日拂晓，师司令部与山东纵队司令部的电话联系突然中断。10时左右，得知驻在马牧池的山东纵队司令部遭敌长途奔袭，详细情况不明。此时，敌人已经从北、西、南三面将留田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圈。罗荣桓、陈光不时地到挂满地图的

作战室了解敌人进攻的情况，并考虑我军应采取的对策。5日早晨，已清楚地听到敌人继续进攻及我警卫部队阻击敌人的枪声，情况愈来愈严重。中午，敌人已逼近留田村，师司令部于12时转移到了距留田东南五里路的牛家沟。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上来，只在东南留着一个缺口，显然是有险恶的阴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师首长一致决定黄昏后突围。但是，向哪个方向突围？突围后又向何处去？陈光考虑向南——临沂方向突围，以威胁敌人的大本营临沂。这一点，他和罗荣桓意见是一致的。关于突围后的去向，陈光主要从师直属队、山东分局机关的安全考虑，主张在靠近临沂兵力薄弱处向东，越过沂河和沭河转入滨海区。罗荣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从“敌进我进”的原则出发，不仅考虑到直属机关的安全，更重要的考虑到有利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提出向南突围成功后向西，穿过临（沂）蒙（阴）公路，转向合围之敌的侧后。敌合围扑空后，必然重新调整部署，这样，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变被动为主动。陈光及其他首长都同意罗荣桓的这一决策。

天黑了，四周敌人的枪声已经停止。敌人已构成了三道封锁线，在密布的警戒哨上点起了堆堆大火，我机关部队2000多人，分别在驻地村边集合，于晚7点多钟出发，罗荣桓亲率警卫连走到最前边，陈光走在司令部的前面。部队在敌警戒哨只有三里多路的间隙里，快步行走，首先经过张庄，又经过高里，一夜之间，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拂晓前，安全地突出重围，顺利地穿过了临（沂）蒙（阴）公路，到达了公路西侧的汪沟一带，按预定计划，机关、部队在此隐蔽休息。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尘土飞扬，敌人万没想到我军已安然地穿插到它的后侧。

敌人合围扑空后，寻找我军行迹，以重新组织合围。17日，敌人似乎发现了我军指挥机关，遂组织兵力向大古台合围。罗荣桓、陈光分析了这一情况后，决定趁敌人合围之际再东越临（沂）蒙（阴）公路插到沂蒙根据地中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黄昏后，部队从大古台出发，拂晓时，天起了大雾。部队迅速安全地穿过了公路，于18日上午转移到李家峪，回到了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敌人的合围又扑空了。

我军粉碎了敌人第一阶段的合围阴谋。于是，敌人改集中合围为“分区拉网合围”战术，并在根据地中心增设据点，实行分割以限制和破坏我军的行动。从11月25日到28日，师直特务营连续数次阻击敌人进攻，掩护师部机关和直属队安全转移。11月27日，我军转移到沂南县的柳洪峪、安保庄。拂晓，遭一股敌人的袭击。战斗发生后，罗荣桓亲率警卫连一个排，占领了村西南的山头，阻击敌人进攻，陈光则立即率机关向北转移。这时，敌人已经侵占司令部驻村西南的另一个山头，我师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遭到敌人袭击，队伍发生混乱。罗荣桓、陈光命令参谋人员和各单位领导干部，指挥机关部队转入路边的河沟隐蔽前进。部队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渡过了汶河，转移到常山庄休息待命，再次打破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日军通过“扫荡”，占领了位于垛庄以东的绿云山，并在此设立据点。这里是南沂蒙与北沂蒙联络的要点，敌人设立据点，卡断了南北沂蒙的联络。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工事尚未构成之际，消灭这股敌人，并确定陈光具体指挥这次战斗。28日，我特务营将600多名敌人围困在绿云山附近，激战一日，敌人多次突围均未得逞。是日下午，山东纵队二旅又调来一个营配合特务营歼敌。黄昏后，各突击部队充分发扬了我军夜战的特长，经过激烈战斗和反复地争夺，歼灭了大部敌人，缴获了部分武器和物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以及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12月初，罗荣桓由骑兵通信排护送到北沂蒙山区，向山东纵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师直属队由陈光率领，又转回南沂蒙费县的北部地区。师司令部驻在费县北部的大沟，这是背靠五彩山的一个小村庄。3日拂晓，敌人合击部队攻入村头，陈光听到枪声后，迅速率领部分人员突围，与萧华主任率领的政治部机关人员汇合向西转移，脱离了危险。敌人第二阶段的分区拉网合围“扫荡”计划亦遭破产。嗣后，陈光率领师直属部队转移到天宝山区，中旬

以后，向滨海地区转移。由于敌人对滨海地区的“扫荡”尚未结束，我师直属机关在白山一带进行了一周的休整，初步总结了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当时，机关中少数同志反映：如果留田突围后，我们不在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不转入内线，就不会有损失了。陈光对罗荣桓确定的“敌进我进”的原则以及反“扫荡”战役的决心和决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以战斗实践证明我军转入内线坚持斗争的重大意义。根据多次胜利突围的成功经验以及大青山遭敌袭击的教训，他明确指出：情况不明及对敌情判断的错误，是我们吃亏的根本原因。使大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坚定了信心。

沂蒙人民在罗荣桓、陈光指挥下，经过50多天的极其艰苦的斗争，粉碎了5万余敌伪军的“扫荡”，谱写了一曲胜利的凯歌。

渡过最艰苦的1942年

1942年，是山东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陈光和师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在一起，继续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打击、消灭敌人，巩固根据地，坚持山东抗战而辛勤地工作。

3月底，师司令部转移到临沭县的朱樊，开始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陈光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他和罗荣桓一起回顾了一一五师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一致认为，发动群众，应从开展减租减息、改善人民负担、提高和发展生产着手，这样，基本群众才能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恰在这时，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由苏北来到朱樊，住在师司令部，帮助解决山东分局工作中的问题。陈光详尽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肯定了山东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了领导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光参加会议听取报告，并且摘要作了记录。会后，又要我把记录抄送给他看。按照过去的习惯，电报、文件送他阅后，由我保存。这次，他接过记录本，翻了几页后说：“放在我这里吧！以后我还要常看一看，很重要啊，解决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脸上显露出了愉快、兴奋的表情。

4月中旬，在刘少奇帮助下，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过去4年的工作，找出了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战斗任务，使山东出现了新的转机。分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山东各根据地陆续展开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陈光很关注运动的开展情况，他要我把《大众日报》有关减租减息运动的报道收集起来交给他。当他看到贫雇农分得了胜利果实，庆祝胜利的消息时，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好！”

入夏以后，由于天气干旱，师直属队驻地的临沭、莒南等县，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密集的飞蝗遮住了太阳，所过之处，玉米、谷子等禾苗被吃得精光。罗荣桓、陈光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指示师直机关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帮助群众开展灭蝗斗争，白天用网、盆等工具捕捉，晚上点起火堆扑杀。经过军民奋战，减轻了灾害的损失。

陈光富有远见，不仅关心当前的形势和斗争，而且关心未来的形势和斗争。一天早饭后，他交给我一份文件，说：“这是写给新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信中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也分析了今后的形势和任务，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不仅对新四军，对我们同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你抄一份我们存阅。”我随手接过一看，原来是刘少奇写给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赖（传珠）诸同志的一封长信。我用心地抄完了，又仔细地校对了两遍，然后将原信及抄件一块送给了陈光。他说：“少奇同志很关心我们一一五师，原信我们还要退还少奇同志，抄的这份留在我这里吧。”以后，他把这封信随身带着一直到了延安。

7月7日，教导二旅和地方党委确定在赣榆县马鞍山举行抗日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陈光怀着对革命先烈深切悼念的心情前往参加。8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民众公祭。主祭人宣读了沉痛的祭文之后，陈光致悼词，他面对着烈士塔，悲痛而庄重地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是最先进、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你们为民族、为党、为国家而牺牲，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坎里。”

从1941年春季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采取“蚕食”政策，向抗日根据地边沿区推进。到下半年，滨海根据地只剩下临沭、莒南等县的小块地区。我师直属队也就只能在这一地区的朱樊、夏庄、东盘一带转来转去，物质生活也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陈光、罗荣桓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鼓舞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军事上，加强边沿区、游击区的工作，利用小分队及地方游击队反“蚕食”、反封锁；在组织上，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加强连队，减轻人民负担，精简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充实了战斗部队。同时，提出了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开荒、种菜、搞运输。进行节约一粒米的教育，扎扎实实地开展节约粮食、被服、灯油、办公用纸等各种物资活动。罗荣桓、陈光还带头节约衣服、鞋子，与战士同甘共苦。

入冬后，陈光身体状况逐渐转坏。罗荣桓多次劝他到后方休养。11月，敌情较缓和，他带特务营一个排到后方兵工厂所在地临沭胡子村休养了半个月。身体状况好转后，他又投入了战斗。

早在8月初，驻在滨海甲子山地区的东北军一一一师2000余人，在师长常恩多和政务处长郭维城率领下脱离国民党军建制，参加了八路军。但该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却坚持反动立场，抢占了甲子山区，和我军打了个两进两出。12月，罗荣桓政委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发起第三次甲子山战役，并决定由陈光具体组织指挥。当时，抗大一分校驻在滨海北部的莒县桑园，担任对孙焕彩部的警戒。陈光来到抗大一分校后，顾不上休息，就带着参谋人员，步行20多里，登上抗大前沿警戒哨位。他蹲在工事里，趴在隐蔽物的后边，从不同的方向，用望远镜详细观察敌人师部石场驻地，以及周围的地形、地物、道路。山头上阵阵寒风吹来，陈光毫不觉冷，从这边走到那边，从这个工事跳到那个工事。跟随他的参谋细心准确地绘制了观察到的地形、地物图，标记了敌人的防守设施、警戒位置等。回来的路上，陈光边走边说：“通过这次侦察，看来还是要先攻石场，中心开花。”

12月17日战役开始，各纵队利用黄昏后的夜幕向进攻地点开进，于12时进入指挥阵地——赵家土山村西北的高地。大家站在这个高地了望、观察，等待着信号。凌晨3点，甲子山上点起了三堆大火，这是迂回纵队已占领阵地，顽军退路已被切断的信号。陈光及在指挥阵地上的同志们望着三堆大火，分享着初胜的喜悦。又过了两个小时，天空又升起三枚信号弹，说明左纵队已攻占址坊。这时，陈光以及指挥所的全体同志都在焦虑地等待着右纵队的消息。直到天亮，才接到右纵队的报告，原来部队出发时，由于天黑，向导带错了路，拂晓前，赶到了进攻地点，一看原来是朱芦，再转回石场时，天已大亮了，结果失去了进攻的机会，使整个战役未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陈光决定由右纵队白天强攻石场。但进攻石场的通道上有顽军的一个火力很强的碉堡，必须首先夺取这个碉堡。强攻碉堡的任务交给了教导五旅十三团特务连。进攻的时间到了，平射炮射出了仅有的三发炮弹，虽然命中目标，但未能摧毁敌人钢筋水泥工事。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勇士们一个个倒下去，第一次进攻未能奏效。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也未能成功。陈光遂改变部署，对石场顽军采取了紧缩围困，逼其突围的战术。敌被围一周后，于28日夜间向东突围，我军追歼其大部，俘虏千余人，全部收复了甲子山区。战役结束后，又对收容的顽军家属、子女，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对伤者给予治疗，之后，发给路费优待费，送回该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为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1943年1月中旬，师部又命令教导二旅在滨海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郯城战役，迅速扫清外围据点，一举攻克了郯城。陈光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次战役。



1942年7月7日，山东滨海举行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后排左三为罗荣桓，左五为陈光

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陈光不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同志们都说他看起来很严肃，有时还发脾气，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关心干部、战士，自己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讲话实际，处理问题果断。

陈光大部分时间是下部队，不大坐在机关里。除一般的调查情况，检查、帮助工作外，凡有大的战役战斗行动，或领受了重大任务，他都要到部队去帮助指挥和组织实施，以保证任务的完成。他关心部队，关心干部，关心战士，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把部队的吃饭、穿衣放在心上。在紧张的反“扫荡”中，他亲自抓粮食的筹集。在部队紧张整训时，他指挥部队讲战术，尽量减少伤亡，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支持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对部队加强政治教育，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师司令部机关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更亲身感受到他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和爱护。勤务员王秉强是个很聪明的小鬼，工作做的不

错，陈光就帮助他学习政治、学文化。为了更好地培养他，陈光还向组织提议，调他到作战科任测绘员，使他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警卫班的警卫员，都是经过保卫部严格审查选调的优秀班长或战士，但他们文化水平都比较低，陈光就让我担任业余文化教员，给他们上文化课。他说：“党中央号召干部、战士学文化，这很重要呀！这也算是我给你的一项工作，要备好课，上好课。”我在他身边工作，除工作上经常得到指教外，他还让我参加高级学习小组，同他们一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联系我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帮助我理解学习内容。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也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既反对了右的错误，也反对了‘左’的错误，才使我们党沿着正确的路线、方向发展到今天。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经验。”1942年，在动员整风学习后，他帮助我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产生的根源，研究克服的办法。他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区别，不要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做无产阶级的东西而保留下来。”这些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整理、抄录电文材料，有时要在陈光的房子里进行，到开饭的时间，他总招呼勤务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让我留在他那里吃饭。开始，我实在不好意思，但也无法推辞。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谈工作。他说：“军队工作，一定要有时间观念。时间很重要，一定要抓紧，不能误了时间。”后来勤务员每当开饭时看到我在那里工作，不再等打招呼，就主动多打一个人的饭。1941年6月的一天早饭后，警卫员从陈光屋里出来对我说：“首长找你。”我带着笔记本、钢笔去了。一进屋，陈光却从床铺上拿起了一套黄绿色的新军装，对我说：“这是五旅给我送来的，我已有了，送给你穿吧！”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些事，只要他决定了的就从不改变，我只好领下来。1940年12月，师司令部驻在费县北部的聂家庄。当时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保证我军夜间行动，地方上开展了打狗运动。管理科的同志知道陈光爱吃狗肉，给他送来了一条狗。他亲自动手烹饪。狗肉烧好后，司令部的几位科长、参谋都到了，围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一边说笑，就像是一家人过节一样。每当夏天和秋天，地方政府送些水果来，他和罗荣桓一样，从不自己食用，而是用来招待客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陈光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开会不迟到，办事不拖拉、不马虎。他对下级要求很严格，对于完不成任务的失职行为，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他都不能容忍。他生活艰苦朴素，经常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要严格按供给标准办事，不能超过。师首长的小灶伙食，通常只是一两个菜，一个汤，与大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比大灶油稍多一点，细粮多一点罢了。在环境困难时，他也常吃粗粮。1941年秋天，党中央发来了一份不寻常的电报：为保证陈（光）罗（荣桓）身体健康，特决定，每月各发给两只鸡的实物补助。我高兴地转告了管理科照办。过了几天，罗荣桓和陈光又亲自把管理科的同志找去，交代说：“这是中央对我们部队的关怀，我们小灶生活已经不错了。现在大家都困难，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多照顾我们。”

1943年3月，陈光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部队到延安学习。临行前，他看望了机关的干部、战士，还找一些同志进行交谈，征求意见。同志们也都依依不舍，请求他作指示。临行的前两天，我怀着惜别之情，到他屋里，请求他最后给我指导。陈光和我谈了很多，最后他对我说：“今后要多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虚心学习基层工作经验，工作要讲实际效果。”他临行前的宝贵教诲，至今仍时时响在我的耳边，鼓舞着我不断前进。

跳圈

王六生

1942年8月。

鲁南山区，大片大片的庄稼冒着抗战的激烈炮火硬地长起来了。放眼望去，到处涌动着绿色的波浪。

漫山遍野的高粱，秆壮叶茂，正在吐穗扬花，风吹叶子，沙沙作响，犹如千军万马在磨刀擦枪。

“风在吼，马在叫……青纱帐里，抗日健儿逞英豪……”的歌声不断从青纱帐里传来。我抗日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正抓紧杀敌的大好时光，拔据点，断公路，炸桥梁，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日军如坐针毡，惊恐万状，挥舞着血淋淋的东洋刀，一次又一次的向我根据地军民扫荡过来，疯狂的进行分割、“蚕食”、“围剿”，妄图一点一点地将我根据地彻底搞掉。

对于我们边联支队，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恨不得一口吃掉。

边联支队，是在1941年5月，由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二营部分红军主力在峰县扩编而成的峰县支队，同地方抗日民主人士万春圃的临费峰滕边联支队合编而成的。合编后，沿用的还是临费峰滕边联支队番号，简称边联支队。八月，边联支队又同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合编，对内叫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对外仍称边联支队。年底，进行精简整编，减少到千余人，下辖一、二、三、四大队和特务连，轮训队以及由部分编余干部组成的武工队。万春圃为支队长，曾明桃任支队政委，宋鲁泉、贾跃祥任副支队长，我任支队参谋长。我们这



日本鬼子出兵扫荡

支队长年活动在鲁南的临沂以西、滕县以东、费县以南和徐州东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共同抗日，组织和发展了一批批抗日武装力量，开辟和建立了一个个抗日根据地，打了不少胜仗。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经常挂在嘴上：“北有三老团，南有老五团，杀敌显神威，鬼子心胆寒。”

当时，我们支队部带着特务连就住在鲁南边联县的李庄。轮训队驻唐家庄，在支队部的东面，相距五里。一大队和武工队驻石城崮一带，在支队部的南面，相距30多里路。二大队驻王庄，也在支队部南面，距离较近，只有四五里。三大队驻保和庄，在支队部的东北面，距离较远，约有50多里路。

我们驻地的四周，由东往南再往西，这三面的鬼子和伪军在临沂、卞庄、兰陵、峯县、枣庄等地修筑了一个个森严的炮楼，建立了一个个坚固的据点。北面，驻在九女山一带的国民党五十一军和驻在天井汪一带的国民党五十七军，虽然没有公开打出旗号投降敌人，却是袖手旁观，消极抗日，坐收渔人之利。

就是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我们不但没有被敌人吃掉，而且还搅得他们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尤其令他们不能容忍的是，竟在这前不久的七月里，我们还稳妥周详的接待和安置了前来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少奇同志，并且又安全顺利的将少奇同志护送到临城地区。

日军要再次对我们下毒手了！这自然是在预料之中的事。

8月15日上午九时。从临沂集结到卞庄的500多日军和600多伪军出动了。敌人兵分两路，第一路600多人从东面直接向我支队部驻地方向进攻；第二路500多人则先绕到南边隐蔽，然后向西经向城、城前、城后、安庄，向我支队部驻地西面的埭阳以北地区进攻。两路敌人从东、南两面向西压来，对我形成了一个较大范围的包围圈。

卞庄在我们支队部的东南方向，相距有60里。

烈日当空。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路旁的庄稼卷曲了叶子。日军的太阳旗高高地挑着，如同张开的血盆大口。日军头目骑着大洋马，挎着东洋刀，耀武扬威的走在队伍中间。马匹驮着火炮，紧紧尾随其后。步行的日军，快速搜索着前进。

第一路日伪军，出卞庄后，取道贾庄、尚庄、段家庄，邢家村一线，从东面向我支队部驻地直插而来。

上午十时，四大队通信员到支队部送完信，往回返，路过尚庄。这时，第一路日伪军已经路过贾庄，来到了尚庄。通信员趁敌不备，迅速溜进村头土地庙，钻到神像后边躲藏起来，直到日军过去后才得以脱身。

下午四点多，第一路日伪军进到邢家村。这里距离唐家庄、李村和王庄都已经不远了。

此刻，从卞庄出发的第二路日伪军已在南面隐蔽多时，准备经向城、城前、城后、安庄、葛庄，向埭阳以北进攻了。

这样看来，两路敌人进攻的目标，主要是我们支队部。日军和伪军合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支队部再加上特务连、轮训队总共也不超过300人。寡不敌众，必须设法赶快转移出去。

我们支队的几个领导马上集合起来，研究如何转移的方案。起初，大家考虑，以前我们部队经常在西边的抱犊崮一带转移，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想把部队转移到那里去。可是，又通过分析认为，我们过去虽然常在那里转移，但现在那里的情况有何变化却没有任何报告，心里没有多少底数。如果把部队带到那里，一旦遇上敌情，就不好处理，要处于被动地位；再从敌人进攻的意图看，敌人兵分两路从东面和南面袭来，是想形成一条布袋似的包围圈，妄图把我们从驻地压倒西边，然后在那里实行合击，把我们装进布袋里一口吃掉。正确的部署应当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敌

我边沿地区去，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粉碎敌人的合击。

决心下定后，我立即同作战股长李中杰把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党小组长、班长以上的骨干召集起来，详细介绍敌情，说明转移地点，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提出注意事项，并且特别强调了转移时如何隐蔽和如何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要求他们当好骨干，带好头，保证这次转移的顺利进行。接着，我又集合了机关和直属分队进行了转移动员。

下午五时，进到邢家村的第一路日伪军，首先向我唐家庄轮训队发起了炮击。轮训队队长马少先、政委赵洪壁立即命令大家进入战斗，抗击敌人。

天已黄昏。敌人停止了炮击，开始向唐家庄运动。

夜幕渐渐降落下来，天空中出现了几颗稀疏的星星。

好！转移的时机到了！

支队部首先命令二大队杨大队长和司中峰政委带领全大队人马跳到南面石城崮附近活动，见机消灭敌人。支队部机关则带着特务连、轮训队三百余人，向东南方向经四后峪进到城前城后北面的山口隐蔽。

转移在悄悄的按计划进行。干部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快速前进。

“有坑，小心！”“拐弯，注意跟上！”偶尔传来几声极低的耳语。

夜，格外迷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四周的群山，影影绰绰。草丛里，夏虫唧唧鸣叫。坑洼处，蛙鼓声声悦耳。微风吹来，满山遍野的高粱叶子沙沙作响，从湿气中透出几丝凉意，几分馨香，沁人肺腑，令人陶醉。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美丽、幽深、旷远和神秘。美丽的夜景触动了干部战士年轻的心，大家联想着入夏以来在青纱帐里英勇杀敌的动人情景。会唱歌的，真想放声唱一唱；会作画的，真想泼墨画一画；会作诗的，真想挥笔写一写。可是，眼下不行，我们正被敌人包围合击，我们的任务是迅速转移。这一切，只好放到战争胜利以后去做了。

我们支队部带着特务连、轮训队，很快撤出驻地后，先经过四后峪，接着进到城前城后北面的山口。

大约夜里11点左右，前面的侦查员报告，发现第二路日伪军正从城前城后的南面由东往西去。

我们立即吩咐侦查员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传令后面的支队部机关、特务连和轮训队，在山口里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假如敌人向北进入山口，我们就用小部队掩护，其他部队向东和向南转移。

但是，敌人并没有向北进入山口，而是顺路一直向西去了，继续经城前城后村南、安庄、葛村，向埠阳以北进发。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两路敌人妄图把我们驻地压到西边共同加以合击的意图，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判断和转移的正确。

天明，我们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大家，并高兴地说：“同志们，敌人西去了，我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走啊！咱们再返回四后峪做饭吃！”大家一听，都乐的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指挥得好！指挥得好！鬼子是合击不到我们的，让它们到西面扑空去吧！”

这天夜里，第一路日伪军趁着夜黑，偷袭到唐家庄，见轮训队已经撤出，村里到处空空如也，好不恼火。

接着，他们又追到西面的李村、大泉、下村等。没有料到，又扑了空。于是，兽性大发，对这些村子以及附近的一些村子进行了疯狂地“扫荡”，又抓人，又抢东西，所到之处，哭声四起，遍地狼烟。

16日上午十时。支队部卫生员小宋到军区后方医院送伤员回来，要经下村回支队部。刚进下村村头，看见几个日军正在跑着抓鸡。他意识到往外跑是来不及了，趁敌

人没有发现，就非常机警地爬到身边的一棵大树上，在一枝绿荫较厚的树杈上隐蔽起来。

上午12时，两路敌人在下村一带会合。

“你的，巴格牙鲁！”

“你的，巴格牙鲁！”

两路敌人都因扑了空互相埋怨着，叽哩哇啦，骂声不绝。

下午四时，他们都返回到王庄集结。

此时，我们支队部带领特务连、轮训队早已重返回了四后峪，正在那里一边隐蔽休息，一边搞饭吃。我们是天明以后从山口里往回转移的。天明前，支队部几个领导经研究认为，我们虽然钻出了敌人的布口袋，跳出了包围圈，进行了安全转移，但是，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更好的保存自己。于是我们决定再返回去，绕到敌人侧面，能打就打他一下，不能打也要骚扰他一下，反正不能让这两路敌人这么便宜着回去。天明以后，我们把这一想法告诉大家，同志们马上来了精神。尽管一夜未睡好觉，身体非常疲劳，转移却进行得非常顺利，也很迅速。

四后峪就在王庄的东面，中间隔着阎王鼻子山。虽说有十余里山路，但是距离很近，实际上，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我爬上阎王鼻子山顶，找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然后，举起望远镜朝王庄瞭望。发现这两路会合的1000多日伪军，已得知我们转移到了四后峪，又立即分成南、中、北三路，向我合击而来。南路、由王庄往南返，然后再掉头向东；中路，由王庄向东经四后峪，直插南北漫子一带；北路，又对我形成了一个较大范围的包围圈。

我马上下山回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大家。

同志们立时警觉起来，听候命令。

我们当即决定，首先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敌人的侧面。然后，再根据其情况，设法在天黑之前寻机打它一下。

下午五点，我们带部队火速离开四后峪，经过唐家庄，来到车辆以西的山岭上，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在转移中

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稍停片刻，再进到李村南面的牡丹池一带，从侧面尾随敌人前进。

太阳落下山去，西天一片彩霞，进入黄昏时分。

近了，近了，眼看就要追到北路敌人的后尾。然而，敌人全然没有发觉。

“打！”一声令下，步枪、机枪、长枪、短枪，一起向敌人打去。

接着，便有队尾的十多个日军惨叫着倒下，有好几匹驮炮的洋马也嘶鸣着血卧路旁。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日军万万没有想到。枪炮一响，晕头转向，哇哇乱叫，一时慌了手脚。

“八路的有！”“八路的，有！”一个留着人丹胡子的日军军官挥起东洋刀，声嘶力竭地大声呵斥着。前面的日军方才渐渐镇静下来，呀呀地跑步占领了周围的山头，架起机枪，安上八八式手炮，毫无目标的反击起来。

此时，天已昏黑下来。我们早已转进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溜之乎也。只听见风吹高粱叶，一片沙沙沙。

夜幕笼罩下来，三路敌人慌慌忙忙的赶到南北漫子龟缩起来。

我们则兴高采烈地来到离敌人20里以外的许山套一带安然地宿营休息。

17日一早，敌人垂头丧气地分做两路，一边“扫荡”，一边撤退，向东开去。来到迷龙汪时，又遭到我四大队一顿好打，只好狼狈地匆匆撤回了据点。

紧张的战斗结束了。我们支队部和特务连、轮训队，虽然只有300来人，三天来经过巧妙周旋，不但粉碎了1000多日伪军合击的计划，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锐气，而且没丢一枪一弹，更无一人伤亡。

大家满怀胜利的喜悦，重新回到老地方。

“风在吼，马在叫，……青纱帐里，抗日健儿逞英豪”的歌声，又不断在青纱帐里嘹亮地回荡起来。

回忆沂蒙山区回民警卫连

麻俊

抗日战争初期，沂源、沂水一带活跃着一支八路军的回民连。这个连肩负着警卫山东纵队兵工厂的重任，在1939年“五一”大“扫荡”中，与1000多日寇遭遇，受挫后，不屈不挠，重拉队伍，再度战斗在鲁山之阳、沂河之滨。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不愧为一支名垂青史的回民武装。当时，我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现将它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1938年7月，八路军四支队司令部搞民运工作的李敬渔同志，来到回民聚集的柳枝峪村，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多斯梯（意即自己人）。”回民们围拢上来，高兴地问道：“你是穆斯林？”李敬渔笑着点了点头，阿訇满面喜悦，紧紧握住他的手。八路军进清真寺的喜讯，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沉闷的山村。

在柳枝峪李敬渔经阿訇介绍，首先找到丁文增、马学信、赵琪祥和我，接着又去刘家庄，找到丁光彦、丁光沿（桌堂）、丁毅民，到上流庄，找到沙吉祥、丁中恒等人。此后，他日夜奔波在沂鲁山区的回民居住区，苦口婆心地讲解当前形势，申述我党抗日的主张，反复说明爱党与爱国的关系，号召回民同汉族一道，高举抗日大旗，开展武装斗争。在他的宣传启迪下，穆斯林们懂得了抗战救国的道理，有的主动献枪，有的持枪参加队伍，在短短的几天内，柳枝峪就拉起了一支三十几个人、十五六条枪的回民武装。不久，刘家庄的十几个人也参加进来。队伍拉起来后，就住在柳枝峪的清真寺内，号称“沂蒙回民支队”。后经山纵司令员张经武批准，正式命名为回民连，隶属八路军独立营，连长丁文增，副连长马学忠，我任一排长。一个月后，回民连就到东里店一带活动。12月，李敬渔又从沂水崖庄、上流庄领来40余人，编成一个排，排长沙吉祥。至此，回民连就有七八十个人了。1939年1月，连长丁文增因家庭困难要求回家，大家就一致推选我当连长。盛情难却，我就硬着头皮挑起了这副重担。接着，连队进行调整，于长胜任一排长，马振玲任二排长，丁连营任三排长，马学忠仍任副连长。

1939年3月，独立营编入独立团，回民连被编为山纵司令部直属警卫连，随后奉命到织女洞挑起警卫山纵兵工厂的重任。

山纵兵工厂坐落于大贤山麓织女洞侧，依山傍水，风景幽雅清静。车间设在庙宇僧房中，有百多名工人，还有20多个民工。政委杨兴忠，厂指导员郑香山，厂长孙世铭，兵工建设主任邹国资。这个厂直属山纵司令部领导，主要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和刺刀等武器。

回民连驻织女洞后，李敬渔就与原有的党员李希鸿、丁忠启、刘光发、王树彪及

新发展的于长胜等人商定，建立党支部，李敬渔任支部负责人。党支部建立后，充分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我们初驻牛郎官庄村时，有位姓孙的村长处处设置障碍，要住房，他不给安排，借东西，他不给张罗。副连长马学忠心头火起，把姓孙的村长叫到织女洞训了一顿。没过几天，回民警卫连接到了国民党中庄乡袁乡长的一封信，信上说，你们到牛郎官庄要这要那，孙村长一时没有办到，你们竟无理扣留了他，孙村长虽姓孙，但不是孙悟空，能摇身一变就变出东西来吗？回民连的指战员都很气愤，指导员李敬渔立即复信予以回击。信的大意说，你蛰居中庄乡公所，轻信孙村长的诬告，信口雌黄，破坏团结，希望你能来这里一趟，调查下孙村长是如何破坏抗日的。袁、孙的造谣诽谤被回民警卫连一“榔头”打回去后，不仅他们夹起了尾巴，而且附近村长乡长也老实多了，从此，对兵工厂及回民警卫连再也不敢慢待了。

1939年，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山纵主力在转入外线作战的同时，命令回民连掩护工人避开敌人锋芒，向东撤退。当部队行至绳庄时，两架敌机从头上掠过，连队迅速在一片林中隐蔽下来。飞机过后，又传来阵阵枪声。这时，在前面开路的尖刀班跑回4个人，他们刺刀上带着拼刺的印记，衣襟溅满血污。原来，尖刀班在前后绳庄之间，已与日军短兵相接，他们连刺死了3个鬼子，自身也有伤亡。情况来得突然，打乱了回民警卫连的转移计划。杨政委命令全连强占南山制高点，并带着一二十名战士首先冲了上去。

这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了庄，迫击炮狂轰滥炸，轻重机枪完全封锁了上山的道路，千余日军向回民警卫连扑来，密集的火力将警卫连切成两截。山下的战士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山半腰的战士则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面前，有全部牺牲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集中全力打退了右翼围剿的敌人，迅速撤下山来。

这次遭遇战，回民警卫连伤亡惨重，战士马俊盛、杨仁明、丁忠堂、任照勇、任传友、任照录、丁文平等10余人牺牲。三排长丁连营受伤被俘，被日军绑到桑树上乱刀刺死。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兵工厂政委杨兴忠和指导员郑香山也壮烈牺牲。战斗打响之后，杨兴忠为保住连队，身先士卒，高喊着“冲啊！冲上去就是胜利！”带领着战士勇敢地向山上冲锋，杨兴忠在敌人的火网下倒下了。杨兴忠牺牲之后，郑指导员也负了重伤，他的腿被打折，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黄土，但他仍趴在堰边的一丛桑墩下面，顽强地向敌人开火。战士要背他下来，他使劲地摇着头，大声呼喊着，命令着：“别管我，我掩护你们撤，快撤！”等我们转过几道山堰，仍看到桑墩子从中喷射着愤怒的火焰，最后，他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



大贤山织女洞，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厂旧址

上。

回民警卫连与日军遭遇之后，就与山纵司令部失掉了联系，上流庄的同志在柳枝峪换上便衣回老家了。群众看到回民连遭了失败，都十分心痛。我和马学忠商定，要尽快找到山纵司令部，重建回民警卫连。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蒙阴东指子见到张经武同志，这时，他已知道回民连的受损情况，在对我们进行安慰之后，提出重建回民连的问题。他说：“对不愿归队的，要说服动员，不能强迫，特别要努力扩充新成分，提高军事素质，迅速建立一直拖不垮、打不烂的回民连队。”同时，又派李敬渔来到柳枝峪，一面抚恤烈士家属，一面重建革命队伍。不久，回民连重新建立起来，下设一个排两个班，有16名战士。连队在柳枝峪住了个把月，就到附近的村庄筹集武器，扩收兵员。8月，我们发展到40来人，120余枝枪。在这一带，与我们同时并起的是伊英的所谓“抗日军”，他们也是40多人，但有两挺轻机枪，4支二把匣子，三四十支钢枪。伊英啸聚八十亩，不打日军，专欺负群众，时常以起枪为名，下山勒索民财，奸淫妇女，群众恨之入骨。我们早想端他的窝，只是未瞅准时机，无从下手。就在这时候，回民连被重新编入山纵司令部警卫团。我们在蒋峪向司令部汇报了伊英的情况，司令部也有解决他们的打算，随即制定了作战计划。就在我们进驻张耿的时候，江波的区中队和伊英的“抗日军”已先到一步，张耿区公所分南北两个大院，伊英的“抗日军”住北院，我们住南院。我们协同区中队，夜间包围了北院，下掉岗哨的枪，勒令“抗日军”全部缴械投降。从此，回民连又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10月，沂水城的日军频繁出动，开始秋季大“扫荡”。就在张耿村东锥崮顶一带，回民连、山纵司令部和五十一军等部队，遭到二三千鬼子的围剿。这时候，独立团杜团长与友军取得联系，带领我们占领了锥崮顶。锥崮顶四面悬崖，只有五六条石缝、水道能攀得上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回民连与独立团的三营二连扼守在石崮西面，手榴弹拉开了弦，一双双睁圆的眼睛紧盯着山下。敌人进攻开始了，他们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迫击炮、小钢炮喷着毒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崮顶硝烟弥漫，头顶上的日头也失去了光泽，阵地上开始有伤亡。我们透过烟尘看到山下日军像蠕动的蚁群，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开始了第一次冲锋。当日军距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时候，我和陈连长几乎同时喊出了“打”声，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遍地爆炸，敌尸像谷子个似的倒了一大片。四面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日军溃退下去。我们握紧拳头宣誓般呼喊：“消灭最后一个敌人，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聚集兵力，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结果，只不过是多吃了些子弹和手榴弹。战斗一直进行到三点，他们拉着死尸，有气无力地放几炮，便取道马站、崖庄，灰溜溜地回老家。

锥崮顶战斗之后，山纵司令部决定严惩制造太河惨案的王尚志部。这天，回民连选拔了20余人做向导，随三支队向太河进发，太河是一个大村，驻有王尚志一个营的兵力，他们在街道上布岗设哨。火力交叉，密如蛛网。三支队投入战斗后，迅速切断他们与外面的联系，形成了围歼包剿之势。这时，村内的东南角——也就是敌人火力配备最强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霎时，人嘶马叫，一片混乱。原来，回民连副连长马学忠事先悄悄插进太河，通过清真寺阿訇，确切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带刘光法、公配江等6人，换上便衣，掖着短枪，来到村东南面，隐藏于穆斯林住宅，以鸣枪为号，组织围剿。战斗开始后，我军数倍于敌，里应外合，两面夹击，很快突进街里，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敌兵听到震耳欲聋的杀声，看到眼前明晃晃的刺刀，早已心寒胆战，慌忙涌向村西，狼狈逃窜了。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毙敌145人，俘敌3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1门，长短枪160余支，子弹数万发。

沂蒙山区回民连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在抗日救亡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是回胞的光荣，也是沂蒙山区人民的自豪。

红色的电波

武清忠

抱犊崮阴云密布，狂风怒卷。1942年的鲁南山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局势。一场残酷的斗争正考验着军队，考验着人民。这时，我在鲁南军区政治部新闻电台工作。在敌人分割的敌后，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把国内外的新闻、电讯一字一字地收抄下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

这天，我们刚抄收完一份电讯，忽然听说国民党五十一军和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正从南北两面向我们夹击，军区机关要立刻转移。我们刚把机器收拾好，队长便被首长叫了去。

不一会儿，队长回来了。脚刚跨进门，他就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不随部队一块行动，要坚壁下来，完成一项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同志们一听，急忙围了过去，将信将疑地问道：“坚壁下来？是什么任务？”“是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队长用掩饰不住的兴奋口吻，重重地重复了一句，接着说：“首长说，党中央最近发了指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新华社从后天起连续播发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原来留下我们收抄毛主席的报告！同志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喊道：“没有意见！”

“光没意见还不行，还要把任务完成好。”队长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首长说，整风运动是关系全党全军今后胜利发展的问题。要使这次整风运动取得好的成效，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报告从空中领到手。因此要求我们每天按时收抄延安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绝不能漏掉……”

和我们新闻台一块留下的，还有政治部的几个译电员。“坚壁”的地方是劳山村。它坐落在抱犊崮深处的半山腰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二十几间又小又矮的草房。如果没有袅袅的炊烟，就是走到跟前，你也无法相信这儿会有人家。



来到劳山村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架好了电台。为了一字不漏地收抄毛主席的报告，我们特地把天线架在高高的柿子树的梢头。第三天晚上，新华社从延安开始播发整风文献了。第一篇题目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新华社电台的报务员拍发的电波又清楚，又有节奏，“嘀嘀嗒嗒”，清脆悦耳。我戴着耳机，好像不是在抄报，而是在听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为了快，译电员同志就坐在收报机旁翻译。第一段一译出，就有人小声朗诵起来。

午夜，新华社拍出了休息十分钟的符号。我走出房外，看见一条黑影在一垛矮墙边晃动。我急忙问了一声：“谁？”“是我，同志！”从声音听出是老村长。我走过去，只见他掂着一杆红缨枪。“老村长，你怎么还没睡？”“咱们的民兵都出去了，我给你们电台放哨，你们放心……”啊，原来是这样！我重新回到收报机旁边，感到身上又增加了一股力量，更加安心地工作起来。

也许有人认为，报务员、译电员的工作是单调的、枯燥的，一天到晚跟“嘀嘀嗒嗒”的电波打交道，翻来覆去离不开那几个字码。其实：完全不是那样。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有趣味的：新华社发出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份捷报，最先读到的是我们。现在，在鲁南山区，首先读到毛主席整风报告的，还是我们。每当毛主席的一段讲话译出后，同志们便围在小油灯下，争相阅读。

译报的人手少，报务员同志也翻着译电本帮着翻译。电台队长吕会英同志为了满足同志们阅读整风文献的要求，决定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集体阅读当天抄收的报告。负责读报的，是在文工团当过演员的小孔同志。虽然队长规定每天只读一小时，我们还是常常忘了时间。有时深夜了，小孔仍在琅琅地读个不停。

一天、两天、三天……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交通员跑来跑去，把电稿转送到军区。房东李大娘看我们白天黑夜工作，便自动要求替我们做饭，帮我们挖野菜。开始她不懂我们是干的什么工作，后来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能在空中和延安说话，一天晚上，就悄悄地问我：“孩子，你戴着那两个圆饼饼，真能听到延安说话？”我告诉她：“能，还能听到毛主席的话哩！”她高兴地点点头，打听延安离这儿多远，还要我们代她问毛主席好。

担任取报的交通员老任，好些天没来了。我们都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同志向吕队长提议下山去看看，队长不答应。因为上山之前首长给我们规定了一条纪律：没有上级的通知，任何人不准下山。收的报送不出去，粮食也快吃光了。吕队长说：“从明天起，咱们不再吃煎饼了，喝粥，一定要坚持下去，把整风文献抄收完！”

从这天起，每顿虽然只喝一碗稀饭，可是谁也不泄气。又过了几天，交通员终于来了。他高兴地说：“同志，给你们带来好东西了！”说着打开背包。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几个大字光辉夺目地闪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抄收到的第一份文献，已经油印出来了。同志们人手一册，一下抢光了。

交通员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息：敌人对我中心区的“扫荡”加紧了，山口外的许多村庄安上了据点。因为敌人严密封锁，给养供应困难，我们只能吃些“救国粮”了。所谓“救国粮”，原是从滨海军区运来的牲口饲料，是战士们给它取的名字。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算一回事，就是光吃野菜、嚼树皮、喝山泉水，也要坚持工作。

十几天又过去了。我们抄收完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开始抄收最后的一个文件——《反对党八股》。这天晚上，我戴上耳机，正聚精会神地在耳听手抄，忽然一只干瘦的小手伸到桌面上，小手里握着两个鸡蛋！我抬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房东的小姑娘。她低声地说：“熟的，吃吧！娘说你……”我谛听着从延安拍来的电波，手下记着。那两个鸡蛋在我眼下，像是两颗火热的、跳动的心！虽然晚饭只吃了一碗粥，但心里饱饱的。这时我不能说话，就是能说出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内心的激情啊！

拂晓，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凭经验知道枪声不远。我们跑向报房，准



备拆下电台迅速转移。吕队长正伏在小油灯下，迅速地抄收《反对党八股》。小孔坐在他旁边翻译。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枪声似的。我慌忙说：“情况，有情况！”吕队长没有说话，只是向我摆了一下头，继续工作。我着急地问小孔：“还有多少字？”她头也没抬，说：“这是最后一段。”

这时候，老村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看我们仍在工作，着急地说：“老吕啊！快走！敌人到沟口了！”吕队长没应声。外边又传来激烈的枪声。我们焦急地等了一分钟，吕队长抄到换页码的地方，这才把耳机迅速地取下，套在我的头上，只说了一个字：“抄！”

老村长见我又坐到电台前，他更急了。抓住吕队长的手说：“快转移啊！敌人到沟口啦！民兵正顶在那里呢！”

“村长”，吕队长说，“我们还得一会儿。”

“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老村长哪里懂得，我们如果不抄完这一段，那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啊！吕队长只得对他说：“这是和延安通报，是收毛主席的讲话。”

老村长的脸上猛地紧缩了一下，胡子抖着，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他转身向外跑去，刚跑了一步，又回头说：“你们收，我叫民兵顶住，一定顶住……”说着快步跑出去了。

吕队长从腰里拔出小手枪，向我们说：“你们要坚持抄完，一个字不准漏，我到民兵那里去。抄完后马上向山后转移！”说完，随着老村长直奔枪响的地方。枪声越来越密，流弹从屋顶上呼啸而过。接着传来两声手榴弹的爆炸。看样子敌人真的一分钟也不给我们了。好像新华社的同志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似的，拍发速度也像加快了。几分钟以后，我就全部抄完了。我写下了最后一个字，这才大声说：“好了！快走！”

我们迅速拆下机器，背在身上，在枪声和手榴弹声中，向后山奔去。几天以后，《反对党八股》印出来了，鲁南全区的整风运动热烈地展开了。

作者简介：武清忠，文中身份为鲁南军区政治部新闻电台工作人员。

玉碎沂蒙之一：常恩多

高雷



本文节录于书稿《国民党沂蒙山抗战纪实》第三部分“玉碎沂蒙”，内容叙述的是在沂蒙山区坚持抗战，壮烈殉国的诸多将军的壮烈事迹。为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本刊将择要刊登，敬请方家斧正。

1943年1月27日（古历腊月二十二）在莒南县朱梅村，陆军一一一师常故师长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大会，公祭该师师长常恩多。中共山东分局、第十八集团军山东军区、陆军一一五师，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省战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公祭，广场周围挽幛密布，寒风中，新一一师官兵军容整齐，士气激昂，他们站在会场的中央，军官们举起了右臂，士兵们紧握着钢枪，庄重地宣誓：“我们誓以至诚，贯彻张副司令主张，实现常故师长遗志，团结抗战，杀敌除奸，……收复东北失地，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如有违背，愿受同志指责，纪律制裁，谨誓！”

常恩多，字获三，满族。其子称诞辰为1896年9月3日（农历丙申年七月初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一一师档案为1895年出生，辽宁省海城县三台子村人，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同乡。家贫业农，1901年丧父，1904年丧母，寄读族伯家中。1911年娶妻王氏，后进入海城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执教故里，薪薄难以糊口，儿子的出生给他带来了喜悦，也增添了更大的负担，尤其是大儿子肚子上生疮，流脓成碗，他无钱寻医买药，不得不靠妻子讨些香灰救治，生计逼迫他离开家乡，前往奉天，弃笔从戎，因身体瘦弱，只能补为学兵，1919年他考入黑龙江军官养成所，1922年直奉战起升任事务长。不久保送到东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毕业后任中尉排长。1924年，晋升为上尉连长。直奉再战，他升为营长。郭松龄反张作霖时，常恩多对郭松龄急谋改革东北军政，准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和公正威严、刻苦好学的的生活态度，全倾心地敬仰，所以在火线上他冲锋陷阵最剧烈。

“雪拥榆关马不前，郭军鼓角震西天。白川拂袖非吉兆，终古凄情饮万泉。”郭败之后，由于张汉卿的干预，所属部下免于追究，常躲过一难。1929年常恩多在奉军大校阅中考得第一，深得张汉卿嘉许。1930年常晋升为团长，首先率队入关，《大公报》曾大字刊登沿途军民关系融洽，张汉卿甚为满意。1931年，常恩多驻守张家口，“九·一八事变”发生，消息

传到防地，他马上集合全团官兵，发表了慷慨激昂地宣讲：“我们是东北老百姓拿血汗钱武装起来的队伍，当然有誓死保卫东北的天职！可惜今天我们的中央，因别有用心，以‘不抵抗’限制我们，不能马上予暴日以打击，但我们可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对敌仇恨，应更卧薪尝胆，养精蓄锐，以待杀敌报国机会一旦到来时，应毫不迟疑舍身报国，以答报东北三千万父老对我们的热望。”1932年长城抗战之时，常部卫戍天津，屡次平息日便衣队暴乱，深得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赞许。1933年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成立，张汉卿被迫出国，常恩多深受刺激，他曾说过：“惭愧的很，一生除张汉公而外，没有碰到过第二个上级与自己志同道合的”。

1934年，常恩多受训于中央庐山军官训练团，张汉卿回国后，东北军受命南下武汉剿共，常恩多驻守湖北黄安县，与红四方面军徐海东部对峙一年。他对于放弃民族仇敌而自相残杀的行动十分疑虑，同时使他引为欣幸的是，从那时起开始接触和初步了解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东北军转战西北，数战不利，而晋察形势日非，常恩多极为痛心。本年冬升任东北军主力陆军一一一师少将师长，后晋升中将。为寻求抗日，促成统一战线，他代表官兵公意，向张汉卿秘密提出发动兵谏的建议。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常恩多情绪高涨。率部兼程赶赴渭南，击退了中央军教导总队的进攻，不久张汉卿送蒋委员长回南京，常恩多表示不同意，认为虑祸不周，曾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力主武装救护张汉卿脱险，领导东北军抗日。1937年张汉卿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异常混乱，常恩多十分悲愤。东北军东开河南周口缩编，常恩多意兴索然，一度打算到关外参加义勇军，同僚为了不至于军权落入他人之手，部下已“亡省亡家”，为了不至于流离失所，都百般劝阻，恰好张汉卿自南京捎来手谕，勉励各将领掌握武装，等待抗日，遂打消去意，终于坚持了下来。“七七事变”发生，常恩多率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开赴南通启东一带，任戒严司令，警备森严，曾查扣上海杜月笙违法出口船只，及国特秘密电台。情况紧急时，收容南通爱国青年成立义勇宣传队，及至东战场失利，一一一师转进靖江，截战扬州登陆之日寇后，转移至高邮、宝应一带。

1938年4月徐州会战打响，日寇邱山支队3000人，配属山炮8门，工骑兵一部，其他飞机汽艇等兵种甚多，直扑江苏阜宁，威胁徐州东线。常恩多亲率一旅之众，急援节节败退的韩德勤部，激战通宵，敌渐不支，解救在即，不料韩部三五旅不战而退，溃乱不堪，一一一师任劳任怨，激战月余，坚持在阜宁城郊完成了阻敌前进

的任务。未几，阜宁城就在常部积极作战下宣告克服。苏北盐阜情况紧急时，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再三派专员，携巨款求助常恩多派队保驾，常恩多坚决拒收款项，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是抗日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不同于你们的保安师专为保驾的，给钱才打，我们的士兵只知道为国为民，用不到拿公款做私人人情。”

随着盐阜城地攻克，明光五河一带的激战，这都使敌人、友军、民众认识了有着“扬开多（扬：扬州，开：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字开源，多：常恩多）”臂章的这支部队是“最能打鬼子的”，韩德勤曾屡次称赞：“这部队训练的好，很管用。”

临沂告急，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星夜兼程，血战临沂，受到了战区和五十七军的嘉奖。台儿庄东之东西马店（今属江苏邳州）的战斗更悲壮地写出这个部队的抗战决心。他们一个团单独突出三四十里地，掩护大兵团（汤恩伯军团）撤退，三面都是强大的敌人，后面友军也被切断了联系，然而却支持了十五六天，还主动出击攻陷了敌人的三个据点敌人增援反攻，以绝对的优势和炮火威逼他们时，有一个营高唱着《大刀进行曲》，义无反顾的冲出了战壕，恶战肉搏，日寇反而吓得转身逃跑了，此后再不敢贸然进攻此地，使得一一一师的官兵得以最终撤退下来。此役毙伤日寇2000余人，而该团生还的只有疲惫、伤残的200余官兵，营连排长没有剩下几个，在这之后，敌人竟不敢与这代号的部队对垒，友军中甚至有仿印这代号借用佩戴的，在后方兵站、医院，这代号的战士也特别受尊敬，受优待。

该年秋，常恩多率六六一团突袭徐州并攻入城内，命六六六团埋伏徐州南曹集车站附近阻援，毙敌甚重。

保卫大武汉的外围战，一一一师远驰皖中，其时军中疟疾盛行，官兵有疟疾而不能动作者，十有六七。常恩多也肺炎发作，大病月余，此后已不能剧烈活动，但仍指挥部队，佯攻合肥。年终，苏北告警，五十七军转调苏北，常恩多率部猛袭睢宁，苏北之危得解。

1939年1月一一一师移防鲁南，常恩多驻防莒南县址坊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东北军将领沈鸿烈赶来相会，怂恿常恩多消灭杂牌军，进行反共。被常恩多严词拒绝，常恩多说：“东北军首先是没有了老家的队伍，它过去受了无数屈抑，主要是为了求得团结抗战，在此以后，东北军再不做内战了。”3月，一一一师痛击诸城伪军张步云部，在枳沟击溃其一个旅，粉碎了日伪三路进犯计划，声誉益震。5月日寇集中约两师团兵力，开始对鲁南进行大扫荡。6月9日，南部之敌攻占河阳、坦埠、南麻一线。常恩多指挥第331旅于大店、板泉崖阻敌前进，激战一整天，率部撤往甲子山区。日军紧追不

舍，在甲子山北麓黄墩附近将一一一师一部合围。常恩多命令少校参谋王大伦率第六六六团第二营侦察前进，于黑夜从日军结合部缝隙钻出，安全突围。此后，部队在日莒公路两侧来回活动，多次跳出日军合围圈，拖得日军追击部队疲于奔命。终于在莒县东九里坡丘陵地带设伏成功，毁日军汽车12辆，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日军遗尸百余。本年冬，一一一师六六六团在莒南白家岭袭击临沂进犯的日军，缴获山炮一门，随后日军出动400多人进行报复。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下令袭击这股敌人，不料中了埋伏，六六五团三营两个连伤亡殆尽。缪澄流大为恼火，撤了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的职，由万毅担任旅长一职。万毅原任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上校团长，1938年由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共，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0年春，万毅到职。“顷波（万毅的字），你来了！这真再好也没有了，事前缪某（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曾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连认识你都不敢对他说，因为我晓得，如果我说咱俩个熟识，缪是一定不会叫咱们往一块儿处的。”其实常恩多也于1939年由中共山东分局郭子化介绍入党。同为特别党员，由于分属两个系统，彼此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如此诚恳的倾吐，只是爱国将领惺惺相惜而已。4月，一一一师师部驻扎莒南柳沟，日照碑廓日伪一部，昏夜出发，绕过在附近监视的国军警戒，于拂晓前到达黄山附近，敌情发觉后，师部空虚，只得将新兵营调往黄山前阻敌，常又飞调在碑廓前线警戒的部队回防，逆袭敌人的背后，两边一挤，正好把敌人挤下了山沟，打死了很多洋马，激战至午间，西边大店据点，日军出动增援，很快逼近柳沟，前方部队纷纷告急，常恩多不动声色，仍坚决命令死守两个钟点，至紧急时，师部警卫连也拿上去了，酣战到天黑，黄山前的敌人被歼，大店援敌溃逃，这一仗毙敌百余，缴获山炮一门，机步枪甚多，立下鲁苏战区鲜有的战绩。其他如上河、王庄、安子窝、郭家山、于家山诸役，常部均能斩将夺旗，歼彼顽虏。

1940年9月常恩多因军长缪澄流多次掣肘，密呈上峰，借病恳请长假，做消极去职打算。

9月22日，鲁苏战区五十七军“九·二二”锄奸事件爆发。1940年夏，原五十七军副官长李亚藩卖国求荣，当了汉奸，并策反一一一师三三三旅六六六团一营二连连长王明德、机枪连连长郝继贤率两个连，逃往鬼子据点赣榆县桃林镇。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向缪澄流建议，以全旅兵力解决桃林伪据点，以煞投敌邪风，振作气势。缪没采纳，而试图通过私人关系，商谈要回两个连，息事宁人。密令自己的亲信李光烈到桃林据点与李亚藩联络。商定与日军和谈。9月12日，缪澄流接到日寇

同意的口信后，特派六六五团团董翰卿全权代表自己前往，董翰卿担心口齿不伶俐，要求派人协助。缪当晚找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部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说这事“非有胆有识者不能胜任，非你不可”。于文清慑于淫威，勉强应承。向万毅求教，表示自己不愿干这汉奸的勾当。万毅动员他去充当卧底，以便抓住缪通敌的真凭实据。

9月13日，董翰卿、于文清在李光烈引导下，率第六六五团二营到北琴口以南马家窝铺，与日军二十一师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伪“兴亚建国军”顾问新容幸雄谈判，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纲领，细则待日后商定。

9月18日，于文清返回后，将谈判情况如实告知万毅。19日，万毅找到常恩多汇报。20日清晨，常恩多离开军部，先到第六六二团驻地井家沟，对团长孙焕彩说：“我决心锄奸，你听万旅长的指挥，怎样抓缪澄流，你们研究，但注意不要打死他，留作人证。”他以手指着头部说：“我这个交给你啦！”孙焕彩说：“师长，你放心吧！”常恩多再到第三三三旅旅部和万毅研究锄奸方案。常恩多说：“有情况，你可以指挥孙焕彩，我已对他交待了，得手后，赶快告诉我，我发动全师共同行动。”谈话间，六六六团团刘晋武赶来，坚决表示，不论什么时候，都听师长、旅长的。

21日，缪澄流为从重庆归来的鲁苏战区总部参谋长王静轩等摆宴接风，并请晚上在军部驻地东盘（今属山东临沭）看戏。常、万决定当晚动手。下午，万毅以会餐为名，拘禁了董汉卿，与于文清一起让其交代通敌罪行。随后，万毅部署逮缪事宜。第六六六团三营营长彭景文主动承担解决东盘军部驻地警卫部队任务。适值第一一二师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抽空前来看望老团长万毅。韩主动要求戏台下捉缪。万毅认为，锄奸是正义的，就同意韩的要求。韩要万毅下一命令，便于执行，

“万毫不思索，拔出自来水笔就在便条纸上写：‘缪澄流通敌有据，着即拿获归案法办。万毅，9月21日。’韩拿去手令后，和彭景文商定，彭营包围东盘后，打红、黄、绿3发信号弹，韩营立时配合捉缪。当晚，彭景文营包围了东盘，按约定打了信号弹，突袭警卫队，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不料韩子嘉变了卦，把万毅的手令交给了他的旅长荣子恒，荣又转给缪澄流。缪看后即随荣、韩连夜渡沂河逃去。及至万毅得到消息，命令彭景文追击时，缪澄流一行已无踪影了，逮缪计划落空。

万毅在东盘举事，常恩多在师部也动了手，扣押了缪澄流亲信、知情不报的第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和六六一团团团长关士栋。



常恩多（左）与第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在山东莒南

22日凌晨，常恩多得到万毅的报告：除缪澄流外，朴炳珊以下无一漏网，部队完整，全部归建。常恩多找来秘书王维平，指示起草通电，说：“日期定为9月22日，我们要师出有名得有个由头。”王维平说：“发扬光大当年张学良将军兵谏精神，时值杀敌锄奸，可叫锄奸运动。”常恩多说：“好，就叫‘九·二二锄奸运动’。”

同日，常恩多、万毅领衔向中央及全国发出通电，讲述缪澄流通敌情由与“九·二二锄奸”经过，指出“缪今所行，出卖民族，出卖团体，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影响抗建大业，玷污革命历史，毁灭断送我血拼三年之光荣，似此何以应付非常时期，领导军民？官府出事事小，军民受罪事大，惟冀各级长官、全国同胞、舆论文化各界，共本爱人爱物之心，除此奸邪，以固国本，以倣效尤，而利抗战。”

半夜后，缪澄流自荣子恒旅部给常恩多、万毅发来电报：“常师长、万旅长同鉴：鄙人向敌伪接洽，确有谈判，详询董、于，便得实际，鄙人与两兄患难有年，罪戾之深，愧悔难禁，昨已专电总座，自投请罪，两兄赤心抗战，自能力顾全局，但能使鄙人减少一分罪过者，希两兄竭力为之，鄙人感幸多矣！将来完成抗战，贵部定有无限光荣，鄙人仰首青云，戎马半生，饱尝风味，言出肺腑，特电奉闻，诸希鉴谅。”同时致电蒋介石、于学忠：“万毅被中共策动，马日晚捣毁军部。”

24日，于学忠给第一一师发来电报，对常恩多进行了责备，并称：“据缪军长电报，你师万旅长在东盘闹事，实属不幸，望将事实真相，速即报来。”

接电后，常恩多万分苦恼，于25日发出血泪电，陈辞：“多年关系，一切隐情，早为职及全体官兵所尽知，丑事实不愿出自本军，为抗战计，为全军官兵人格计，实有不能不出此一途者，详情愿为钧座道之：……除文件一二日内整理完竣即派人送呈钧阅，并请派员来师，切实查证，如有荒谬，甘愿断头。静待钧座处理，决不作乱臣贼子，遗臭万年，区区苦衷，天人共鉴”。

30日，于学忠派战区总部参谋处长张熙光、政务处长郭维城（中共秘密党员）等人去一一一师调查，要带走人证，4个团长要求法办缪澄流，再上交人证。最后确定：可以带走朴炳珊、唐君尧等人证，但要分别录供存档。10月上旬，总部带走朴炳珊、唐君尧等人证。郭维城此次与常恩多长谈推心置腹，互相摸清了对方的底牌。

“九·二二锄奸”激起很大波澜。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锄奸情况，中央复电，方针是：“表面中立，实际赞助。”日军谈判未果，恼羞成怒，派飞机撒传单，扔炸

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趁机添乱，诬常恩多“叛变”，要求于学忠下令讨伐，沈又到第五十一军军部找军长牟中珩，要求联名通电，讨伐常恩多。遭到拒绝后，大发脾气。

常恩多决定以军事胜利保证锄奸的政治胜利，在东、西两线发动攻势。西线由万毅指挥，攻克大店，伪区公所和伪区中队起义，接着挥师北向，在多水店子设伏告捷，击毁敌军车3辆，毙敌数十，缴获九二式重机枪1挺。东线由常师长指挥，声威所至，涛雒伪军1个中队起义，击毙日军3名，生俘1名，攻克碑廓，前锋直逼日照城下，军心士气为之大振。

缪澄流是自取其咎还是替人代过，应该不是谜。重庆大本营静默后的第一反应，是解除了常恩多的职务，这也不能说太重的惩罚，因为你有去职的请求嘛。于学忠据理力保，并呈请第五十七军军长遗缺，以霍守义升任，常恩多任副军长兼第一一一师师长，函电交驰，迟迟未定。至11月，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电报称：“该师长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犯上误国之咎，着从轻免于处分。”并以国民党军政部名义命令，撤销第五十七军番号，两师归战区直接指挥。老蒋在这里既做了顺水人情。又达到了排斥异己，取消五十七军番号的目的，其缘由来自常恩多“九·二二”血泪电中：“允予脱离缪之关系，听钧座（于学忠）直接指挥，服从领袖，效忠党国，决不沾染奸奸彩色。”老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国军是各个山头拼凑起来的部队，山头的存在是他们的最高利益。五十七军军部的撤销，严重打击了东北军利益群体，使事情走向了反面。常恩多仗义除奸，不但没得到国民党上层的肯定，反落得里外不是人，似海深冤，无处申辩，郁结于心，导致肺病加重，以致卧床不起。参与“九·二二锄奸”的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团长刘晋武等人权衡利弊，开始与常恩多离心离德，渐行渐远。而“九·二二锄奸”的始作俑者万毅，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一一一师人脉不广，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1941年2月17日，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人劫持了万毅，驱逐了所有在师内工作的进步青年，随后又向于学忠谎称万毅要辞去三三三旅旅长职务，改任一一一师附员。

中共中央对万毅被扣押十分关切。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一）请将常部中我们组织此次遭受破坏详情电告。（二）望设法调查万毅及其他被扣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的下落，并尽力设法营救他们。（三）将常师中还有的组织调查清楚，将已暴露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紧急撤退，并收容他们到我军工作。”

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人的逆举，历时两个月，才传到常恩多耳边，常恩多病魔缠身，尚不足自保，只能忍辱负重。6月孙焕彩制造了诬六六一团中校团附李鸿德事件，常恩多知道后已怒不可遏，勉撑病体，照管全师上尉以上之人事，一一一师各级干部，始稍获保障。

病重之中的常恩多时常以“复土还乡”的话来训示部属，有人提起张汉卿，他都会痛心疾首，有说不尽的苦衷，谁要送些他平素最喜欢吃的高粱米和东北制法的大酱，他会一面吃着一面掉着眼泪说：“东北三千万同胞，在敌人铁蹄下哭泣，急待着盼望我们打回老家去。”

1942年春天，重庆大本营密令就地处决万毅，于学忠派总部王静轩参谋长征求常恩多的意见，常恩多写下了“一生尚存天假我，百年事业待羁臣。”的诗句来称赞万毅，而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万毅的举止，断然反对，他对王参谋长说：“总司令如果一定要这样办，那请先解散百十一师，先杀了我常恩多。”这时，他已病入膏肓。8月1日，军医正式宣布常恩多病危，停止抢救。一一一师陷于惶惑状态。8月2日上午，鲁苏战区总部对万毅进行军法会审，给万毅加上通日本帝国主义、“双十二”事件从犯、“奸党嫌疑”等三条罪状。

2日中午，郭维城去看望常恩多，常已奄奄一息，看见郭维城进屋门便哭起来，只见嘴动，不能出声。接着用手势唤人拿纸和笔来，躺在床上勉强写出了生平最后的35个字：“务要追随郭维成，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

八.二”

当晚，郭维城探望万毅，告诉他，将在常恩多逝世后举事，以实现张学良的主张，届时将派骑兵来接万出去，请求万毅帮助掌握部队。郭走后，万毅考虑，从法官宣布自己的三条“罪状”看，肯定要判死刑，执行就在这几天；而郭维城举事成功概率很小，且兹事体大，并未征求中共山东分局意见，于是，当夜越狱，向中共山东分局报告。

3日，于学忠得知万毅逃脱，向郭查问。郭怕事发，同常恩多商量后，决定提前于当天在址坊举事，3日下午，郭维成按照常恩多的部署，分别把常恩多随从副官刘万胜，工兵营王营长，特务连张排长召来，逐一交代，扣押了陶景奎、刘晋武、政治部主任龚晓清等，孙焕彩去安徽阜阳领弹药未归，逃过一劫。接着，部队就将鲁苏战区于学忠的司令部包围起来，软禁了于学忠，于身边的总部特务团三营（张学良卫队）得知一一一师要走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路线，立即拥护支持一一一师起义。史称“八三事变”。

8月4日早晨，郭维城召见中共地下党员刘祖荫。郭将3日发生的事情简单告诉他，并要求他干三件事：一、起草“八三”起义宣言；二、派人去八路军山东分局请求支援；三、领导学兵队里的进步青年将政治部的人抓起来。

5日，山东分局听取万毅汇报后研究对策，认为事变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性质是正义、进步的，应予支持。但因缺乏群众基础，且反动势力很大，估计部队可能出现混乱。分局决定立即派万毅和曾任一一一师秘书的王维平到该部协助常、郭掌握、稳定部队。

5日夜里，甲子山区下起大雨，5米之外看不见人，于学忠趁机乔装成老百姓，连夜向北逃去。

由于举事仓促，成分复杂，8月6日，一一一师情况发生突变，六六一团和六六五团二营哗变北逃。7日，师部工兵营也跟随叛变，叛变分子释放了被扣押的反动军官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他们立即进行反扑。团长张绍鸾等人英勇牺牲。郭维城率余部2000余人，用轿子抬着常恩多撤离了驻地甲子山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

当日上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率部队赶到坪上镇支援。8月9日凌晨，常恩多师长在莒南县小坊前村病逝。山东分局决定，保留东北军原番号，保留官兵军阶，常恩多秘不发丧，由原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任代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9.22锄奸”是东北军一一一师的转折点，它把常恩多逼上了绝路，也为一一一师赢得了新生。

1943年1月27日常恩多公祭大会在莒南县朱梅村隆重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界人士给与了常恩多极高的评价，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敬献的挽联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出自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挽联是：“杀敌除奸，功在国家，不幸仅免，议处留病体，复何忍看去英才；还乡复土，义尽东北，尤惜未克，竟成遗余恨，只为付托嘱贤良！”山东纵队黎玉、王建安、江华的挽联是：“胜利在望，团结向前，方期共渡危难，杀敌还乡慰父老；懋功既建，壮志未酬，遽因二竖肆虐，坠星滨海恸军民！”中国共产党滨海区工作委员会的挽联是：“敌寇一穷蹙，胜利在望，万期勒马白山，赋歌黑水；苏鲁任奔驰，壮志未酬，遽尔星陨滨海，魂遽碧天！”鲁中区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挽联是：“青史留芳，恨血长碧；横刀含笑，虽死犹生！”

中共山东党政军负责人对常恩多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做出庄重的许诺。万毅在祭文中说：“维中华民国32年1月27日，陆军一一一师代师长万毅，副师长郭维城，参谋长于文清，率全体官兵，谨具全牲之奠，恭祭于常故师长获三公之灵前曰：……毅等愿他年凯旋辽东时，再将我公忠骸，移葬祖茔。届时三军为之缟素，举国为公致哀，毅等更将凭棺一哭，以尽余痛，而慰九泉！呜呼尚飨。”

大智若愚的刘宋开国宰相徐羨之

王真慧

徐羨之，字宗文，东晋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人。其祖父做尚书吏部郎时，徐家显赫一时，人丁兴旺。其父徐祚之曾任上虞（今浙江上虞县）县令。徐羨之出生不满周岁时，父亲病故，家境开始衰落。徐母与儿子羨之相依为命，仅靠丈夫留下的积蓄过活，日子过得很清贫。徐羨之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非凡的气度，他常同小伙伴一起玩耍，大家都乐于听从他的指挥。他勤奋好学，家境贫寒并没有妨碍他涉猎经史。少年时代的徐羨之与众不同，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他精于弈棋和欣赏戏剧，但从深沉的外表观察，他又似乎对这些不太精通。因此，当时世人对他大智若愚的气度十分推崇。如名士傅亮、蔡廓、郑鲜之等人，尤为敬佩他。

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已远近闻名的徐羨之被晋朝廷征辟为太子少傅主簿。后来，北府兵元帅刘牢之请他去担任镇北功曹和尚书祠部郎（主管祭祀的官）。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浙东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东晋政府派北府兵前往镇压。东晋王朝炙手可热的抚军将军桓修任命徐羨之担任抚军中兵曹参军。从此，徐羨之开始官场得意，他凭借自己的气度和志向，一步步进入权力中枢。时人都盛赞他是一个将相之才。名士傅亮、谢晦、郑鲜之曾经与徐羨之置酒聚会，傅亮、谢晦等人才学渊博，议论时局高谈阔论，徐羨之则风度庄重而严肃，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发言，且妙语连珠，令人振聋发聩。此后，郑鲜之常叹息道：“观看徐羨之的言谈举止，我再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结识宋主 初展英才

在桓修的抚军将军府，徐羨之结识了当世的枭雄刘裕。两人同在将军府共事，朝夕共处，彼此有了较多的了解。刘裕遇事当机立断，雷厉风行，走起路来龙行虎步，气宇轩昂。徐羨之发觉此人有帝王之气，远胜其辅助的桓修百倍。加之刘裕待人友善，易于接近，徐羨之便主动与刘裕交往。刘裕也注意到他的这位同事，遇事沉默寡言，但关键之处却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使人豁然开朗，远胜那些唯唯诺诺的士族官僚们有才能，这样的人才对自己成就一番事业会大有裨益。由于相互的敬佩，两人来往日益密切。

东晋末年政局动荡，朝中大权落入大士族桓玄之手。北府兵首领刘牢之在与桓玄的权力斗争中兵败自杀。桓玄为铲除后患，把刘牢之旧部诸将分调各



宋武帝刘裕画像

地。他把北府兵中大将刘裕特意调到堂兄桓修手下，名为重用，实则是加以监视。当时不少心腹劝刘裕起兵反抗桓玄，徐羨之则劝刘裕应广交贤达，静待天时，不可操之过急，以刘裕的威望与才德，一定不会久居人下。

时机很快来临了。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五月，卢循起义，义军由临海郡攻入东阳郡，夺占了州县，东晋朝野震惊。总揽朝政的太尉桓玄派刘裕起兵镇压。

军情紧急，刘裕率所部兵马出发，徐羨之随军出征。行军途中，他对刘裕说：“将军此番出征凶多吉少，不可不先做打算。”刘裕忙问何故。徐羨之答道：“此次征讨卢贼有三不利：其一，桓玄派将军讨伐，实则是借刀杀人，想借卢贼削弱将军的兵力；其二，讨伐大军均为北府兵旧部，同时命各路将军分头出击，也是要借卢贼之手各个削弱；其三，卢贼善于用兵，现已占据有利地形，并把周围州县掠劫一空，将田地庄稼也尽行割去。将军不可高枕无忧啊！此三不利，将军只要处理得当会变成三利。桓玄借刀杀人，将军可借这一时机联合各路将军，团结起来。我愿担当特使去劝说各路兵马，晓之以利害，同舟共济，合力平定卢贼，再共同讨伐桓玄。至于卢贼，其坚壁清野的行为已搅得浙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只要将军联合各路兵马合力攻之，定可凯旋。”

刘裕按徐羨之计极力拉拢受桓玄排挤和迫害的北府兵诸将。他派徐羨之携带密信，前往北府兵大将何无忌、刘毅、孟昶、诸葛长民、刘道规等营中游说，晓之以理，揭穿桓玄的阴谋，并阐明只有各路兵马联合起来，才能保存实力，不致于被桓玄各个铲除。于是各路军马与刘裕合兵一处与卢循交战，连连取胜。卢循兵败，无路可退，只得弃岸逃往海上。

在平定卢循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各路北府兵将领纷纷投靠刘裕，刘裕的实力大增，威振朝野。桓玄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落空，还使刘裕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入讨桓玄 运筹帷幄

事态的发展，正如徐羨之所料，对刘裕已很有利：通过平定卢循起义，北府兵大权已落入刘裕手中，各路将军对桓玄和桓修早就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桓玄由于失去了对北府兵的控制，实力大减，手中只掌握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军队和实力虚弱的西府兵。刘裕已拥有足够实力与桓玄抗衡。不久，他率大军向山阴（今浙江

绍兴)集结休整,各路军马声讨桓玄的呼声日趋高涨,他们共推刘裕做首领,准备讨伐桓玄。因此事关系北府军的生死存亡,刘裕面临着人生又一次重大抉择。一天,他坐帐沉思,愁肠百结:虽然他手握重兵,但若处理不当,也会步刘牢之后尘。此时,刘裕想起了足智多谋、为自己创造现今有利局面的徐羨之。徐羨之也正想为刘裕大军日后何去何从找刘裕商量。两人不谋而合。

刘裕表明自己主张率各路军马并力讨伐桓玄之意。徐羨之剖白形势说:“桓玄窃取宰相之位,独揽朝政,猜忌群臣,手段残忍而又刑罚不公,天下人无不欲杀之而后快,将军应顺承天命,起兵诛之。”刘裕大悦:“太好了,我即日起兵!”徐羨之拦住刘裕:“不可,此时起兵,将军何以诛玄?古人云:欲成大事,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今将军三者不具其一。”徐羨之进一步分析利害:“现在起兵尚无任何借口,师出无名,不能号召各地共同讨伐桓玄,故谓未得天时;其二,大军现驻扎山阴,距建康路途遥远,假如在此地起兵,不能马上威胁桓玄,造不成政治上太大的影响,故谓未得地利;其三,各路将军虽愿与您合兵诛讨桓玄,不过是因为受到桓玄迫害而暂时联盟,并非真心归顺将军,故谓未得人和。我劝将军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积极团结各派将军,树立威望,做到上下齐心。桓玄独揽朝政,据我所料,他势必篡夺大晋江山,将军应静待天时,等桓玄称帝篡位时,以兴复晋室为号召,再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各地必风闻相随,成功则指日可待!”

刘裕听罢,甚觉有理,便连连点头。从此,他依从徐羨之之计,大力拉拢各路将军,日夜操练军马。不久,他亲率大军逐渐向京口移动,以便随时进攻建康。

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自称大将军、楚王。十二月,在建康篡位称帝,国号楚,贬晋安帝于浔阳(今江西九江)。桓玄统治下的楚国朝廷更加腐败,骄奢荒淫。他在建康大兴土木,征发大批民工,大幅度增加赋税,搞得百姓困苦不堪。同时,桓玄游猎无度,夜以继日,所到之处必索要美食特产、美女珍宝,闹得朝野上下劳瘁不堪,怨怒思乱者十有八九。

此时,徐羨之见时机成熟,便向刘裕建议道:“天时已到,将军可大展鸿图。”于是,刘裕向各路兵马下达命令,令大将刘毅、何无忌等率各路人马同时起兵,由京口直攻建康,并四处张贴檄文,号召入京讨逆,各地纷纷响应。桓玄匆忙间率军与北府军交战,一触即溃,不得已,只得挟安帝西逃,后被刘毅诛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等迎安帝还都建康。桓玄之乱,遂告平息。

刘裕大军浩浩荡荡进驻建康,因勤王有功,刘裕被提升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功告成之日,刘裕没有忘记徐羨之的功劳,呈请朝廷任命他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和领军司马,让他仍留在身边。

回避锋芒 以退为进

平定桓玄之乱,复兴晋朝,刘裕首功可鉴。晋安帝欲让他都督中外诸军事,实质是把全国兵权交给刘裕。刘裕非常高兴,准备接受这一任命,手下众将都很高兴。但有一个人反而忧心忡忡,他就是徐羨之。

刘裕明白徐羨之是为自己担忧,但他想不通徐羨之现在还有什么值得如此担忧的。于是他就问徐羨之担忧的缘故。徐羨之闷闷地说:“将军勤王有功,理应受此重任。但你周围还卧着几只猛虎,虎视眈眈,我一想到这就高兴不起来。”羨之分析道:“此番勤王,诸位将军中只有你受封爵位最高,其它将军虽受封赏,但谁能保证无人对你有嫉妒之心呢?我私下听说刘毅、诸葛长民等对此次封赏低于您而颇有不满。尤其是刘毅刚愎自用,自负而又喜欢炫耀。这次是他亲手斩杀了桓玄,将军若接

受官职高于他，势必会引起他的嫉妒。将军应以长远眼光来处理这件事情。将军手中虽握有重兵，但还缺少足够的威望来震服诸将，因此对朝廷的任命应予辞谢。一则让人们知晓将军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谋一己之私；二则可避免同刘毅的正面冲突。将军应暂时回至京口，休养生息，以团结更多的将军到身边，孤立刘毅。”

次日，安帝正式下诏分封诸将，刘裕再三辞让，并盛赞诸将尤其是刘毅、诸葛长民的功劳，声称自己并无大功，受之有愧，愿回到驻地，治理地方事务。安帝诏命百官促劝，刘裕仍旧多次推辞，并亲自到宫廷请求。安帝无奈才允许他回京口，改封他为都督荆、司等十六州军事。

刘裕避免了与刘毅的正面冲突，但刘毅表面上也拥戴刘裕，可内心仍不服气。刘裕越是忍让，刘毅越发骄横放纵，处处与刘裕为难。在这种对峙中，刘裕虽暂居下风，但由于他谦逊待人，不计私利，以团结为重，北府兵大多数将领都很敬佩他，逐渐向刘裕靠拢，对刘毅则丧失了信心。后来刘毅起兵攻打刘裕，由于众叛亲离，兵败自杀。

徐羨之以退为进的妙计使刘裕大尝甜头。从此，在灭南燕、后秦等一系列战争中，刘裕屡建奇功，但对朝廷封赏总是依此计而行，推辞再三，表示他对封官进爵没有兴趣。朝廷内外都盛赞刘裕是德高望重的忠臣。刘裕的威望终于形成了。

助裕篡晋 开国宰辅

自诛灭桓玄以来，经平灭刘毅，西征南燕，北伐后秦，多亏徐羨之屡献良策，才使刘裕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已完全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刘裕对有才德的庶族大力提拔，不拘一格。注意团结各路将军，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在朝廷一呼百应。到这时，刘裕受禅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徐羨之已身兼司马、吏部尚书、建威将军和丹阳尹，成为刘裕手下最得力的辅臣。

晋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安帝驾崩，恭帝即位。恭帝被迫加授刘裕为宋王，并给予特殊礼仪，尊宋王妃为太后，世子刘义符为太子。这使刘裕的儿子日后可以继位做东晋皇帝，但这与刘裕的目标相去甚远。刘裕的目标是迫使恭帝禅位。徐羨之早已明白刘裕的心思，又向他悄悄献了一计。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正月，刘裕依计行事，欢宴宋国（封地）大小官员。酒过三巡，刘裕对大家说：“当年桓玄篡夺帝位，是我首倡大义，兴复晋室，接着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大功告成，遂蒙皇上赐赠九锡。可我现已年迈，地位如此崇高，天下事物都忌讳满盈，如此下去，难保长久平安。我拟将爵位奉还皇上，回到京城颐养天年。”这些臣属弄不清刘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傍晚席散。中书令傅亮宴毕出来后，恍然大悟，忙转身去宋王宫。此时，王宫门已关闭，傅亮敲门，请求召见。原来傅亮求见，正如徐羨之的算计。傅亮说：“宋王，我想暂时返回京城。”刘裕知道他的意思，很高兴，就问：“要多少人护送？”傅亮说：“几十人。”傅亮抵达建康不久，恭帝便下诏征召宋王刘裕入京。傅亮联合朝中官员，迫使恭帝将帝位禅让刘裕。

宋元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在建康修筑高台，接受恭帝禅让，即皇帝位，建元永初，史称宋武帝。

为了稳固新建的宋政权，刘裕贬恭帝为零陵王，将其迁居旧秣陵县（今南京江宁县长秣陵镇）。一年后，刘裕派人将恭帝处死。

刘裕对助禅功臣和属臣各有封赏，提升徐羨之为司空、镇军将军、录尚书事，主管朝廷机要；傅亮为中书令。刘裕已年过65，朝中大事悉委徐羨之负责，命他统率百官，与傅亮等共同辅政。徐羨之成为刘宋朝廷的开国宰相，更加努力地辅佐刘裕。



连环画《春秋笔》：
徐羨之被杀

顾命辅佐 废昏立明

武帝刘裕一生戎马，如今终于获取了至尊的皇位，他踌躇满志，意欲成就一番伟业，无奈连年的征伐损害了他的健康。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三月，刘裕病倒。徐羨之、傅亮等重臣入宫照料。五月，刘裕病危，下诏立太子刘义符，又亲写遗诏：“后世如有幼主，朝廷大事全部委托宰相，皇太后不能临朝干政。”并任命徐羨之、傅亮、谢晦等为顾命大臣，辅助义符。刚刚开创的刘宋天下，治理的重任便落到徐羨之等人肩上。

刘裕去世，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年仅17岁，史称少帝。

少帝年少，朝中大事无论巨细都由徐羨之等处理。作为前朝老臣，徐羨之又担负起辅佐少帝的重任。徐羨之受刘裕重托，更加用心地管理朝事，尽宰相的职责，把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使百官上下一心。他还调整发展经济的政策，鼓励农耕、经商，使国库充盈，社会安定，并使多年来的战争创伤慢慢得到医治。

少帝在居丧期间不守礼教，嬉戏无度，整日与佞臣在华林园、天渊池游乐，歌舞不休直至深夜。徐羨之上疏劝谏，少帝不听。恰好此时北魏大军南下，攻取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随后占领宋大片领土。徐羨之一面派大军北上抗击，一方面又上疏请少帝亲征。少帝不加理睬，把一切推给徐羨之处理，依旧游玩嬉戏。徐羨之对这位扶不起的“阿斗”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刘裕开创的江山将要毁于一旦。作为顾命大臣不能保住江山社稷，又有何面目去见先帝？他遂与傅亮、谢晦三人密谋，最后决定废除少帝，迎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而依旧制，废除少帝后应立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但此人生性轻浮，毫无声望，而宜都王刘义隆却具有帝王气质。于是徐羨之决定先弹劾刘义真，再废少帝，最后迎立刘义隆。

徐羨之联合傅亮等几十位大臣联名上疏弹劾刘义真，少帝批准，贬其为平民，放逐新安郡（今浙江淳安县）。不久，徐羨之派人将他处死。

刘义真已除，下一步便是废除少帝。徐羨之密令大将檀道济、王弘入京，与傅亮、谢晦几人商讨具体行动计划。他借口谢晦修理家宅，将军队藏于谢府，又派心腹潜入皇城收买禁卫军。

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五月二十四日，天气燥热难耐，少帝在华林园避暑，傍晚又移驾天渊池龙舟上通宵作乐。天将拂晓，徐羨之、檀道济率兵直奔天渊池。徐羨

之领军冲上龙舟，斩杀侍卫，制服少帝，取下皇帝印信后，将他押出天渊池。随后，徐羨之前往朝堂，紧急召集百官，拿出早已拟好的诏书，假称是奉太后之命，已将少帝拿下，历数刘义符荒淫不孝等罪状，废为营阳王，贬居吴郡。迎立宜都王刘义隆即位。随后，徐羨之暗自下令杀死刘义符，以绝后患。

接连诛杀两亲王，徐羨之恐怕刘义隆即位后对己不利，于是就命谢晦出镇荆州，兼都督荆、湘等七州军事和荆州刺史。把精锐部队和能征善战的将领，全部配给谢晦，希望他居于外地，与自己在朝廷遥相呼应，作为声援。

八月，宜都王刘义隆在建康即位，改元永嘉，史称宋文帝。文帝下诏百官一律擢升二级，提升徐羨之为司徒。刘宋王朝的军国大事仍由徐羨之等顾命大臣处理。徐羨之位列司徒，做事有魄力，威望又高，实为百官之首，朝中一切必须经他批准方可办理，可谓无冕之王。

权倾朝廷 终招杀祸

文帝登基伊始，为避免重蹈兄长复辙，下诏一切典章不变，并推说年幼，一切政事归由顾命大臣处理，自己要为先帝刘裕守孝满三年。徐羨之见文帝毫无怪罪自己之意，便放开手脚，毫无顾忌。他把自己的亲信大力提拔，担任朝中和地方的要职。朝中事务必须由他批准方可办理。徐羨之身为司徒，把握朝中权柄，使文帝形同虚设。

文帝深居皇宫，但却没有空闲一刻。他表面不问朝政，暗地里积极结交名士，拉拢与徐羨之不和的官员，将前宜都王府的亲信都分封了高官，在朝中让他们替自己活动并充当耳目。

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正月，徐羨之、傅亮上疏文帝，归还政权。原来，文帝居丧三年已满，且又年方二十。按律例，顾命大臣已圆满完成任务，应归政文帝。徐羨之认为文帝不敢批准奏章，仍会让自己掌管朝政，况且朝廷上上下下都是自己的亲信，于是再三上疏请求回家乡安度晚年。文帝也下诏再三挽留。徐羨之便故作姿态，在府中期待文帝会亲自登门挽留。不料10日过后仍不见文帝来请，徐羨之便知不妙，于是赶紧上朝。短短数日，朝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中关键职位都换上文帝的一班人马。一切政事均由文帝裁决，虽也向徐羨之咨询，但已流于形式。徐羨之想削弱文帝实力，便要把文帝亲信大将刘彦之调往外地，奏章呈上后，文帝反而任命刘为中将军，统率全部禁卫军。

徐羨之不甘心失去往日的荣耀与权力，他写密信给谢晦，讲述朝中巨变，让他起兵入京“勤王”，并联合檀道济在广陵同时起兵。

与此同时，文帝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他一面密调军马向荆州运动，对谢晦形成包围，一面分化徐羨之阵营，密诏王弘、檀道济这两位顾命大臣入京。王弘是文帝心腹王县首的弟弟，他又与檀道济交往甚密。于是，二人倒戈，投入文帝阵营。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正月十六日，文帝下诏，宣布徐羨之、傅亮、谢晦谋杀少帝和庐陵王的罪行，命檀、王起兵诛讨谢晦，并在朝堂埋伏武士，伺机诛杀徐羨之、傅亮。

这一天，文帝下诏急命徐、傅二人入宫商讨大事。徐羨之知道命数已尽，想想自己辅助刘裕，顾命辅助幼主，为刘宋王朝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到如今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别无选择。最后，他含着热泪钻进路边一个陶窑里，上吊身亡。

纵观徐羨之一生，功大于过，瑕不掩玉。他为刘宋王朝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将永载史册。

颜之推：一部家训导万世

酒量犹豪人渐枯



颜之推生于公元531年，卒于公元591年，祖籍琅琊临沂，出身于世代尊崇儒术的世宦家庭，系晋元帝时衣冠南渡的北方大族之一。

据《北齐书·颜之推传》载，其“九世祖含，从晋元东渡，官至侍中。父勰，梁湘东王绎镇西府咨议参军。世善《周官》《左氏》学。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老》《庄》，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湘东王以为其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

少年聪慧，博览群书，加之渊源的家学熏陶和影响，使他在继东晋竞相谈玄言虚的流风余绪中，能独立于玄学与佛学流行思潮之外，始终保持对儒家经典情有独钟。而且，颜之推博览群书，文采斐然，这些都为他后天成长为一代儒宗，提供了重要的人生早期先决条件。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自然要被湘东王萧绎所看重。公元550年，萧绎派遣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20岁的颜之推便被做为重要的辅佐人才，以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记的官职一同前往郢州。

不久，侯景之乱，不仅改变了颜之推的人生，而且改变了萧梁的国祚。

东魏高欢麾下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侯景，在公元547年高欢死后，以河南为见面礼投降西魏，宇文泰深知侯景的狼子野心，于是对他明助暗压。为此，侯景再次改换门庭，又举着河南土地的这个钓饵，转而投降南梁，梁武帝萧衍为贪图这块土地，接纳侯景，并封他为河南王兼大将军。羽翼渐丰之后，侯景终于在公元548年，以欺骗手段获得梁武帝侄子萧正德作内应，攻入建康，杀萧正德，又于次年攻破台城，软禁梁武帝，最后将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内的文德殿。

城破之时，建康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这之后，侯景立萧纲为帝，继而废杀萧纲，立萧栋。公元551年，侯景废萧栋，自己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王僧辩、陈霸先大败侯景，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这就是著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中，郢州沦陷于叛军之手，颜之推被俘。这中间，颜之推几次面临被杀的危险，但每次都多亏行台郎中王则的帮助才侥幸获免。

公元552年，侯景被灭，湘东王萧绎在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劫后余生的颜之推回到江陵，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西魏大军便南下来袭，公元554年攻破南梁首都江陵，梁元帝被杀。江陵遭掳后，梁朝王公以下数万百姓做为奴隶，被押解至遥远的西魏国都长安。在这长长的神情沮丧的战俘行列中，就有垂头丧气地行走着欲哭无泪、伤心欲绝的颜之推。

身困囚车，远赴他乡的路上，他吟下“昔为时所重，今为时所轻。愿与浊泥会，思将垢石并。归真川岳下，抱润潜其荣”，以此哀悼故国之丧，痛挽自身之辱，“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惘惘思旧都，惻惻怀君子”。

二

辽阔的北中国，却以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在等待着颜之推的到来。

不独是他，几位早就闻名大江以北的南梁硕学鸿儒，都在北方粗犷豪放的统治者心中留有极高的位置。

这些笑容可掬、礼数甚周的西魏最高统帅，怎么能和那些杀进江陵的野蛮入侵者划上等号呢？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不容置疑。两位先到这里的南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比如王褒。这位识量淹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与颜之推同样祖籍琅琊临沂的梁朝名士，一到长安就受到了宇文泰超乎寻常的隆重欢迎。

《周书·王褒传》真实纪录下了这个感人的场面：“褒与王克、刘歆、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眚，忘其羁旅焉。”

王褒在孝闵帝践阼后，被封石泉县子，邑三百户。到周世宗即位后，又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赅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治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

再比如颜之推的弟弟颜之仪。这位幼小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博涉群书，好为词赋，深得梁元帝赞许的雅士，也在西魏攻入江陵之时被俘至长安。“周明帝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武帝初建东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宣帝即位，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

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以极大的虚心与诚恳，拜刚刚被自己用武力打败的人为师，向匍匐在地的被征服者讨教，这就是宇文氏对待来自被统治区文人的态度。这一切又绝非故作姿态，而是出于对汉文化由衷的倾心与皈依，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自觉靠拢。

三

公元554年江陵城破之后，凄凄惶惶的颜之推被迫走上了北上长安的漫漫风沙路。他在《观我生赋》中写下了此时悲怆的心境：“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暢。”

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炆。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蹈于途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軫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掩桐棺之薰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悽惶。”

也许已走到了长安，或许还只是在路上，一个人看上了颜之推，他就是大将军李穆。李穆决定将这个重量级人才送往弘农，让他来为自家哥哥阳平公李远服务，掌管书翰之事。但颜之推此时却心系故国，结思江湖，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于是，他决定伺机逃离。

方案是偷渡黄河。因为，偶然间他获知，北齐准备遣送梁使徐陵等人回国，于是他暗自决定先奔齐，而后随同徐陵返梁。“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砥柱山，当黄河中流。以山在激流中矗立如柱，故名，为北周与北齐交界。

茫茫黑夜，浪高波涌，一叶扁舟，险象环生，颜之推竟然潜逃成功，胜利抵达北齐。

后来他在《从周入齐夜度砥柱》诗中，心有余悸也骄傲无比地写道：“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北齐的文宣帝高洋与北周的宇文邕一样，向来自江南的这位大师表达了自己极大的热诚。“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盼”。

颜之推却没能回到思慕已久的故乡。这中间的原因，恐怕是高洋同样出于严重舍不得的原因。当然，即使想归也归不成了。公元557年，陈霸先威逼梁敬帝萧方智让位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陈，梁朝彻底灭亡。无国可归，无家可回，颜之推援笔写道：“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

高洋用他的礼贤备至行为，感动着这位来自南方的学宗。他一度想让颜之推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寝。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后来，颜之推用其渊博学识与超人才干获得了高洋的嘉许，升任为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

身处北齐帝国的权力中枢，颜之推勤勉有劳，卓有政绩，“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书，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

又一场变故很快接踵而至，再次改变了颜之推的人生。

四

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帅军攻打北齐，当北周部队大兵压境时，齐后主高纬还在与宠妃出游打猎，第二天才于慌乱中派兵迎战。直到晋阳不保，他仓惶出逃至邺城。公元577年，北周军攻破晋阳，后又大举进军邺城，以高纬为首的北齐王公大臣悉数被俘，北齐灭亡。

在北齐政权即将沦陷之时，颜之推为这个王朝做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颺进奔陈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纳之。”可惜丞相高阿那肱以吴人不可取信为名，拒绝采纳此计。计策虽然不被采纳，但颜之推“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河津失守之后，颜之推被俘，二度成为北周的俘虏，被迁往长安。

24年前发生在江陵的那一幕，今天再次重演。

北周统治者仍然没有以战俘的身份看待颜之推。对这个曾被自己授予高官，又偷偷潜逃至齐的人，北周不仅没有将之视为异己，更没有厌弃，相反，鲜花簇拥，礼遇甚隆。

这中间，当然有此时在北周备受重用的王褒、庾信及弟弟颜之仪等一帮南梁同志在起作用，但更大的因素是，周武帝对江南士人普遍具有的天生好感，是他对以魏晋文化为正朔的江南汉文化的仰慕之情在起作用。

公元581年，颜之推担任御史史，与弟弟颜之仪的司书上士同等级别。

公元581年，在历史纪年上还有两个年号，在北周是大象三年，在隋朝则是开皇元年。这年大周相国杨坚以造反者的姿态起义，伴之的是10岁娃娃宇文阐逊位，北周灭亡，隋朝取代了北周。这同时意味着，刚刚转换了国籍的颜之推，转眼又成了隋朝的子民。

裹胁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里，身不由己漂进隋朝的颜之推还会遇到什么？

五

隋文帝杨坚与太子杨勇父子，向颜之推表达了这个新兴朝代对文化的尊敬与热忱。“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

自称“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此时再也无意于官场，而是以兼通南北儒学，杂糅儒释道众学之长的学术积淀，凭借游宦南北朝胡汉多个政权，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等广袤的中国土地所形成的丰厚阅历，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祖之业”宗旨，来完成自己最后的著述。

这部大著就是《颜氏家训》。

因书名所导，后人往往将之简单视为一本训诫子孙后代的著作。其实不然。颜之推著述的出发点，是鉴于隋统一之后，南北儒学于交汇中产生的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从人生最浅显的安身立命讲起，进而引申到儒家精神的核髓，来树立正朔，打理此时南北儒学相互冲撞产生的种种不协调。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篇》中开宗明义：“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匡正时弊，纠正儒风，以儒家正统观念为基调，对经历玄学改造和佛学变异后多有舛误的时学予以复原，从世道人心处细心打理，以廓清蒙尘积垢的儒学。一部《颜氏家训》须得如此看，方能看出真谛和妙处。

六

正是举着家训之名，实则是在行广倡儒家忠孝仁义观念，普及儒家理想人格，指认安身立命所在，所以《颜氏家训》自隋初面世后，就一直成为儒家育人正己的规范读本，历代刊刻不断。由近及远，争相矜式，大行于世，好评如潮。

《颜氏家训》的最妙处是作者抛弃正襟危坐，扳着面孔的说教姿态，而是用大量亲见亲闻的具体事例，从人伦常情与世道人心的细微处落笔，娓娓道来，如语家常。

颜之推极为重视学习，讨厌不学无术。学习的目的是为发虑宪，求善良，化愚顽，就贤远，最后成为一个有识于胸，有仁在心，有礼约身，有思在脑的人。在《勉



学篇》中，他用自己亲历的梁朝中所见，深刻地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但他们肚中无货，“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天下太平之时，这些人还能够悠游卒岁，但等到天下大乱，朝市迁革之后，铨衡选举者，与他非复有亲；当路秉权者，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那么就窘态百出，只能“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他指出，如果在当初，潜心学习，“诚弩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但现在他们因不学无术，“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进而，他用自身周历南北朝胡汉政权，却能处处受到尊敬为例告诫人们：“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之推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他在书中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幼年时期，人精神专注，心无旁骛，受外界干扰少，故而是受教育的最佳时机。而且，人之少年犹如起于一张素纸，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因而在此时接受良好的教育，会对一生影响极大。

他认为学习是一项终身事业，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之时“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少年时学习，“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但比不学而“瞑目而未见”要强百倍。

承继孔孟孝悌仁义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人在以“德艺周厚”为根本人生取向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以仁义为信念，以践行仁义为旨归，积极培护自己的德性生命，加强心灵再造。他在《省身篇》中说：“君子当守道尊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天由命。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

尽管《颜氏家训》的写作意图是以归复早期儒家伦理思想为第一要义，但着眼于儒释道三教并融的大一统隋朝学术现状，他在《归心篇》中指出：“原夫四尘五磨，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

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他认为就思想本质，儒释道三教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化愚启顽，教人向善就德，他们之间没有学理上的根本冲突。如此，就从理论上为隋唐在文化上实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理顺了道路。

这些更为学术化的阐述与辨析，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家训只就家庭伦理、道德修养、安身立命的言说范畴，从中也可清晰看到，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的真正用意所在与普世情怀。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此书虽然乍玄乍释，忽儒忽佛，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但其宗旨仍然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儒家的亘古使命与主题。也正因其充溢着尊德乐义、行仁明礼的传统儒家精神，所以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推崇备至，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赞它：“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袁《庭帙杂录》中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王钺盛赞“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家法，其实已经变为了世法。

七

颜之推在写于入周之后的《观我生赋》中，对自己充满坎坷的流离飘零一生进行了艰涩的回望。

他对自己的总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在扬都，生值侯景杀简文帝而篡位；于江陵，逢遇孝元帝覆灭；于晋阳，经历齐后主遭屠毒。故而，他称自己“三为亡国之人”。

为此，他悲愤难抑地写道：“鸟焚林而铄羽，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其实，若再加上大象三年的北周之灭，他一生应该经历了四次亡国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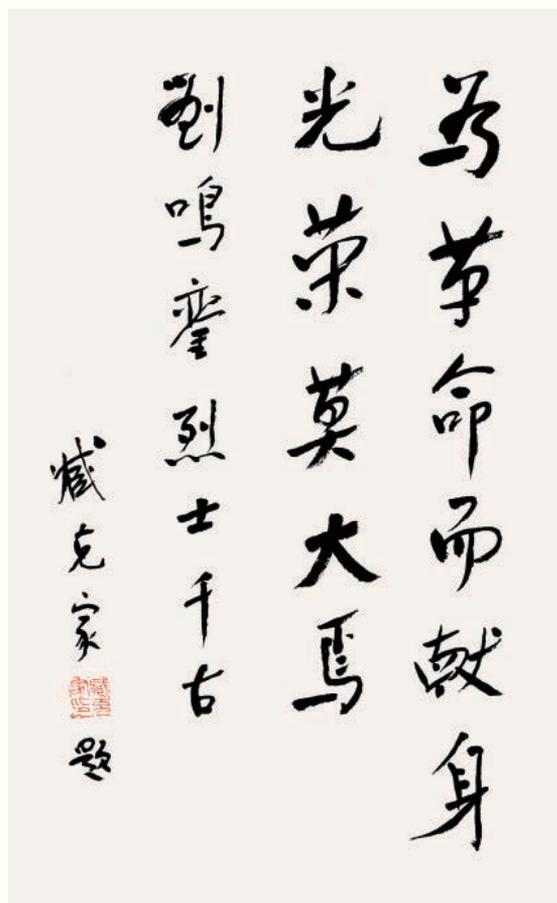
但也正是他数经亡国丧家变故，无奈之中数度易主，历涉汉胡不同朝政，以江南之人长期游走于辽旷北地。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这才成就了他的宏富性与博大性。

他在《颜氏家训》之中俯拾即是广泛例证，同时也成为今天学人对于研究南北诸史的重要参考。比如《风操篇》中所说“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勉学篇》中说“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此人就是王翼；《文学篇》所言“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此人是姜质；《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读之，均可以补证南北诸史。因而，《颜氏家训》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蚌病成珠，石结牛黄。从这层意义上说，究竟是该同情还是该庆幸颜之推的不幸呢？大师却不管这些的了，他只以一部家训谆谆教导万世之人。

从此，后世中国的每一个诗书之家有了教育子弟成长的必读范本，而每一位成长起来的德学兼备之人，又无不在生命早期啜吸过它的营养。

臧克家为刘鸣銮烈士题字始末

高 军



本文介绍的是著名诗人臧克家1991年6月13日给革命先烈刘鸣銮题写的一幅字的经过。

刘鸣銮，1902年生，字金波，号元之，沂南县苏村镇门家庵子村人。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学，1925年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沂南县最早的中共党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刘鸣銮被列入逮捕名单，党组织遂安排其返回山东，找中共山东省执委继续开展工作。刘鸣銮离开武汉，在九江与武汉军政学校的左派学生臧克家相识，二人结伴经南京、上海，8月底到青岛。刘鸣銮在青岛和山东党组织接上关系，来到臧克家故乡诸城相州镇臧家庄。因路途染病，在臧家庄住了近两个月。期间与中共相州支部负责人王翔千一起，介绍臧克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底，病未愈便捎信让其家兄接回老家门家庵子。刘鸣銮身体康复后，带着山东省执委书记邓恩铭署名为“秦扬”（当时中共山东省执委化名为秦扬）的亲笔信，到沂水城与中共沂水县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回家乡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春节以后，鲁南惯匪刘桂棠（刘黑七）到沂河以东劫掠。2月6日（古历正月十五）匪徒逼近苏村。刘鸣銮将民团拉进小杜家庄，进行联庄自卫。2月7日晚土匪包围了小杜家庄，刘鸣銮率众抗击土匪，他英勇作战，连中数弹。由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2月9日年仅26岁的刘鸣銮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刘黑七攻围不成只好撤走，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刘鸣銮牺牲后，当地民众悲痛万分，在小杜家庄前集资立“刘鸣銮纪念碑”，将其英雄事迹勒石以传后世。

臧克家与刘鸣銮分别后，并不知道刘鸣銮牺牲以及其后的有关情况。直到拨乱反正时期，刘鸣銮的中共党员身份还不能被认定。这时候，刘鸣銮家乡党组织和其后人开始认真调查核实，臧克家也才知道了刘鸣銮的情况，多次写出证明，并发表文章，宣传刘鸣銮的革命经历及其英勇事迹。不久，刘鸣銮的党员身份得到承认，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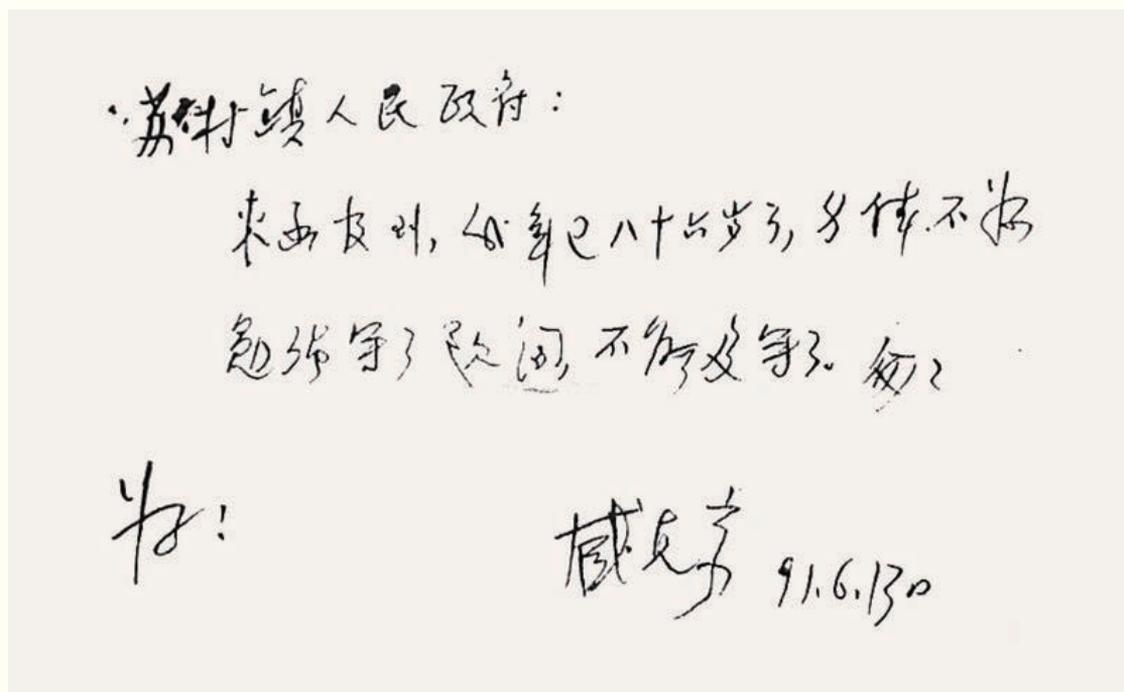
星转斗移，光阴荏苒。时间到了1991年，离休前曾在四川省成都市纪委担任领导职务的门家庵子村人邢敏，回家探亲时再次来到小杜家庄前刘鸣銮纪念碑前缅怀凭吊后，有了想为这座纪念碑建造碑亭，同时在刘鸣銮的家乡门家庵子村前为刘鸣銮塑像，并在这里为刘鸣銮再立一座纪念碑，以再现革命先烈刘鸣銮的光辉形象的想法。邢敏联系了原在青岛市商业局担任领导职务的刘鸣銮的侄子、门家庵子村人刘公圣，他们商量，想发动门家庵子村在外面工作的人捐款解决费用问题。于是邢敏把这一设想和苏村镇党委、政府进行沟通，得到了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分管副镇长刘善智多次与邢敏商量具体办法，党委书记姚富周多次过问，并到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以求得到资金上的支持等。在这种情况下，邢敏、刘公圣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在5月1日起草印发了《倡议书》，建议将捐款在1月1日前直接寄往苏村镇政府。苏村镇政府也确定了由在党委做秘书工作的张家沼作为这一工作的联系人。

副镇长刘善智代表苏村镇党委、政府以镇政府的名义给臧克家写信进行了汇报，并请臧克家为刘鸣銮题词，信件写好后，从苏村邮局挂号寄往北京市东城区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的家中。臧克家对涉及刘鸣銮的事总是非常重视，欣然应允，他在四尺四开的宣纸上认真写了题词：“为革命而献身光荣莫大焉”，并钤盖了“臧克家印”的印章。同时，他还写了一封回信一并寄给了苏村镇政府：“来函收到，我年已八十六岁了，身体不好，勉强写了题词，不能多写了。”

但是，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在门家庵子村前为刘鸣銮立碑、塑像等未能实现，为小杜家庄前刘鸣銮纪念碑建造碑亭的想法也没能得到落实。收到的捐款，只能将当时已经倾斜的小杜家庄前的刘鸣銮纪念碑碑体进行扶正，并采取在纪念碑周围垒砌围栏，对东部的塌陷土地进行砌石填平予以保护等措施，这项工作于1992年清明节前完工。

2004年2月5日，为刘鸣銮题字13年后，享年98岁的臧克家在北京逝世。于今，已经又过去了整整11年。尽管臧克家的题词至今还没能勒诸碑铭，但这是一份重要的资料，所以，在这里将臧克家这幅24年前的题字介绍给广大读者。

编者：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刘鸣銮和臧克家的战斗友谊，我们同时将臧克家生前写的纪念文章《忆战友刘鸣銮》附录于后。



忆战友刘鸣銮

臧克家

我的战友刘鸣銮，字金城，号元之，是沂南县苏村区门家庵子村人，他是沂水南乡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地的革命先驱者之一。他的活动，无论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还是对后来党的事业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刘鸣銮同志早期遇难，又加档案工作上的疏忽，致使他的事迹多年来一直没有较全面的记载。现在，我仅就自己的记忆做些回顾，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英灵，并启迪后人斗志。

刘鸣銮同志1902年出生于沂水县门家庵子村（今沂南县）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父亲刘治终生务农，有土地120亩。刘鸣銮兄弟二人，姊妹四个。刘鸣銮从八岁读书，12岁入苏村完小学习。他自幼天资聪慧，口齿伶俐，颇得教师喜爱，在同学中也有威信。17岁高小毕业后，由家庭包办，娶妻成亲，18岁考入临沂五中读书。此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上滋生。他通过阅读进步的报刊杂志，受到了启蒙教育。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大学，就是在这里，他投入了党的怀抱。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10月，改组为上海大学。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共产党员邓中夏担任教务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著名的学者都曾在这里任过教。1923年7月，学校里便建立了党的组织。刘鸣銮来校时，正逢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大学的校内教学和社会活动有了紧密联系，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还经常组织师生从事社会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宣传进步思想。刘鸣銮在这个进步环境中受到革命真理的熏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聆听共产党人精辟的讲课，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25年，刘鸣銮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鸣銮同志加入党组织后，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得到锻炼，他开始由书本走向现实，由学校走上社会。1925年5月上旬，上海人民在举行了二月罢工的基础上再次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无故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进一步激起了上海人民高昂的反帝斗志。5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运动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做出了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斗争的决定。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游行示威，又被英帝国主义拘捕100多名，这更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近万名群众聚集在英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不但拒不放人，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造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刘鸣銮同志勇敢地投入了这次斗争的浪潮。他不顾生命危险，毅然走向街头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工人运动。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刘鸣銮到总工会工作。后来，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使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很快发展起来，并迅速扩大到全国。

随着斗争的深入，刘鸣銮斗争的艺术也越来越高明。为应付复杂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又打扮成市民。有次，他回家乡探亲，家中的人问过他：“你在外边搞运动，就不怕被捕坐牢吗？”鸣銮笑了笑说：“不会的，你们放心好了。在上海我就多次化装脱险，不信，我表演一下你们看看。”说着，他就走进房间，不长时间，便打扮成了一个外国人的样子，身穿西装，面带胡须，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和原来的刘鸣銮显然成了两个人。

上海大学的学习与斗争生活，不仅使刘鸣銮扩大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1926年，他决定离开上海，奔向武汉，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文武兼习，以图报国。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代表汪精卫、张治中任教务长，教官中有恽代英、李达等。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很多，班、排、连长，连指导员，大半是黄埔毕业生，党员也居多数，大多是周恩来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学校里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刘鸣銮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投奔到这里以后，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坚强战士。可是，伪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蒋介石，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吓得要命，恨得要死，终于在1927年发动了反动的“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夭折。革命阵营在不断动荡分化，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逐渐分明。5月，鄂西夏斗寅在率北伐军进攻河南的时候，乘机叛变，并回兵进攻武汉。

5月17日，夏斗寅部抵达离武汉40里的纸坊镇。19日，武汉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夏大会，发表了《讨夏告民众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成为反夏的主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生兵团，也迅速合并，成立了“中央独立师”，英勇地投入了讨伐夏斗寅的斗争。刘鸣銮面对这严酷的斗争现实，毅然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亲赴前线作战。临阵前，他全副武装，摄下一张相片，并在相片下亲笔题志，寄回老家，表现了他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义无反顾、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战斗中，刘鸣銮表现得非常勇敢，被提升为班长。

讨夏战斗结束后，刘鸣銮回到武汉，恰遇汪精卫的嫡系分子王乐平，公开鼓吹反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刘鸣銮更是义愤填膺，曾亲自动手抓捕王乐平。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武汉，特别震动了在武汉工作的山东人。使原来一些不太了解刘鸣銮的人，争相前来拜见这位身材不高、但革命意志却非常坚定的红色战士。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反对共产党，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的狰狞面貌亦暴露无遗。他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屠杀革命群众。刘鸣銮亦被列入逮捕名单。为此，党组织决定让刘鸣銮返回山东，与中共山东省执委联系，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接着，刘鸣銮就随武汉军政学校的一批学生，离开武汉，乘船来到九江。但一上岸，张发奎就把这批学生围困起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当时我也被困在这批学生中，由于我平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此时，则深感前途莫测。于是，便与刘鸣銮一起偷偷冲出包围圈，逃到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换上便衣，买了船票，上了英国的一条客船。这船上贴了一条怵目惊心的声明：“本船不保险有政治犯不被当局搜捕。”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偷上这条船的同学，仍为数不少。但大家只能用眼睛说话，装作互不认识，但军帽给额上留下的一道白痕，却是明显的标志。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终于安全到达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我们已经分文皆无，不仅没有返回山东的路费，连喝茶水的钱也无法支付。刘鸣銮就凭借着同学多地方熟，终于找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乡，从他那里借了30块大洋，我们分成6包，放在两人身上。尽管如此，我身上的钱，还是被人偷走了一包。

8月底，我和刘鸣銮从上海乘船到达青岛。在青岛，刘鸣銮和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又一同来到我的故乡——诸城县臧家庄。由于沿途辛劳，我们俩都病倒了。刘鸣銮的病情更严重，我请医抓药，精心护理，他的病情略见好转后，便与诸城相州党组织负责人王翔千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相州支部活动。后来他和王翔千一起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鸣銮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病情虽有好转，但始终未能全愈。1927年10月底，

他离开诸城，由家兄接回门家庵子。

刘鸣銮回到家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身体逐步康复。不久，便带着中共山东省执委书记邓恩铭署名为“秦扬”（当时中共山东省执委化名秦扬）的亲笔信，到达沂水城与沂水县党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认真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斗争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这方面，刘鸣銮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在谈到利用关系去作土匪的工作时，刘鸣銮指出：“土匪是破产的农民，但已走上犯罪道路。他们奸淫劫掠，坏事做尽，是人民群众的仇家。我们不能依靠他们，应坚决与土匪作斗争。”在谈到依靠“青红帮”的问题时，他说：“青红帮基本上是土匪的外围，他们的人员中，地痞流氓、中小地主很多，是碗‘大杂烩’。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就是靠青红帮作骨干的。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一时，但决不能作为革命的主力。”在议论到暴动问题时，他说：“‘暴动’二字谁也会说，但真正要干就不容易了。要想干就得想法搞到枪支。没有这个本钱，什么也别谈。”为迅速拉起一支武装，刘鸣銮以打土匪为名，成立了民团，并以小杜家庄作为临时根据地，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就打起红旗，拉到沂蒙山里打游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鸣銮在家乡组织起一个300多人的民团武装，并亲任了团副兼总教练。

1928年春节过后，鲁南惯匪刘桂堂（刘黑七）从沂蒙山步步东移，越过界湖镇，向沂河以东劫掠。古历正月十五，已逼近苏村。刘鸣銮的家乡即将陷入匪徒的烧杀蹂躏之中。他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小杜家庄围圩墙高水深，易守难攻。遂决定率民团进驻小杜家庄，联庄自卫。

小杜家庄的炮楼上，挂起了火红的战旗。全村家家户户动手拆炕、扒砖，正在加固围墙。身兼总教练的刘鸣銮，手持鬼头大刀，臂带“团副”袖章正作战前动员。他说：“咱们的队伍是由几个村联合起来的，有着生死共存的利害关系。古人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做到人和——也就是大伙说的齐心协力，任凭刘黑七有三头六臂，咱们也能制服。”

团丁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象吃了“定心丸”，个个气壮胆大，一致表示：活，咱们活在一起，死，咱们的血也要流在一块。

正月十六日，骄横狂妄的匪徒兵临墙下，强令老百姓开门献粮献款。刘鸣銮面对凶恶的匪徒，一声令下，早已瞄准的火炮“轰”地一声飞向匪群。接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匪徒们虽一次又一次地向围墙发起猖狂攻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天黑下来了，刘鸣銮在带领团丁修补工事，加强防御的同时，令围墙各处高挂马灯，严密监视匪徒的活动。半夜，匪徒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在村东北方向大肆呐喊、射击，而在村西南方向悄悄搭起云梯前来偷袭，顷刻之间，18名匪徒已翻上围墙。团丁杜相传、宋苗当场阵亡，围中人员的安全已岌岌可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鸣銮一个箭步跃上墙去，手中的鬼头刀左右开弓，只听得嗖嗖几声，匪徒的几颗人头，已滚下墙去，其余的匪徒，吓得连滚带爬，逃了回去。刘黑七见攻不开围墙，只好撤走。民团胜利了，数千群众生命财产保住了。然而，刘鸣銮却在与敌持刀拼搏中，身中七弹。当团丁把他抢下火线时，他已面色苍白，鲜血直流，奄奄一息，但口中仍不住地说着：“一定要守住围子，保护群众，舍我生命，能救众生，我愿足矣！”虽经全力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于古历正月十八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6岁。

刘鸣銮牺牲后，邻村民众痛苦万分，纷纷集资建立了“刘鸣銮纪念碑”。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84年批准，追认刘鸣銮同志为革命烈士。

朱瑞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高昂



朱瑞（1905—1948），学名朱敦仲，字剑侠，江苏省宿迁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4年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朱瑞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1938年11月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共赴山东，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年9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4月23日，以中共山东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正式出席了中共七大，会上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剖析。1945年夏，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大秘书处发给朱瑞的会议代表证，长8.4厘米，宽6厘米，外用紫红色綾子装潢，比火柴盒略大，可以对折，便于携带。封面没有文字，打开后内衬一张均分对称的两个长方框，左边框内上方从左至右横书“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两行；中间竖写“代表证”3个大字；靠右侧有“第四八三号”小字。右边框内上方横书“座号1排18号”，“姓名朱瑞”。下方横写“注意”：“1、绝对不得转借，不得遗失。2、出入场会须受门卫检查。”最下方为“七大秘书处制”，共6行。而在内页中间靠下方的地方，盖有一个横椭圆形的红色印章，长5厘米，宽3.7厘米。它有宽、窄双缘，字序从右至左，上方为“中国共产党”，下方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是“秘书处”3个大字。该证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东莞”地名南迁 与青、徐士族南渡 (三)

李 泮

今日广东，有两个地名历史悠久且几乎内涵广东的历史变迁，这就是番禺与东莞。

一

番禺，《史记·南越尉佗传》载，秦二世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也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赵佗就以番禺为根据地王南越。《三国志·薛综传》也有“赵佗起番禺”之语，可见今广东省地秦时就有番禺。

秦时南越，还属荒芜之地。《三国志·薛综传》曰：汉武帝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交趾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赵佗所据之番禺，肯定不是土著之名称。《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元和姓纂》：“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魏有任座，秦有任鄙。”因此番禺是任氏的远祖。秦时广东之番禺，应是任氏族人南迁后带去的地名。



广东东莞可园

循此道理，东莞地名亦然。东莞本在山东，魏晋时期，青徐士族纷纷南渡，侨居江左，于是在晋陵（武进）设南东莞郡，仍辖东莞、莒、姑幕三县。广东东莞，按照中国地名变化的规律，应是北东莞或者是南东莞族人南迁至南海郡后带来的地名。

二

是哪一支东莞族人在何时、何背景下南迁于此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相关资料做大致的判断。

汉时南海郡属交州，领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

后汉时南海郡有七城：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增城是从番禺县分出的。

晋时南海郡统县六：番禺、博罗、增城、四会、龙川、平夷。

东晋时，成帝分南海郡立东官郡。南海太守领县十，除原有的番禺、博罗、增城、龙川外，又增设熙安、酉平、怀化、绥宁、高要、始昌六县。从原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

以上郡县资料说明，至东晋时，南海郡和从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均无东莞县。广东东莞地名是何时出现的，或者说广东东莞县立于何时，按照《辞海》的说法，广东东莞县汉为博罗县地，东晋为宝安县地，唐为东莞县，因此广东东莞起始于唐。此说法与旧、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吻合。《旧唐书·地理志》载：南海郡东莞县，“隋宝安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川南海郡东莞县，“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有盐，有黄岭。”新、旧《唐书》很明确，东莞县是隋的宝安县，唐至德二年改名为东莞。

民国《东莞县志》与此说有异。民国《东莞县志》卷一载：“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注：《元和郡县图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云，县与郡同立）。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按此说，广东东莞县立于晋成帝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这与新、旧《唐书》说的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相差了426年，也就是把东莞立县之时提前了426年。

《东莞县志》之说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是依据了（唐）杜佑的《通典》和（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杜佑《通典·州郡》载：隋，“后又置番州，炀帝初，复置南海郡，大唐改为广州或为南海郡，领县十二。”其中有增城、东莞。在增城县下杜注：“汉番禺县地，吴置东莞郡于此，有增江。”杜佑的“吴置东莞郡”不知从何而来，《三国志》无此说。

《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莞县，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清人张驹贤考证曰：“莞”宜作“官”）。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取旧郡名也。”此说与《晋书》“成帝分南海立东官郡”、“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不符，成帝立的是“东官”，安帝分的也是“东官”，而不是“东莞”。检索历史文献，可证杜佑、李吉甫的说法有误，对《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错误十余处，孙诒让也多有纠正；而对《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点校说明：“此书经过千余年的辗转抄写，错误不少。”

民国《东莞县志》云：“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把晋成帝咸和六年，为东莞立县之始，其主要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对此依据的可靠性，上面已做了分析和判断。但问题绝不这么简单，因为《宋书·州郡志》明确记载的是“东官”，但《宋书》的纪和传确又用“东莞”来记载州郡事，如《东莞县志》所云。

按《宋书·州郡志》云：东官郡，晋成帝立。而《阮长之传》云：补平越长史东莞太守。《羊玄保传》云：羊希出为广州刺史，请萧惠徵为东莞太守。《明帝纪》云：妖贼攻广州，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字皆作“莞”不作“官”。《南齐书·州郡志》亦云东官郡，而《郁林王纪》云：以东莞太守臧灵智为交州刺史。又《梁书·陶季直传》云：祖愨祖宋广州刺史，齐初季直出为东莞太守。又《陈书·孙瑒传》云：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字也皆作“莞”不作“官”，文史不应抵牾。至此，考《晋书·葛洪传》云：邓岳表为东官太守，是晋时称东官，不云东莞，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故《纪传》皆称东莞，《志》特沿晋时旧称，仍做东官。

三

东莞县，《元和郡县图志》曰：“本汉博罗县地”。

博罗县，本汉旧县，《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作“傅罗”，刘昭云：“县有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于罗山，故置博罗县。”《宋志》云：二汉皆曰博罗，《晋太康地志》始名博罗。”又罗浮山，王象之引作浮山。《元和郡县志》曰：“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

可见“博罗县”之名，与浮山、浮来有关。最早迁徙到交州之人，都是浮海而来，如《三国志·许靖传》：“浮涉苍海，南至交州。”人浮海而来，山、水、阜地也浮海而来。浮山一说是从会稽浮来，一说是从蓬莱浮来。总之，这里的“博罗”之“博”，本为“傅”、“浮”，缘自“浮山”之名。而“浮山”是从青、徐故地浮海而来。确切地说，这个“浮山”是来自古莒国地的“浮来山”。

《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浮来，“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今莒县城西数公里有浮来山镇，恐怕就是当年“浮来”的遗址。浮来，是古莒国及古东莞的地名，浮来与东莞连在一起，看来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南海的的博罗、傅罗、浮山、浮来，与青徐的莒、东莞、浮来山也有其历史的联系。

是青、徐的那些族氏南迁岭南越（粤）地后，将原住地的山、水、地名也带到了新居地？纵览各文献，均无直接记载，因此只能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做些推测。

线索一：鲁国人刘表据荆州，其势力南延至交州。

刘表，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鲁恭王之后，与同郡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与范滂、张俭等八人为友，与众多名流大儒结为私党，可为东方名士，因此也是“党锢”中人，“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汉书·刘表传》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何兹全先生说：“关西、兖、豫学士归（荆州）者盖有千数。”可见汉末就有很多青、徐士家豪族跟随刘表到了荆州避乱。

《汉书·刘表传》载：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围攻，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士燮传》载：“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这些记载表明，此时，刘表的势力已南延至岭南。由此也可以推断，刘表手下的那些山东名士、俊杰和泰沂乡亲，有南迁至交州的可能。

线索二：鲁国人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经营。

《三国志·士燮传》载：“士燮，苍梧广信人，其先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

地交州，六世至夔。”

士夔祖为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汶阳即郛，《左氏传》曰：“莒鲁争郛，为日久矣。”今城北郛亭是也。全氏曰：“按《十三州志》曰：‘有东西二郛’，鲁昭公所居为西郛，在兖州东平郡；莒鲁所争为东郛，此邑是也，亦即汶阳之田，所谓‘郛隰龟阴之田’者也。”因此，春秋时有东西郛，有东西汶阳。东郛亦即东汶阳，亦即汶阳之田，到了西汉时改为东莞，因此士夔先祖应为东莞人。

王莽乱政，各地兵起，鲁国故地的樊崇是重要的一支。“琅琊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其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刁子都也起兵抄击徐、兖。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资治通鉴》）琅琊樊崇起兵于莒，东莞郡郡治莒，樊崇的万余人亦即东莞人。樊崇起事后，又与东莞人逢安和东海人（今临沂北）徐宣、谢禄、杨音的起事队伍会合，众数万人。这也就是后来的赤眉军。赤眉军的领导、骨干、主力是东莞人，这支农民起义军，最初主要活动于沂蒙和泰山地域。后来西征，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大功。后立刘盆子为帝，转战长安、洛阳，最后被刘秀打败，近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被刘秀招降。以琅琊、东莞为主力的这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虽然被刘秀招降，但最后结果如何？

樊崇、逢安投降后，居洛阳，“赐宅一区，田二顷。”但其夏，“樊崇、逢安谋反，诛死。”（《后汉书·刘盆子传》）可见投降后的数万东莞赤眉将士，不可能过上平安的生活，他们或者继续征战，或者被驱逐到荒漠之地，或者成群潜逃流落他乡。

士夔先祖是随樊崇起兵，然后西征东讨，失败后南迁苍梧，还是在樊崇义军在攻打莒县时，为避战乱而南迁至苍梧，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战乱中单独一个家族由沂蒙南迁至苍梧，实属不可能。士夔家族避乱于数千里之外的苍梧，可能中间有些过渡环节，比如赤眉军长安、洛阳失败后先南迁至荆州，最后再迁至苍梧。士夔家族南迁后，成为当地的一股重要势力统治交州，他身边肯定有一个庞大的以东莞人为首的北人集团，否则他无法生存和延续。

《三国志·士夔传》载：“夔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夔治左氏春秋，“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拓扰乱，夔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夔兄弟四人，皆为岭南的太守，可以说这时的交州，为山东东莞人的天下。“夔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线索三：师从北海人刘熙避乱交州的士人。

刘熙，北海人，著《释名》二十篇，安南太守。《百越先贤志》云：“刘熙，字成国，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徵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著谥法三卷，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崇山下。”

东汉、魏晋时，北海郡与东莞郡犬牙交错。北海郡治剧，《补三国志》曰：“剧属东莞”；《晋太康志》曰：“剧属琅琊”。这些地名的交错表明，东汉、魏晋时，北海与琅琊、东莞，有很多内在的联系。

刘熙“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一说刘熙为交州人，又说刘熙往来于苍梧、南海，刘熙又任安南太守，卒于交州崇山下，表明刘熙确实与交州苍梧、南海有很紧密的关系，卒于交州崇山。崇山是他故乡北海或东莞的名山，由于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故乡的山名也随他迁移到了交州。

刘熙除有安南太守的官位外，主要对数百生徒教授训诂五经，这些来自北方或主要来自青、徐的士人，对交州文化、政治的影响，不可估量。其主要生徒有薛综、程秉、

许慈等人。

薛综，沛郡竹邑人，孟尝君之后，其祖应为薛国人。《三国志·薛综传》载：“少依族人辟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辟地交州的薛综，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族团的集体行动。“六年卒，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皆传于世子翊，官至威南将军，征交趾还道病死。”《通鉴·卷七十九》：“吴大都督薛翊与陶璜等兵十万，共攻交趾。”薛翊弟薛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三国志·薛综传》）孙皓命薛莹督万人开凿“圣谿以通江淮”，因施工难度大未能完成，“皓追圣谿事下莹狱，徙广州。”后虽免，但又因同郡缪裨罪的牵连，又发配广州，未至。太康三年卒，著书八篇。

薛综家族，因各种原因，与交、广二州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因薛综父子都为经学大师，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把青、徐文化带到了广、交二州。

程秉，《三国志·程秉传》载：“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程秉先承师郑玄，后又师刘熙，而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程秉虽然是汝南人，但他应在北海生活过。

许慈，《三国志·许慈传》载：“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具自交州入蜀。”说明许慈与许靖，不管是不是一个家族，其为学友，关系密切。

许靖，汝南人，是程秉老乡，董卓乱后避地江左，与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郎（东海郟人，经学大师，兰陵侯）为友。《三国志·许靖传》载：“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这说明，许靖、许慈、程秉等到交州后，主要还是依附在士燮门下。

这样在交州士燮门下，就有数百曾从师郑玄，或者从师刘熙的士人。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而北海和琅琊、和东莞，又是分分合合，犬牙交错，从文化上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因此汉末和魏时，青、徐士族和青、徐文化，在交州占有主导地位，一些青、徐地名带到交州，具有客观必然性。

线索四：顾谭族友。

顾谭，顾雍（吴郡人，孙权相）孙，与诸葛恪（诸葛瑾长子，琅琊人）、张休、陈表为太子四友。《江表传》载：“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孙）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三国志·顾雍传》载：“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年四十二卒于交趾。”

顾承，顾谭弟。《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云：“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数年，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表明作为吴郡都尉的顾承，早期曾在毗陵（后为琅琊、东莞人的迁徙地）活动，后又对加围剿山越，有功，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可能因兄顾谭被逐，与兄顾谭及友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顾家为江南吴郡人，但与顾家为友的诸葛氏家族、张昭家族、赵昱家族，都是徐州、琅琊人，其兴趣都是毛诗、尚书、左传，可以说是琅琊文化把他们联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三国时，吴已控制岭南，并不断派官治理。时任交、广二州的行政总管，像士燮家族、薛综家族及刘熙等人，都是青、徐士人；许靖、许慈、顾谭、顾承，也都与琅琊人为友，是青、徐，或者是琅琊文化圈里的人。这些世家名士，既是高官，也是经学大师。因此，早在汉末三国时，齐鲁文化，或者说琅琊文化已远播岭南，并在交、广二州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大背景下，交、广二州的地名、山名、水名及社会风俗，都有带有齐鲁、抑或琅琊的烙印，就不足为怪了。

（未完待续）

王小古年谱 (续)

刘瑞轩

1963年 癸卯 49岁

一月，为姚子扬大夫作写意《荷花》轴，并题诗：“尝得莲心苦，方知莲子甜。莲花红映日，莲叶绿参天……”

1月22日，为朱志舞母亲陈耀兴祝五十大寿，画《松鹤图》《献寿图》二幅中堂。

同月，作写意《雪景白鸡》轴，题曰：“画雪景得神即可，若机械渲染反而无味。”

为沂南杨云程校长作《鱼鸭春柳》轴，并题诗：“宵来湖面微烟霏，摇晃春风柳拂衣。……”

春，作《母雏牡丹图》，并题诗：“木铎千秋业，春风万物生。鸡雏慈母意，灯火教师情。”

3月，创作《花鸟八幅屏》，至5月完成。

4月，二次下菏泽牡丹园写生。经菏泽教育局介绍，赵楼牡丹园技术员赵学增（后由小古改名为天楼）拜小古为师，学习国画。此后三年一直跟随小古学画。在菏泽，曾为地区美术学习班讲课，参加者为十二个县文化馆馆长。作《牡丹图》大中堂。为献高作《柳树鱼鹰》轴、《菏泽女演员》。

自菏泽归来后，集中画牡丹，所遗画迹颇多。

清明前，到邳县冯梦白家，为冯浩作花卉四幅屏：《梅花欢喜漫天雪》《富贵平安》《战地黄花分外香》《芙蓉国里尽朝晖》。另有花鸟《蝶恋花》轴，山水《娄山关》轴。为梦白作《芍药》《梅花八哥》《牵牛》《月季》四幅花鸟屏，为惠思言作山水《桃花源里可耕田》轴。为李道远作写意《雄鸡》轴。又为冯父母画素描像各一幅。

7月，为广义同学作《墨荷》《萱花》《玉米柿子》。

8月，为广义书魏碑联：“爱人无伪气，苦学始虚心。”

夏，原艺校学生张希灵、贾志远、葛常德等到小古家学画，小古免收学费。

长子开微过沂河，为救学生溺水身亡。9月，小古写《伤亡子》一诗：“夜来最怕梦相侵，常到更阑始就衾……”

10月，以作品参加庆祝国庆山东美展。

12月，作写意《葡萄》轴，并题诗：“云龙吞吐气新鲜，累累明珠一架悬……”

12月21日作《题青云画室》诗：“斗室春常暖，心勤夜不寒……”

年底，以颜体《正气歌》参加校书法展。作品当夜被盗。

本年作品还有：《荷花乳鸭》轴，题诗曰：芙蓉红灼灼，湖滨得所居……”《山茶一赠韩一卿学兄》，题诗曰：“大地花开遍，云霞破晓天……”为岳敬敷画《菊花枫树》轴，题诗曰：“灿烂秋容菊圃中，几回雨雨复风风……”《双鸟新柳图》轴，题诗：“无限情怀乐自然，朝朝忙煞画春天……”

以颜、柳、欧、赵四体书（四幅），参加临沂县职工书法展。

为苏北乡友尹纪明老师刻姓名章二枚。

为陈素萍老师刻姓名章一枚。

1964年 甲辰 50岁

1月，为老画友仇瑞平作《葡萄》轴，题诗：“一串葡萄寄客人，苦钻苦研共酸辛……”

春，为农村来学画的商开栋作《葡萄小鸡》轴，作示范。

常与县文化馆著名画家任迁乔（因打成“右派”，自济南下放来临沂）谈心论艺。

5月，为学生邵长缨作《山茶花》轴，并题诗：“雪满山中路，烹茶待客来……”

6月，为语文老师李天星作嵌名联：“谁把天河抛玉带，我攫星斗落胸怀。”又自作嵌名联：“世事由小而大，历史从古到今。”

同月，专署抽调小古等七位画家，成立创作小组，创作向建国十五周年献礼作品。小古的创作任务是：山水《蒙山七十二崮》《开山劈岭》，花鸟《山花烂漫》。

暑假，帮助已任教师的孟祥善报考大学。结果孟考取无锡轻工学院。

到蒙阴写生。赋诗一首：“冒风冒雨上蒙阴，夙愿差酬直到今……”

8月，灌南亲友要小古回故乡工作，小古亦有回苏北之意，为抒发此情，赋诗一首：“脑壳真忘我，天涯有几人？半生经阅事，一个苦吟身……”

8月，为东河作《葡萄》轴、《紫藤》轴。

9月，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创作大中堂《山花烂漫》。

秋，为本地书法家陈允升书魏碑体《毛主席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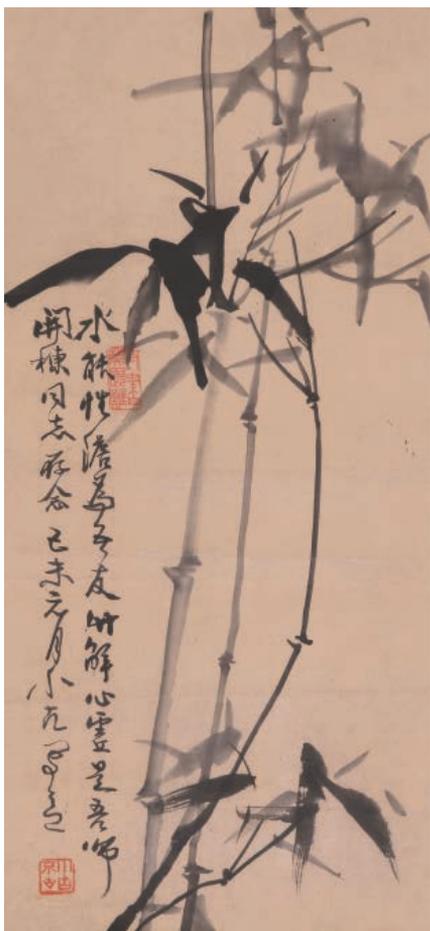
教十二级四班《书法》课，常为学生示范毛笔字写法。

12月，临沂开始搞“四清运动”。语文组有人写小学报，张贴于饭厅，批判小古，称他命名细长瓣白菊为“白毛女”是污辱劳动人民的女儿（此命名来自北京的菊展）。在校内引起风波。

本年，莒南中学车天德、莒县中学高天祥、平邑中学张慕喆、刘岳等美术、书法教师常来小古家，请教书画技法。

1965年 乙巳 51岁

5月，近年眼疾加剧，左目失明，右目350度近视。申请去外地治疗，未获校领导批准。本月，给专署文教局写申请书，要求调回江苏，局领导再三挽留。因调动受阻，与学校领导发生争执。



7月，为学生做《大雁芙蓉图》，并题款：“此画为吾将去临沂之作，可当永久存念。”

夏，为钱勤来老师作画多幅（雏鸡、柳树等），惜皆毁于“文革”。

8月，欲辞职去江苏治目疾，临行前给张寿民画《梅花》轴，并题诗：“几个人生十七年，沂滨欲去又留连……”

10月，学校组织老师去莒南县厉家寨大队参观，小古为劳模厉月举画素描像。

作《桃柳飞燕图》，并题诗：“柳丝摇曳晓风前，桃花初开色更艳……”

为于泽伦老师作《猫》轴。

为立振作墨梅《毛主席咏梅词意》轴。

1966年 丙午 52岁

1月，为逸清作《香远益清》《红梅八哥》《牡丹白头》《晨曲》。

春节，回江苏淮安，在岳父家住10天。期间，为亲朋好友作画多幅。

作小品《蔬果》（桃、葡萄）《花卉》（绣球、石榴）。

5月1日为夫人钱廉作绢本工笔《牡丹》，并题款：“作工笔数十年来未曾留片幅，年来眼疾日重，恐以后难求工细，勉力为此，留与钱廉同志此生共存。”作工笔《昙花》。

4-5月复冯梦白信，指导他创作内容要符合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时代潮流。“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整天学习、开会，小古被迫搁笔。学生到处破“四旧”，抄家，不少古字画化为灰烬。小古为避免损失，将《宋人画册》和一卷字画、各类的牡丹花，悄悄送到邳县学生冯梦白家。

6月，为岳修五大夫作《葡萄》轴、《兰花》轴、《茶花》轴、《枇杷》轴。

临沂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师范，由于工作组的煽动和定调子，小古和张寿民、王汝涛、李天星等十多人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小古的所谓“罪行”是：在《中国青年》封面的毛主席头像上，用毛笔写“王小古”三个字；画公鸡一只腿独立，是攻击党的两条腿走路政策；画《公鸡与太阳》是攻击“红太阳”。

“黑帮”成了专政对象，被关进监护室（像监狱一样的黑屋子）。白天接受大会、小会的批斗、审讯，夜晚在“牛棚”里写认罪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七、八月在红卫兵的监护下，小古和其他“黑帮”一起，每天到沂河拉沙，到梨杭劳改队拉石子，为学校准备建筑材料。

1967年 丁未 53岁

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为大势所趋，工作组为小古、张寿民等人平反。小古有了暂时的自由，可以帮助别人画宣传画、墙报等，刻毛主席各时期头像木版画5件。

与学生梦白通信，说：“至于作画，我决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再从头开始，必然会更有猛进的。”

8月，为避免继续受害，到邳县冯梦白家避难。在此，为梦白作《牡丹》《葡萄》《墨荷》等画十来幅。

1968年 戊申 54岁

1月，复学生冯梦白信，对画人物像进行指导，并交流移栽牡丹和养花



经验。

受全国左的思潮影响，学校“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小古因“历史问题”和运动初期揭发的问题，又被当作清理的对象，受到审查。并强迫在学校的农田里劳动，每天四五个小时。

夏，去江苏淮安顺河镇，与侄婿孟祥善为公社画巨幅油画毛主席像。
三子开端下乡到日照县农村（巨峰公社大官庄）。

1969年 己酉 55岁

继续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9月，复冯梦白信，嘱他来临沂移牡丹、芍药、红百合等花。

11月，临沂地区各大组织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小古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复信给冯梦白，介绍泥塑创作的经验。

1970年 庚戌 56岁

春，临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全县教师集中到九中等处搞运动。根据“文革”初期揭发的所谓“罪行”，将小古打成现行反革命，临沂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于3月25日发出“逮捕证”，在教师集训会场（工人俱乐部），当众逮捕小古和九中校长张伯扬。逮后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近一年。

1971年 辛亥 57岁

1月12日，临沂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发出：“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处被告王小古有期徒刑5年，交本单位监督劳动改造。刑期：自1970年3月25日至1975年3月25日。”

5月，小古被遣送到临沂城东40里的相公五七红校（1970年底，临沂师范教改，在河东办此分校）劳动改造。先在校南养鱼场劳动，入夏后改到院内养猪场喂猪。共喂53头猪，每天要拌上百斤的饲料，挑几十担水饮猪，洗刷猪圈。

同屋的冯常田大爷，本来让他监督小古，但他却同情小古，处处关心保护他。为他安一张长桌，让他白天喂猪，晚上偷偷看书、画画。

期间，为冯大爷作水彩画像一幅，以猪为题材的画有绢本《群猪图》卷，工笔《巴克夏大公猪》，及20多张铅笔、钢笔素描稿。

另有白描《中草药四条屏》，为瓷厂作花卉册页十几页。

县医院宋景云、学生李厚山等来探望，并索画。

1972年 壬子 58岁

给“支左”的临沂驻军吴仲华师政委作《花鸟四条屏》（牡丹、梅花等）。吴政委指示：要发挥小古的一技之长，让他一边劳动，一边画画。于是，红校王校长向县教育局领导请示，得到同意。此后，小古可以使用学校买来的宣纸、颜色公开画画了。

为王校长作《牡丹、雏鸡》轴、《石榴、蓝靛颀》轴。作花卉斗方多幅。

12月，校领导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小古在农村表现很好，建议减短刑期，并增加工资到39元（劳改时只有18元）。但未获批准。

小古写申诉书，要求平反。由学校送到县公安部门，但不予答复。

（未完待续）



巾幗铁流 (三)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1939年，罗荣桓（左三）、陈光（左四）等在山东东平县参加赵铸（前排右五）与李春兰（前排左六）的婚礼时合影。

李春兰（1918—1960），又名李岩，山东武城县人。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学生。“七七”事变后回原籍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参加了八路军津浦支队在旧城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秋，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妇女科长。1939年与赵铸结婚，1940年10月，任中共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妇联主任。1942年8月，任中共滨海地委妇委书记。曾剃光头，女扮男装，或化装成尼姑活动于群众中。在沂蒙“反扫荡”突围中，曾身负重伤。建国后，历任济南市妇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妇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长等职。



1944年9月，史瑞楚与丈夫陈光、儿子陈东海在延安柳树店医大合影。

史瑞楚（1920—1994），山西沁源县人，1937年10月，正在太原川至医专学习的她投军八路军一一五师，曾任少校军医。1938年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结为连理，后随陈光奔赴山东参加抗战，1943年3月陈光离开山东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史瑞楚同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副司长。



刘锦如（1910—1992），陕西延川人。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长，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部长，期间与艾楚南结婚。1939年进入沂蒙山区，任山东省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5年起任山东省妇联主任。1950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监察室主任、哈尔滨市卫生局第一副局长，陕西省政协常委、陕西省儿童福利会副会长。

1939年刘锦如与艾楚南在延安



石澜（1916—2005），浙江嵊县人。舒同夫人（1982年后离异）。原名施莲，早年毕业于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入抗大、女大，又考入中央研究院为研究生，1940年入党，1942年与舒同结婚。1943年春，舒同受组织派遣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参与领导工作，两个多月后，石澜独自怀抱婴儿穿过日伪敌占区辗转来到沂蒙山区，曾任八路军营教导员、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等职。

1942年9月，舒同与石澜在延安王家坪拍下了这张结婚照。



马楠（1919—2013），陕西华县人，曾用名马素珍。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进入军政干训班学习。在军政干校期间，陈沂与马楠相识并产生爱情，结为夫妇。1938年3月入党，任晋豫边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1941年到山东分局宣传部工作，在沂蒙山区大青山反“扫荡”中，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的她左臂被子弹打穿骨折，被俘仍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44年8月，调任新华社山东分社任通讯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文艺》的副主编，哈尔滨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陈沂与夫人马楠女儿小聪在莒南

抗战歌曲选——

《纪念常故师长》

本 编

常故师长，即常恩多，国民党抗战将领，陆军第一一师师长，这首歌曲是1943年为纪念因病逝世的常恩多而作。常恩多事迹详见本期“玉碎沂蒙之一：常恩多”。

E 調 4/4 紀念常故師長 尚尔詞 辛可曲

我們偉大的革命英雄 你在祖國的
 地安眠 人民帶着崇敬的心胸 悲憤的歌
 唱 從侵略者的壓榨下 你穿起了 自衛的武裝 從軍閥的
 混戰中 你鍛鍊了革命的思想 在 民族生死關頭 你
 堅持團結抗戰 張 領導我們 轉戰蘇魯 領導我們
 制裁投降 領導我們 鎮壓叛變 領導我們 復土還
 鄉 你的骨骼 堅硬如鋼 你的神經是 戰鬥的大腦
 你的魄力 支撐着正確的方向 你革命 英雄的氣概 永遠在祖國的
 河山 飛翔 我們要踏着 你的道路 像你一
 樣的堅強 為獨立自由 幸福的新 中國 團結向前

1.2 | 3 — .3 | 1.1 2 1 | 6.5 3 — | 5 5 6 5 3 |
 3—2 1 2 | 3 — 3 2 1 | 1.1 6 3 | 3 3 6 6 — | 3 2. 1 7 |
 1 7 6 — 0 5 | 1.1 1 1 1.7 | 6 0 1 1 1 1 | 2 1 2 3 — | 3 0 0 3 3 3 |
 3 2 3 4 5 0 5 | 5 5 5 5 3 4 | 6 — 6 0 0 5 | 6 5 3 5 6 5 | 1 — 1 0 0 1 |
 1 1 2 2 2 1 2 3 | 3 3 — 0 3 4 3 2 1 1 | 2.1 6 6 | 1 6 5 4 |
 6.5 3 3 | 2 2 1 2 3 | 6.5 6 1 5 | 6 5 1 2 3 | 2.1 2.3 |
 1 — | 1.2 3 3.2 | 1 2 1 7. 6 — | 3 5 6 6.5 | 6 5 5 6 1 5 — |
 2.3 1 2 3 | 0 3 5 5 6 5 3 | 3 — 3 6 6 | 6 5 5 1 2 3 — | 1 1 1 2 1 2 |
 3 — 3 — | 2.3 1 — | 0 5 1 0 1 1 1 | 6 6 5 — 3 0 | 0 2.3 1 |
 2 3 5 — 5 0 | 0 5 1 1 0 6 6 | 0 5 5 3 1 | 2 3 0 5 3 | 2.3 1 — ||

孙仲阳石阙铭

大荒堂主



孙仲阳石阙铭，又名莒南孙氏石阙铭、孙仲阳为父造石阙铭，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正月六日刻石。1965年发现于山东省莒南县原筵宾公社东兰墩村，时为农家砌猪舍之用。原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该阙系单体，紫红色水成岩雕成，出土时阙基、顶已佚。阙身为梯形，上下有榫。原石高180厘米，上宽52厘米，下宽70厘米，厚20厘米。

铭刻存29字，隶书字体，略带篆意。释文为：“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仲升父物故，行（丧如）礼，（刊）作石阙，贾（价）直（值）万五千。”

石阙正面中间，由上而下：第一层为百戏图，画面左上方有两人跽坐观看，是主人；其下方左边有二人相对拥簪，为仆人；右边有两人杂技表演，一人舞剑，一人倒立；下方为舞兽；底部是双人舞。第二层为出行图。第三层乐舞图，左侧有一人鼓琴，后有一人侍奉，右侧有一人翩翩起舞。第四层为宴饮图。石阙左面由上而下：第一层，一犬一鸟；第二层十字结环纹；第三层人首蛇身像。石阙右面是孙仲阳石阙铭。

王汝涛先生与琅琊文化研究补述

薛宁东



王汝涛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在2012年临沂大学召开的王汝涛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王老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做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黄朴民教授特别指出：王汝涛先生的成就，实际上业已成为临沂的一个文化象征。今天，我们站在他毕生辛勤耕耘过的沃土上再来瞻望，这一评价毫不过分。王老对琅琊文化研究付出的心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使他无愧于这个地区的文明进步。在整理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我深有感触。在其他专家学者已有论证的基础上，我就有关情况再做如下补述。

一、对临沂史学界琅琊文化研究现状的基本述评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1995年9月，我受王汝涛先生委托，作为临沂地区代表，参加了在湖北省襄樊市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做了认真准备。在王老的具体指导并亲自补充、修改、审定下，完成《山东省临沂市史学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略》，作为参会论文。魏晋南北朝史是琅琊文化研究的重点，因为琅琊文化在临沂地区最为发扬光大的时期正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一阶

段，留存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临沂市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以来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历程，反映出王汝涛先生作为临沂琅琊文化研究带头人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成绩。

按王老的指导意见，文章将十余年的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个人研究为主，分散的撰写有关的学术论文。

起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临沂文史资料》中有《琅琊王氏故居》，《沂蒙风物志》中有《王祥故里》，《沂蒙通俗史话》中有《王祥和卧冰求鲤》共三篇短小的论文，发表在本地区的书籍、刊物上。这期间，在有关报刊上还零星发了一些研究文章。这些论文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但由于缺乏组织，缺少交流，基本上属于封闭型、自发型的研究。其次，秉笔之初，意在于常识性的介绍，所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一定限制，成果不丰。

第二阶段，成立学会，有计划地组织学术会议和征集论文。

这一阶段自1982年至1989年，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人物诸葛亮、王羲之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1. 关于诸葛亮的研究

1982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山东考察组到临沂考察诸葛亮的故居，并和王汝涛教授交流了有关诸葛亮的学术研究情况，对临沂的研究观点非常赞赏，提出推荐临沂的学者参加有关的诸葛亮研究会议。自此，临沂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开始和外地学者加强了联系。1983年，原县级临沂市文化局何玮同志应邀参加在陕西汉中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诸葛亮研究年会，提交论文《诸葛亮故里初探》（何玮、姜开民合作），王汝涛先生因邀请函投错地址未能到会。1985年，临沂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湖北省襄樊市召开的全国第三次诸葛亮研究年会，提供论文四篇：王汝涛《论政治家诸葛亮》，姜开民、何玮《琅琊诸葛亮家世初探》，郭善勤《根据旧方志考证诸葛亮的故乡》，刘家骥《诸葛故里古迹考》，均被收入论文集。四篇论文结合史料文献，着重探讨了琅琊诸葛氏家世的流传与演变，实地考察了沂南境内的文物古迹，提出汉代阳都的地理位置当在山东沂南境内。过去认为诸葛亮家族举家南下，当地已无其后裔。而临沂史学界学者们考证，并据北齐、隋、明、清各代碑刻记载认为：在临沂地区确有一支诸葛亮家族的子孙生息衍传至今。这些论文观点新颖，论证充分，为确认诸葛亮故里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填补了对诸葛亮故里、世系及少年时代研究的空白，受到了与会学者的较高评价，被认为具有拓荒意义。这次会议促成了临沂地区诸葛亮研究会的成立，并经成都、汉中、襄樊三处诸葛亮研究联合会研究同意，接纳临沂为联合会的第四家成员。

1987年，经过充分筹备，在临沂召开了全国第四次诸葛亮研究年会，临沂代表团提供九篇论文：王汝涛《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之我见》，于联凯《诸葛亮研究方法琐议》，王瑞功《诸葛二论》，赵炯《论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姜开民《浅析诸葛亮的“兴复汉室”》，崔学礼《〈隆中对〉与反馈调节律》，刘家骥《临沂诸葛先茔考》，丁履标《诸葛亮与诸葛亮形象一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札记》，这些论文收入《诸葛亮研究三编》一书，是由王汝涛、于联凯、王瑞功主编的临沂地区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人物研究论文专集。期间，王瑞功还先后在《东岳论丛》《临沂师专学报》发表《从历史人物神话看诸葛亮的历史地位》《自比管乐辩》。王汝涛在《成都大学学报》发表《诸葛亮故里暨阳都年代诸异说辩正》。

1989年，在襄樊全国第五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临沂提交王汝涛《〈隆中对〉评议》，赵炯《论诸葛亮“逸群之才”的成熟条件》等四篇论文。

2. 关于王羲之的研究

1987年，浙江省绍兴市派出考察团来临沂进行学术交流，同时邀请临沂派代表团参加1988年在绍兴召开的王羲之研究讨论会。会上，王汝涛先生应邀向与会全体人员包括日本朋友做关于王羲之的学术演讲，引起很好的反响。1989年，临沂市（当时为县级市）成功举办了一届王羲之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临沂地区代表团提供了20篇论文：王汝涛《有关王羲之生平家世几个问题的考辨》《麦华三〈王氏世系一览〉补正》，唐士文《王羲之生卒年和南渡时期》，孙玮《王羲之生卒年考辨》，唐天佑《〈晋书〉蕴含的王羲之出生年代》，王瑞功《王羲之生平事迹三考》《王羲之政治生涯述评》，王晓真《王羲之研究四题》，牛兆英《论王羲之的政治思想》，赵炯《王羲之思想简论》，宋学农《王羲之〈兰亭诗〉注析》，马静《何延之〈兰亭记〉读后记》，刘家骥《从出土文物看〈兰亭序〉的真伪》，刘茂辰《王羲之对汉字书法的巨大贡献》、《王羲之书事编年》，姜开民《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因初探》，于联凯《魏晋风度与王羲之的美学思想》，马世俊《王羲之肖像考》，许锋《建国以来王羲之研究综述》，薛宁东《书圣事迹传千秋——评王汝涛新作传记小说〈王羲之〉》。这些论文收入由临沂王羲之研究会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研究》一书。过去，国内外对王羲之的研究多侧重书法及传世各帖的评价辨正，这次研究会第一次全面探讨了王羲之兼及王氏家族。对引人注意的几个学术问题，如：王羲之父亲王旷其人，王羲之生年、何时离开琅琊、幼年就学与始学书于何人、政治思想、政治实践以及晚年事迹等均有新说和一得之见，从此扩大了王羲之研究领域，该书获华东六省市图书出版评比二等奖，是我市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的又一丰硕成果。此外，山东大学《文史哲》刊出王汝涛的《王羲之家世问题中的一重疑案》，亦受到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王汝涛以对王羲之研究的丰富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写出一部翔实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传记小说《王羲之》（齐鲁书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王羲之传记，该书已传往法国、美国、日本、台湾等地，深受读者欢迎。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临沂地区王羲之学术研究会同时宣布成立。

3. 关于刘勰的研究

1986年，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萧洪林、邵立均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相继又摘登了两篇争鸣文章，刘新建《刘勰与莒县定林寺质疑》，王汝涛、刘家骥《莒县定林寺非刘勰所建》，三篇论文都是临沂地

区的作者，引起山东史学界的注意。

这一阶段的研究由封闭型研究转为开放型研究，两个学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加强了对外联系和学术交流。

第三阶段：研究活动日趋活跃，步入全国范围的学术交流。

在1989年襄樊会议上，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谭良啸先生的介绍，王老在会后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领导黎虎先生汇报了临沂地区研究概况，并提出临沂两个学会作为集体会员参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申请，不久得到批准。从此，临沂地区的琅琊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1. 积极参与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派员参加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烟台、西安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王汝涛向烟台会议提供了论文；王瑞功向西安会议提供《从王羲之生卒年断定看〈真诰·阐幽微〉注的史料价值》。1993年，绍兴召开纪念《兰亭集序》问世1640周年暨王羲之研究研讨会，王汝涛《古永欣寺在绍兴考》，宋学农《论王羲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被收入《王羲之研究论文集》。1994年在浙江兰溪召开的全国第七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临沂代表团提供三篇诗文：王汝涛《〈隆中对〉评议之二——刘备与其三谋士》，唐天佑《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李遵刚《题诸葛亮》。

1994年10月，由临沂地区诸葛亮研究会、临沂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沂南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沂南县召开全国第八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来自12个省、市42所大专院校及文史研究单位的学者专家136人参加会议，较之以前各次会议，规模大，论文多，研究成果多有深入和突破。临沂代表团提供论文30余篇，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主要论文有：王汝涛《三国托孤的跟踪考察》，薛宁东《三国使用校事小考》，于联凯、于澎《民族文化、沂蒙文化与诸葛亮文化》，王瑞功《魏王城曹嵩冢诸葛城得名说》，赵炯《诸葛亮与曹操改革之比较》，段新荣的《论诸葛亮用人方略》，闵宜《诸葛亮的忧患意识初探》，许锋《曹嵩避难琅琊与诸葛亮避难江东》，刘志刚《略论诸葛亮以弱胜强的思想方法》，高梅《论诸葛亮法治中的弹性原则》，崔学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谈诸葛亮的勤政观》，高军《诸葛亮〈将苑〉的用人思想浅述》，郭善勤《谈三国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高本同《诸葛亮终生实践“才须学也”》，刘存祥《诸葛亮年谱》，刘家骥《从南北朝及隋出土文物看阳都诸葛氏家族》，王瑞功《沂南北寨古墓墓主探

索》，段希洪《从沂南古画像石墓书法风貌看其年代考证》，郭成栋《从一幅汉画像说起，刍议华夏崇拜文化》，赵文俊《汉画像石发源性浅探》，徐淑彬《诸葛故里—沂南阳都故城考古研究》，吴文祺、赵文俊《沂南北寨汉墓》等，这些论文内容丰富，从更广阔的背景探讨了汉代琅琊地区的学术氛围对诸葛亮思想形成的影响，诸葛亮家族的离乡南下，促成了琅琊文化与荆襄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的交流。对闻名国内外的北寨汉画像石墓的考证成为这次会议诸方学者的热门话题，有些论文具有地域优势，所引资料非本地人知之不详，使与会学者开阔了眼界。从而开拓了学术交流的新思路，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朱大渭来信热情称赞这次会议是内容最丰富，学术水平最高的一次，把诸葛亮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可喜可贺。

2. 出版历史名人传记，为深入研究琅琊文化提供我区历史文化兴衰依据。

1991年以来，临沂先后出版《临沂古今名人史略》《临沂历代名人集萃》两部名人传略，其中写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名人：诸葛亮、王祥、羊祜、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廙、王羲之、王洽、王献之、孙恩、刘穆之、羊欣、何承天、王韶之、颜延之、鲍照、鲍令暉、王微、臧荣绪、王僧达、王僧虔、萧道成、丘巨源、王俭、刘勰、王僧孺、徐勉、王融、何逊、王籍、徐攤、王筠、徐之才、徐悱、徐陵、王褒、颜之推等六十余位。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临沂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人才群体，虽然其中有的人已经南渡，生长在江南，但是如果就郡望来说，都属于临沂地区。其思想形成、成长过程无不受益于这一地区的历史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

3. 其它研究成果

临沂师专贾锦福教授主编出版《文心雕龙辞典》，王瑞功教授先后发表《〈南北朝王谢元氏氏系表〉王氏氏系订补》《否定三顾与〈隆中对〉说之一》等论文。当时正在进行的有：关于诸葛亮集详细注释，由王瑞功主编，这项研究在过去所有诸葛亮集研究的基础上，占有资料最为完备；关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注释和译文》，属于品位较高的学术成果，由张霭堂先生编撰；关于《王右军集》的注释。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指导下，临沂史学界同志们共同努力，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

第四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开始纳入有计划、有组织、正规化学术研究的轨道（为避免重复，有关内容合并到下面题目中叙述）

二、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产生和学术研究规划

1995年4月，山东省历史学会在曲阜召开工作会议，王汝涛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水平和研究成果，被邀请为新一届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会顾问，他是唯一从市级单位选出的学术顾问。会上决定成立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以临沂市研究人员为骨干，直接隶属省历史学会。其主要任务：组织有关会员开展学术研究；设计并实施课题研究项目；组织小型化为主、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讨论和省内外学术交流。按照统一部署，专业委员会要认真制定中、长期专业建设规划及年度活动计划，分期逐步完成。

1995年7月18日，山东省历史学会下发专字【1995】3号文：《关于成立“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1996年1月5日，山东省历史学会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在临沂市召开。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汝涛做《山东省历史学会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1996年度研究计划和四年长期规划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报告，它界定了琅琊文化的时间上下限、区域概念，以《宋史·地理志》为依据，统一了“琅琊”的写法。对年度计划、长期规划，研究范围等做出具体要求和安排。报告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同意，并形成共识。实践证明，这些计划和规划绝大部分得以实现，为临沂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琅琊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老的报告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关于琅琊文化的界定。

1. 关于琅琊文化时间的上下限：“琅琊”二字最早见于战国《孟子》：“尊海而南，放于琅琊”。到了东汉设琅琊郡，基本上与今临沂市所属县区相吻合。从各代史书地理志上看，琅琊郡的时间范围应该是：从秦到宋。省历史学会会长戚其章先生在谈及琅琊文化研究时曾指出，不限于历史上琅琊地区这一概念。据此，我们要研究的琅琊文化包括在它以前的东夷文化，和在它以后的元、明、清时的沂州府文化，以及近现代的沂蒙文化。

2. 关于地域的概念，历史上最早设琅琊郡是在诸城一带，我们可以现在临沂市的范围为主，把诸城、日照和所属的莒县也包括进去，由于文化的地域交融，地域的外延可以延至苏北、济宁、泰安一带。

3. 关于“琅琊”的写法，有三种：琅邪、琅琊、瑯琊。自《汉书》至《新唐书》的《地理志》都写作“琅邪”，但今日“邪”字读音不同。建议依照《宋史·地理志》的写法，统一写作“琅琊”。

关于长期规划。

1. 中古时期，琅琊地区大家族的个案研究，是一项填补空白的研究。如琅琊王氏家族，琅琊颜氏家族（以颜之推为主），琅琊诸葛氏家族，泰山南城羊氏家族（今为平邑县），东莞刘氏家族，东莞臧氏家族，兰陵萧氏家族，东海徐氏家族，东海鲍氏家族等。

2. 组织撰写断代文化史工程。如东夷文化史、琅琊文化史、沂蒙文化史，合起来就是一个系列完整的琅琊文化史。这对于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发掘，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具体课题有：沂蒙地区的雕塑建筑；石刻造像及（汉）画像石的研究；对本地区帖学的研究，如琅琊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帖等。研究时可以查清代沂州府七个县的县志，查金石类、艺文类，从中可以挖掘出很多史料。另外我区有名的碑刻，较少有人研究。如临沂的琅琊碑（集柳碑）；“诸葛平陈颂”碑，是传世很少的隋碑之一。经考证，此碑现在我市的普照寺中。再如费县颜鲁公庙碑，碑文为秦少游书，碑阴为米芾书，甚有价值。这些我们应有研究文章。

3. 文学方面，要侧重研究这个时期临沂地区文学家的诗文和小说。如琅琊历代诗词集，诸葛亮文集，王羲之、王献之文集等。

4. 学术思想方面，要研究这个地区儒学、道教及佛教的学术思想。还有兵学思想的研究，虽然孙臤原籍不在临沂，但《孙臤兵法》在这里出土，我们就有这个研究任务。

5. 书法方面，要研究王氏家族以及其他人的书法绘画。

6. 史学方面，这个面更广。如很少人研究过的和太平军、捻军同时起义的幅军起义。还有红袄军起义、吕母起义、赤眉起义都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有马陵之战、甲午之战左宝贵的研究等。军事方面，要研究这个地区的军事割据和重要战争。

7. 在风俗方面，要研究颜氏家训中所谈到的南朝北朝风俗。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琅琊文化，更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8. 在文化传播方面，要研究这个地区各大家族永嘉南渡后对于江南地区文化发展



的重要影响。

9.另外，还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为什么这个地区在中世纪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很多无论是军事、科学界、政治、思想界还是文学、艺术界各方面有名的人物，而到了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文化就呈中衰现象，人才寥落呢？在今天改革呼唤人才，人才推动改革的时代，要从社会、经济、政治多方面探讨一下原因，为新时期培养与选拔人才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0.关于组织学术研讨会：东夷古国学术研讨会，荀子学术研讨会，颜氏家族学术研讨会，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等。

从王汝涛先生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琅琊文化研究的信息含量很大，学术思路清晰，研究方向明确，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在王汝涛先生的带领下，大家精诚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活动，多项成果获奖，发表、完成专著、课题、论文百余项，受到省历史学会表彰和好评。委员会主办《琅琊文化研究通讯》，及时交流研究情况。王先生更是身体力行，以年近八旬高龄，笔耕不止，研究成果不再重述。

这里提供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戚其章1998年给王先生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到，两位前辈满腔热忱的以扶持后学，薪火相承为己任，对勤奋好学成果颇丰的年轻学者厚爱有加。戚老敬佩王老对琅琊文化研究的敬业精神，赞扬琅琊文化专委会的工作，感谢王老对省历史学会的支持。全文如下：

汝涛学兄：

接奉手书。又见附寄之《周郟文史论文集》，十分欣喜。周君尚未到而立之年，竟有此学力与文笔，确实难得。诚为吾兄所言，若进而不止，其研究前程未可限量也。

延庆返济后，遂及拜望吾兄情况。得知吾兄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勤奋笔耕，令弟等敬佩不已。唯望吾兄不要将弦绷得过紧，张弛得宜，常保学术青春，此非弟一人之厚愿，实我省许多学人之期盼也。

吾兄为学会顾问，历来对学会工作大力支持，实为我辈老年史学工作者的楷模和表率，余亦久以吾兄为学习之榜样。余暂为忝居会长之职，实形势使然，非私愿也。幸有如吾兄者之支持，否则此届早已决定辞之矣。尚望吾兄不必辞去琅琊、古郟两会兼职，具体工作可委托妥实之人办理，不误吾兄之课题也。琅琊专委会在我省办得最早，乃先进之典型，全省皆知，全靠吾兄之主持，必会越办越好，这杆旗一定要继续树起来。吾兄以为然否？

每年秋季会议甚多，又要准备搬家，书籍的整理和包摺非常麻烦，只能早些慢慢地做。吾辈确实老矣，精力大不如前了。故吾信中所言，却有同感。望多加保重，并以此共勉。

专此，敬安。顺颂

著祺！

弟 其章

1998年10月17日

如今两位老学者虽然已经作古，但是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真诚、感人的友谊佳话，他们为弘扬琅琊文化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三、最后一篇力作：《中世纪琅邪郡（国）精英的伦理思想》

2005年，我已调到省城工作七年之久，主要从事山东的人文自然遗产的保护开

发工作。当王先生得知我3月份去台北参加由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山东省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人文、自然、伦理”学术研讨会，他老人家不顾84岁高龄，亲笔写下《中世纪琅邪郡（国）精英的伦理思想》一文，让我带到会上进行学术交流。这篇文章既陈述了琅琊郡的沿革与琅琊文化的产生，又论证了琅琊郡（国）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强调了琅琊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传承、融合和不同，比起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和详实。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王老生前系统论述琅琊文化的最后一篇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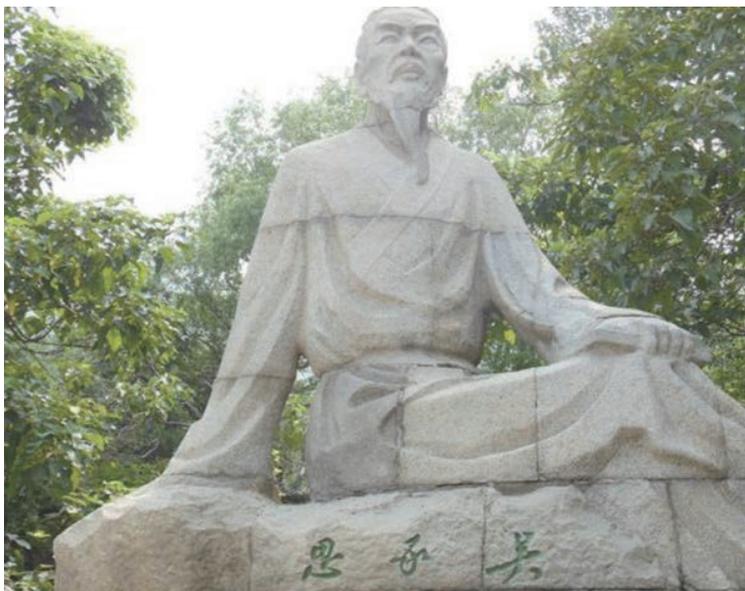
王老指出：琅琊在秦设郡以前，即为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朝以前，这里属东夷地区，近代考古发现东夷人创造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在此地区内有遗址上千处之多。其中在莒县陵阳河发现的陶文，使中国有文字的文明提前至距今6000年以前，与埃及文化及巴比伦文化时代相当。周成王时，周公东征，灭东夷诸国，建齐、鲁两国以代之。齐以周文化为辅，以东夷文化为主。鲁以东夷文化为辅，以周文化为主，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齐鲁文化。战国后期。楚扩地占领了齐国长城以南地，楚文化又进入了这一地区。秦并天下以后，琅琊郡吸收了一部分齐文化和鲁文化，与原有的东夷文化交融，形成了带有现代地域特点的琅琊文化，具体地说就是琅琊人既有鲁人的质朴好礼，又有齐人的足智多谋；既重亲亲，又重尊贤；既重农桑，又重工商；既坚定厚重，又视野开阔。琅琊文化在当地延续了约800年，由于此郡大族西晋永嘉元年后，大举南渡，定居江左，也部分地影响了三吴地区。上举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齐文化为管仲、孙子；鲁文化为孔子、孟子；琅琊文化为曾参、诸葛亮、王羲之。

之前，兰州大学张崇琛教授将诸葛亮、王羲之列为琅琊文化代表，王汝涛先生在此基础上，首次增加了曾参。他认为，曾子所代表的文化应该属于鲁文化，但由于他的故乡在秦以后设立的琅琊郡，他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琅琊文化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孝”这一种伦理观念，今传的古代表二十四孝中，有七人是琅琊人。其中，王祥的孝行至今在其故乡琅琊临沂仍旧传为美谈，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把他列为古代琅琊精英之首。王老关于琅琊文化代表人物曾参、诸葛亮、王羲之三人伦理思想的论述，加深了台湾学者对齐鲁文化和琅琊文化的认识，对两岸传统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

王老曾在《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自序中谈到，自1950年调至山东临沂工作。对临沂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在他的诗词中多次提到，“半生沂畔寄行藏，已认他乡作故乡。”（《迁居》）“琅琊已是关乡地，依斗望京不自嗟。”（《闲居》）“老境心安是处家，卅年闲散住琅琊。……王葛世家资探讨，苏辛词旨送生涯。”“情恋琅琊余一翁，尚余一抹夕阳红。”（《蜗居》）他出版的文集自题为《琅琊居文集》。王老不仅研究琅琊文化，而且亲身践行琅琊文化，包括琅琊地区醇厚质朴的民风以及不慕富贵、不尚繁华，办事认真求实的态度；琅琊文化兼容、综合的特点；谨慎、执着、坚毅的精神等都在他身上折射、继承和体现出来。先生对琅琊文化有计划全方位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势下，我们应该继承王汝涛先生未竟的事业，认真整理挖掘琅琊文化，使之在今天的临沂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正能量和更多新的担当。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 (下)

赵丹峰



明、清两代，吴姓族中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建树的文化名人。众所周知，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此期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而吴承恩和吴敬梓正是明清小说界的两位领军巨匠。吴承恩系明代著名小说家。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两世修文”的书香之家。自幼博览群书，且爱神话故事。宦途失意后便专意著述。吴承恩一生著述颇丰，诗文俱佳。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创作了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这部具有丰富内容和思想光辉的神话小说，是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作完成的。作者用幻想的形式反映社会矛盾，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其所塑造的孙悟空这一艺术典型，是人类智慧与反抗精神的完美结合，他神通广大、降妖除恶的超常本领与爱憎分明的刚率秉性，深为代代国人所喜爱，已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整体记忆。

吴敬梓系清代杰出的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出身于甲科鼎盛的缙绅之家。雍正初举秀才，本可像其家族的其他人一样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其家六十年间相继出进士举人及出任官员十五六人），但因家父去世后，家族内部因财产和权利互相争斗，使他对封建官僚家族虚伪的人际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厌恶，遂决计终生不入仕途。安徽巡抚赵国麟爱其才华，曾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举荐他“博学鸿词”，但吴敬梓却以生病为由推脱不去。此后移家江宁（南

京），靠卖文为生，最后客死扬州。特殊的官宦家族背景与大起大落的自身生活遭际，使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罪恶及部分官绅、清客们的肮脏灵魂洞若观火，于是，他便竭尽心力，以如椽的巨笔，创作了以描写士林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以辛辣的笔锋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小说语言凝练准确，生动传神。所塑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如小说中的范进，半生贫困潦倒，于五十多岁才中秀才，继而中举，入仕为官。命运的突然改变，竟使他喜极而疯。进入官场后，不仅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原本忠厚老实的他，亦逐渐学会了蝇营狗苟，终成为卑污、庸俗的官僚。作者用不长的篇幅，就极为生动地活画出了范进中举前后各类人物的言行与嘴脸，可谓入木三分，使人读后几乎终生不忘。《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成书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鲁迅认为吴敬梓“秉持公心，指责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为此，鲁迅认为：“中国自《儒林外史》出现，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此话当系确评。

此期，吴伟业和吴嘉纪驰名诗坛。吴伟业系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其诗以七律与七言歌行见长。清军入关后，吴伟业为保全家族，被迫赴京仕清，三年后借奔母丧南归，从此隐居故里。对屈节仕清一事，吴伟业一直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所以感叹兴亡和屈节为事便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题与基调。《圆圆曲》即其咏史喻世的代表作。原任清辽东总兵的吴三桂，在闻知其爱妾陈圆圆被进京后的闯王李自成所得后，本已决心归降李自成的他，遂改变主意降了清，并以为崇祯皇帝复仇的名义引清兵入关，成为千古罪人。对这一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史实，吴伟业在长诗《圆圆曲》中作了记述，发出了“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的咏史感叹，受到时人与后世的高度评价，传诵甚广。吴嘉纪亦系清代代表性诗人。明亡后，曾在北方参加过抗清斗争。终生不仕，生活贫苦。其诗作多反映家乡（泰州）江淮一带盐民和灾民的疾苦。《绝句》是其描写盐民辛苦劳作的代表性诗作：“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煮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亦有反映其他内容的佳作，如他与妻子王睿（亦是诗人）十分恩爱，于苦难中相濡以沫，共度时艰。结婚二十年后，在妻子过生日时，他写下了《内人生日》诗：“潦倒邱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溪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送，依旧归来向尔谋。”此诗情真意淳，颇具感人心肺的艺术效果，在中老年读者中尤能引起强烈共鸣，故为人传诵。

此期，吴姓中还出了数位丹青大师与篆刻名家：吴伟系明代杰出的绘画大师，浙派支流江夏派的奠基人。自隆庆至万历年间，江夏派（亦称吴门派）绘画倡行天下。吴伟系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幼因孤贫，流落常熟，被钱听收养，让他伴其公子读书并供他学画。在师法吴道子和戴进的基础上，自创一家流派，遂扬名天下。曾两度被召入画院任职，受到皇帝赞誉。明宪宗朱见深赞之乃“真仙笔也！”孝宗朱祐樞赐他“画状元”印。生性耿介的他并不迷恋仕途富贵，不久便称病南归，居南京秦淮河一带作画自娱。擅长画人物与山水。他作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择画具，除毛笔外，其他物什如莲房亦可当笔使用，挥洒泼墨，皴如乱麻、紫荆、破网，张显出其雄健奇逸的画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芝仙图》是其人物代表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溪山渔艇图》是其山水画的代表作。吴历和吴宏系清代著名画家。吴历为清初六大家之一。擅长山水画，初时笔墨苍润。在澳门居住一段时间归来后，画风渐变，作画多用干笔焦墨，构图设色更显繁密苍郁，凝重浑

厚。传世作品有《湖天春色图轴》等。吴宏系顺治、康熙年间的著名画家。属金陵八家之一。画风纵横淋漓。主要作品有《柘溪草堂图轴》《江城秋访图轴》等。

在科学领域，明末的吴有性（字又可）和清代的吴瑭（字鞠通）作为中国瘟疫学的奠基人而被载入史册。是时，国内一些地区瘟疫流行，医者用治疗伤寒的理法不见疗效。吴又可通过实际观察，认为瘟疫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与伤寒病因根本不同。在其医著《瘟疫论》中，进一步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如痘疮、斑疹、大头瘟等。他的创见对瘟疫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吴瑭作为江淮名医，毕生致力于瘟疫学的研究，著成《瘟疫条辨》一书，提出瘟疫的三焦辨证理论，并拟定了治疗方法与方剂，使瘟疫学更趋系统与完备。另有医案五卷，对杂病医治颇具独到之处。

吴其濬是一位集清廷高官与杰出植物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吴姓名人。他系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道光年间，先后任兵部侍郎和湖北、湖南、云南、福建、山西等省巡抚或兼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酷爱植物学的他，并不想在宦海中消磨时光，他利用自己宦迹遍天下的有利条件，留意各地物产丰瘠，关注民生，在进行广泛而深入地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根据耳闻目睹和参考历代文献，撰写了《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2卷。后经修改扩充，终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该书计38卷，共收记植物1714种，比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植物还多519种。全书共有插图1865幅，其绘制精确度可资鉴定科、属，甚至到种。该书出版后，欧美日等国学者争相购阅，成为国内外不可多得的植物学专著。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吴姓人士继续在科教、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在科教领域颇具代表性的科学家与教育家有吴玉章，系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在法国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列主义，因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建立，曾于1923年组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后经其学生赵世炎介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的身份从事统战工作。1927年，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0月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毕业后，在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工作。1933年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和瞿秋白、林伯渠及苏联语言学家一起研究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为中国文字改革事业做了前瞻性与开拓性的先导工作。1935年冬赴法国，先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1938年回国，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文委书记，为战时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出了重要贡献，是解放区战时人民教育特别是高等干部教育的开拓者与主要领导者。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华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等建设管理人才、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和汉字的简化普及工作，竭尽心力。吴玉章系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是建国后为数不多的资深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而他从三十年代初即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从事对革命重要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而后从延安到北京，风雨兼程，几十年一以贯之，担任红色大学的校长直至1966年冬逝世。这样的特殊经历，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此一人。

吴文俊系著名数学家。1951年从法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主要从事拓扑学的研究。在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中成果显著，被数学界称为“吴文俊示性类”“吴文俊公式”等。作为中国机器证明领域的开拓者，他解决了平面几何与初等微分几何的机器证明问题，并在电子计算机

上得到了实现。

吴有训、吴学周、吴大猷、吴健雄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于1950年后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作研究时，对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在高校和中科院工作期间，致力于组织、参加近代物理学研究，被誉为开展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先驱。他毕生从事高教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物理学人才。吴学周系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在美国读博时，即测定了乙炔等14种气体的远红外光谱，回国后，又带领其科研团队完成了“丁二烯的紫外吸收光谱”等十余项重要课题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多原子分子的结构与化学反应机制问题，为中国多原子分子光谱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吴大猷于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84年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原子物理学和光谱学的研究，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著有《多原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散射的量子理论》（与日本学者合著）、《理论物理》（共七册）等，指导、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吴健雄系著名美籍华人女物理学家。其在物理学领域的重大贡献是在1957年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1963年又证明了 β 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等。1975年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同年获由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勋章。她生前关心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73年后多次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在东南大学建立了吴健雄实验室。

在社科、人文领域的吴姓名人有吴晗，系著名历史学家和剧作家。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先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吴晗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尤精明史，是公认的明史研究大家。著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和《学习集》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吴晗还只是在国内史学界、文化界及北京市颇为知名，可是到了1965年冬季之后，由于其于1961年创作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最高领导人的否定，并由江青指派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奇文在全国各大报刊相继登载后，吴晗便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摧残。1966年夏季，他又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一起，被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口诛笔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亦被公认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9年，一代著名史学家和剧作家吴晗被迫害致死。1973年初，身陷囹圄的廖沫沙得知老友吴晗已于三年前含冤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悲愤交加，含泪写下了悼吴晗的七律：“《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场。《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低眉痛改《元璋传》，举眼依然未过关。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痛改”句指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朱元璋传》加以修改）。这桩堪称旷古奇冤的文字狱和随即开始的“文革”浩劫，已作为中国当代史上的沉重一页，铭刻在亿万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汲取教训、开创未来的历史教材。1978年12月，党中央为吴晗彻底平反昭雪。

吴景超和吴文藻均系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后回国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长期重视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他于1929年出版了《都市社会学》，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开拓者。1936年，他在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至今仍对我们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吴文藻十分重视社区研究，认为开展社区研究是社会



吴昌硕花鸟画四条屏

学中国化的一项主要任务。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单位是制度，制度的运用是功能。吴文藻的上述理论与观点，在我们当下开展的城镇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

在文艺界，吴姓名人主要有吴昌硕，系清末民初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博才多艺，书、画、篆刻无一不精，是当时上海画苑、印坛公认的领袖人物。他先学赋诗与书法，而后学画，有“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之谓。绘画擅长写意花卉，以篆刻、狂草笔意入画，线条凝练，着墨浑厚，雄健古拙，气度苍莽。题款钤印，配合有致。晚年所作牡丹，呈鲜艳水润之态，极富生气，令人叫绝。其画风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书法擅长石鼓文，朴茂苍健。篆刻师承前人之长，自成宗派，以雄浑道劲见长，被同道推任西泠印社社长。吴作人和吴冠中是继吴昌硕之后的当代著名画家。吴作人早年赴法国、比利时学习，回国后毕生致力于美术教育与绘画创作，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他兼善中西绘画技法，其油画作品感受细腻，风格明快；中国画多画天鹅、雄鹰、金鱼、熊猫等，作画时借鉴西方水彩画的表现形式，风格高迈雅逸。吴冠中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赴法国留学，1950年学成回国，供职于中央美院。吴冠中是位油画和国画兼工的画家。在油画的创作方面致力于民族化的探索。作品多描绘江南的旖旎风光，以丰富、美妙的色彩，表现水乡粉墙黛瓦、湖光山色中所蕴含的诗情画意。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和《鲁迅的故乡》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国画创作。作画时从写生入手，简括形象，构织成具有抽象性的山水形态。代表作有《春雪》《长城》等。1991年，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法国政府，授予吴冠中法国文化最高勋位。吴冠中曾说：“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我的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了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此话颇富哲理，耐人寻味，是画家做人准则与艺术追求的形象总结与真实写照。

挺立在国际讲坛的沂蒙脊梁

——注目吉立新

刘凤才

被伟大领袖毛泽东誉为“骨头最硬”的中国人——鲁迅，在百年前曾把致力于社会变革、为民造福的英雄们敬称为“中国的脊梁”。“脊梁”们当然不仅仅生长于政坛。今天，在世界医学讲坛上挺立着一柱崛起成长于我们沂蒙杏林、专医脊柱、堪称自豪的“脊梁”，让人注目赞叹——

吉立新，市人民医院北院副院长兼脊柱外科主任，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脊柱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康复医学会山东省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山东省骨科分会委员，市劳动模范，首届临沂市十大杰出医师之一。

他是沂蒙人乃至中国人创新智慧的一柱挺拔脊梁，是与罹患脊柱疾病的老百姓间的一座真情桥梁，是一个在业内独树一帜的优秀团队的坚实栋梁。

创新领航，让他在国际讲坛挺起中国脊梁

2009年某天，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讲坛，健步走上一位来自中国临沂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此即吉立新。他高个方脸，文质彬彬，又脊背笔直，昂首挺胸，信心满满，让与会者耳目一振。这里，正举行亚洲颈椎非融合技术学术研讨会。若干国家与地区的众多相关专家学者们，齐聚于此，就脊柱非融合技术展开研讨交流。吉立新是中国的唯一大会发言代表。他的学术报告，充满了对于创新课题的深刻认识与阐释，并以自己的创新性实践作了有力论证，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高度好评。



人体脊柱，老百姓俗称人的“大梁”，具有支撑躯干、保护内脏、进行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者，它更是人的中枢神经——脊髓的重要载体与保护层，是生死攸关的“生命盔甲”。而脊柱外科，因其高度复杂性、“禁区”颇多、风险甚大、难度很高，属于外科的尖端领域，也往往是一个医院、某个医生外科水平的标杆。而要在这一领域达到一定的高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保持理念与实践的创新。创新，是一个医学科技工作者思想保持活力、技术不断更新的基本因子；是防止思维与技术“骨质疏松”“退行性变化”的最有效办法。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创新技术首先来自于理念创新，创新理念才能破冰领航，迅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吉立新正是这样一位思想敏感、目光敏锐、行动敏捷的“创新族”。他对一切新理念、新观点、新技术，向来持有特殊的敏感。当传统观念、惯性思维、已有成规仍在束缚、迟滞着许多犹豫不决者时，他已经在新理念、新实践的道路上捷足先登了。

2005年3月和2006年5月，吉立新先后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和德国柏林举行的“全球性脊柱非融合技术学术研讨会”。在达沃斯这座世界著名小城，他对高山滑雪名地、全球经济论坛等名胜，对如诗似画的欧陆风光，都显得有些儿迟钝与木讷，他的听觉、视觉与感觉，全部集中到了脊柱外科的前沿技术上。其时，一种新型颈椎人工椎间盘在欧洲成功应用于临床，并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举办了一场有关该技术的学术研讨会。吉立新立即敏锐地捕捉住这一信息，感觉在国内实施推广这项新技术的时机已经到来。当即决定，自己要力争在第一时间将脊柱非融合先进技术引入国内。后来的柏林会议，只是为他的行动提速提供了推进剂。于是，若干个“第一”的署名权，归到吉立新的名下：

2007年1月，临床用于脊柱非融合的人工椎间盘“ProDisc-C”在国内刚刚注册，吉立新便随即开展了国内第一例ProDisc-C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同年10月，他再接再厉，完成省内首例Dynesys腰椎弹性内固定手术。在脊柱非融合技术方面，一步走在了国内同行前例。

2009年，吉立新去德国进修培训。他极为珍视这次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心揣手摹，取得了腰椎人工椎间盘置换的技术准入证书，成为国内具有专业资质开展此类手术的第一批学者。

吉立新参加过众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原来多半是作为听众，没有“话语权”；而在2009首尔这次会议上，他已经作为为数不多的报告人，站立在国际讲坛上，让世界同行们刮目相看。至于在国内，他更是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在北京、广东、福建及省内各地作过多场学术报告和健康讲座。

吉立新之创新，不仅仅是“非融合”。

1987年，吉立新从潍坊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市人民医院骨科。数年的临床实践，让他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临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困难，也让他深深感到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提升层次、拓展空间的必要与紧迫。于是，1996年，经过刻苦努力，他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当时市医院外科第一个获得研究生学历的青年医生。3年深造“充电”，不仅更加夯实了他的基本功，最重要的是让他的“理念之翼”飞得更高，“目光之旅”看得更远，让他不甘于在行内亦步亦趋，而是勇于并且能够跨越飞跃，与最先进理念与技术同步接轨；勇于并且有实力向高难度系数挑战，为临沂拿下全省乃至全国的脊柱外科“金牌”。

在国内，他率先开展了“脊柱后凸畸形截骨矫形术”“单一入路及前后联合入路全脊椎切除植骨内固定术”“腰椎巨大动脉瘤样骨囊肿切除”“枢椎椎管内巨大

骨软骨瘤切除”等众多疑难复杂手术。

在省内，他最早采用现代内固定技术治疗寰枢椎骨折脱位及颅椎区畸形。

在业内，他率领同事们，突破了枕颈区、颈胸交界区限制脊柱外科发展的瓶颈，实现了从寰枢椎到腰骶椎前后路手术无禁区。在颅颈区、颈胸交界、上胸椎等部位的手术日臻成熟，走在了国内外先进行列。前后路联合手术治疗脊柱结核、肿瘤、胸椎管狭窄症，齿状突骨折前路空心钉固定寰枢关节脱位后路经侧扶根复位固定等先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寰枢椎及枕颈区的手术理念与方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国内较早、省内率先独立开展了寰枢椎椎弓根系统复位内固定、人工颈椎间盘置换、颈椎肿瘤全脊柱切除及稳定性重建、上颈椎骨折脱位前路钢板内固定等高危高难度手术，得到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高度赞赏，深受病人的普遍信任。虽然是市级医院，吉立新是市院脊柱外科主任，但是很多兄弟市院如济宁、莱芜、枣庄、潍坊、威海、日照等乃至省级医院，在遇到难题时，都慕名而来请教，或者诚恳邀请他去帮助指导。

当吉立新在世界讲坛上挺立起标志着“中国临沂”的脊梁，赢得一片喝彩时，作为沂蒙老乡，我们应当满怀敬意与自豪地向他说一声：谢谢！

关爱生命，让他在医患间搭建起真情桥梁

某天，一位质朴的沂南母亲手挎提篮，风尘仆仆而又满面喜庆地来到脊柱外科，非要见见吉立新，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她小心翼翼地从小提篮中拿出几副自己精心纳制的绣花鞋垫，满怀感激地递到吉立新和同事们手中。这位来自沂蒙红嫂家乡的妇女，把吉立新他们当成了当年的人民救星八路军和解放军。接过鞋垫，吉立新立即回忆起先前的一幕：

2004年间，正是这位母亲，陪着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第一次找到了吉立新。那时她愁眉紧锁，满目无奈。儿子的后腰际长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拳头般的大“疙瘩”，跑遍了济南、青岛等地的大医院，大夫们见此情状，都面露难色，不敢收治。她只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了市院脊柱外科。经反复诊断，孩子患的是“腰椎巨大动脉瘤样骨囊肿”。此病最大危险，是累及动脉。如若不切除，日益长大的囊肿终会溃破，使患者致命；如若手术切除，易导致大出血，如抢救失措，后



果不堪设想。怪不得连那些大医院的大夫都不敢接治。然而，在巨大风险面前，吉立新仅仅犹豫思考了一瞬。望着母亲焦灼渴求的目光，想到医生的天职，他毅然决定收治患者。关键的关键，是精心做好术前各项准备，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他对患者再行造影检查，弄清病灶的细微之处；先行放射治疗，尽量减少术中出血；与麻醉科反复磋商术中供血方案，并预留患者自体血液以备应急……手术在周密准备下如期实施，经3个多小时紧张而井然的“战斗”，顺利成功。患者康复出院，长大后外出打工，娶妻生子，幸福圆满。

那一双双一针一线纳制的鞋垫，凝聚着患者及其亲属多少不尽的感激之情！

自走上医坛的第一天起，吉立新对人之生命意义与份量之重，有了深刻感悟；对职业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境界。作为一个医者，首要一条就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就要殚精竭虑，穷尽毕生，关爱生命。这也是一个医者的立身之本，是医德的生发之根。

——敬畏与关爱生命，对患者就要全心全意，竭尽全力。脊柱科病房里，住着一位不久前才动完手术的中年患者。手术前，他已经几近瘫痪。现在，每天早上他都在明媚的阳光下散步活动，见到吉立新和同事们，他还很骄傲地举举臂抬抬腿，展示自己良好的状态与情绪，更是对吉立新及同事们的特殊“致敬礼”。患者的病情曾经给医生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经外地多所医院检查，既疑似颈椎病，又疑似长肿瘤。大夫们对他的回答都是：反正是有毛病，做手术算了。病情还没搞清楚，就要在他身上动刀，他当然很不甘心。最后，患者来到市院脊柱科。吉立新给他重新做了认真检查，竟一时也难以明确“定性”。他诚邀神经外科的同事专家前来会诊。答案接近肯定于颈椎病，又留下了一个“？”的小尾巴。这个“小尾巴”，即便是一般专家，也可以忽略不计了。但吉立新却认定不彻底搞清病情绝不贸然手术的理儿。他与患者不沾亲不带故，素不相识，病人也无苛求。但为对病人负责，他费尽周折，利用一切关系，与国内脊柱权威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取得了联系，经详细沟通，反复研判，最终确定为颈椎病。手术治疗也最终证明了吉立新认真负责的正确无误。在熟人找熟人、亲朋托亲朋往往都难以见到“真神”、求得“真经”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中，这个故事让笔者倍受感动。而吉立新平淡地说：“这都是份内的事情，本来就该如此。”

——敬畏与关爱生命，对患者就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1999年的一天，吉立新手持一块固定小臂用的医用钢板，来到口腔科。他是来借用人家的小电磨钻改造器械的。这位刚刚毕业于北医大的研究生，此刻就象一位车间师傅，把牢钢板，翻来覆去，一丝一毫地精心打磨着。口腔科的同事们不知其为何如此，一头雾水。大半天功夫，他累得手疼臂酸，终于大功告成。没人能想到，吉立新就是用这块自己改造的板儿，完成了院内首例“颈椎后路固定手术”，而在全省，也是最早进行的此类手术之一。而所以亲自动手改造器械，正是来自他“想百姓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帮病人之所需”。他知道，在我们老区，多数百姓的生活目前还不富裕，尤其是贫困群众，最怕最愁的就是患病治病。他常常对人讲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人文观点：作为医生，绝不能只把患者简单地看成一个“自然生命体”，而首先要视作“社会人”。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条件不同，绝不能简单地用“有钱就治病，无钱请走人”来处理。尤其是对贫困患者，更要倍加同情，倍加关怀，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力争用最低的成本，最好的技术，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最好的服务。

——敬畏与关爱生命，对患者就要细致入微，无微不至。数年前，费县某地一位患者在亲属搀扶下来到了脊柱外科。其时，患者年仅21岁，应当正是年轻力壮

的时候，但是已经基本不能行走，勉强迈出一小步，也是踉踉跄跄、趑趄趑趑，让人看了心头打颤，手心掐汗。经诊断，其患的是“寰枢椎椎管内骨软瘤”，瘤体已充满椎管，脊髓被压成了薄片，若不及时手术，后果极为可怕。吉立新亲自主刀，为其成功地进行了手术。但这只是第一步，防止术后并发症也尤为重要。吉立新又亲自指导和实施术后护理，连续数日，时时对患者进行精心监护，对护理人员耳提面命，不厌其详地提出要求，并且一点一滴地动手安排调整患者的体位，终于使患者顺利渡过了手术关、护理关，最终脱离了“鬼门关”。脊柱外科风险极高，难度极大，并发症多。吉立新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要认真。而在脊柱外科，不但要认真，尤其要细致细心。细节不但决定成败，更决定人的生命。”这些年来，他“患”了一种高度紧张的“职业病”：只要病人说哪里稍有一点感觉不适，他就提心悬胆，问题不解决，他就彻夜难眠。即便病人无主诉，他也能从病人的表情、体位、行动等微小的反映上感觉得到，观察得清，立即寻找原因，恰当予以解决。他经常教育要求全科人员：“做一个好的医护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这就是心中时刻想着患者，事事严谨细致。”“不放过任何细节，把手术并发症降到最低”是他对本科提出来的一贯服务宗旨。近十年，吉立新和同事们共完成6000余例高难度、高风险及诸多高龄患者手术，在国内同专业科室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无一例死亡病例、无一例截瘫的佳绩。

“大医精诚”是吉立新的座右铭。“精”者，精心精到精细，“诚”者，诚心诚意诚恳。他在关爱生命的具体行动中，践行着医德；在对医德认识的不断升华中，激励着自己更加“精诚”地行动。他说：“医德，不是空洞的，是具体的。不是开几次会，学两个文件，搞几天培训，喊几句口号，问上几句冷暖，就能树立起来的，是在一点一滴的精诚行动中培养、一步一个脚印的精诚进取中体现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悬壶，“大医”成矣。

求实大度，让他成为优秀团队的栋梁

1999年，市院脊柱外科正式成立，是省内乃至国内最早成立的脊柱外科之一。非是夸大其辞，在脊柱外科，吉立新当仁不让地可以称之为业务开拓者，事业奠基人。自他担任了科室主要负责人后，又与全科人员精诚团结，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带出了一支优秀团队。十余年来，他们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28项，多为首创性工作，填补了省内空白，其中对于寰枢区、上胸椎病患的治疗理念和方法，以及脊柱结核、肿瘤、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手术治疗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脊柱外科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省内规模最大、手术量最多的脊柱病治疗中心之一，又是鲁南、苏北地区唯一集诊断、治疗、科研、教学于一体的脊柱及相关疾病的专业科室，黄淮海经济区脊柱疾患研究治疗中心，在省内外国内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其中仅各类颈椎病的诊疗就已逾万例，手术近4000余例，居山东省之首。吉立新，堪称这支优秀团队的主心骨和栋梁。

他之所以能带出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集体，与他的人格魅力密切相关。而他的人格特点，可以归纳为8个字：真实，大度，开放，提携。这8个字，又具体表现于4条：

其一，求真务实。他把“真”与“实”，看作精湛医术与良好医德的基石，当作“精诚大医”的“脊柱”与“骨髓”。他说：作为一个骨科医生，自身，尤其是精神与思想，必须健康硬朗，正直挺立。如果不求真务实，就如同本身患了“骨折”“骨质疏松”或者“瘫痪症”，怎么能去为他人治病？首先需要医好的恰恰应



当是自己。在时间不长的交谈中，对圈内一些不健康现象，象追名逐利，人造“光环”，“作秀”论文，“注水”技法，“膨化”疗效，“发酵”业绩等，他数次提及并给予鞭挞，毫不掩饰反感厌恶之情。他说：医学上尤其搞不得假大空滥。如果只是发一篇沽名钓誉的文章，后果最多是欺名盗世，迷惑视听。倘若付诸实践，或者在病人身上弄虚作假，无疑于害人夺命。不真不实，怎么能做一个医生？

其二，虚怀若谷。吉立新是公认的技术权威与业务大家。但是他从来不搞唯我独尊，不搞“一言堂”。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朴实哲理，坚持启发团体思维，依靠集体智慧，尊重大家意见，鼓励百家争鸣，广开言路，善于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多少年来，脊柱外科一直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班上的第一件事，就是会诊碰头会。在这个“群言堂”里，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争论不休”。最后，谁的见识与意见更符合实际，更接近真理，更符合逻辑，更高人一筹，就听谁的，照谁的办。

其三，开放开拓。吉立新坚信创新来自开放，视野开阔，思路开拓。他带领全科同志，积极奉行对外开放，广交“医友”，广结“医缘”，走出去，请进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无私地“输出”自己的优势成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在他身体力行下，脊柱外科与北医三院、长征医院等国内知名医院，以及美国、德国、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医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本科先后有10余名医护人员外出学习进修，同时请他们来学术交流。同时，他要求同志们绝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适应当今社会、广大患者的多方面要求，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尤其在骨质疏松症的诊疗、开展微创脊柱外科等方面，都取得了大的进展，成为新的品牌。

其四，提携后秀。吉立新历来认为，所有医疗技术成果，不论创造发明者是谁，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都必须用来为人类造福。掌握得人越多，其作用越大。因此，他坚决反对“技术封锁”与“寡头垄断”，最大限度地对大家口授身传。尤其对年轻优秀、潜质良好的同志，他不计辛苦、不厌其详，甚至手把手地指导帮助。在他的提携扶持下，脊柱科许多同事，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的在某些方面有独到创见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每个人的特长，又汇集成团队优势，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中国需要在世界上挺立起更多的脊梁，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真情桥梁、集体栋梁。

付华廷：缔造“龙江第一村”

史宗河

它被曾任农业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誉为“南有华西村，北有兴十四村”，被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誉为“黑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杆”，被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誉为“龙江第一村”，被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赞为“黑土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它是“全国文明村”，它被联合国北北合作委员会冠名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它就是黑龙江甘南县兴十四村，一个由临沂移民创建的村庄。

从一穷二白，到富甲一方，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了他一付华廷，兴十四村的带头人。1972年，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一步步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北大荒扎根开荒

兴十四村地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音河岸边。1956年，响应党中央开发北大荒号召，刚刚7岁的付华廷随父母从临沂移民“闯关东”的来到这里。眼前的世界一片荒凉，唯一的人的痕迹是一根木头橛子，上面拴着一面小红旗，写着“兴十四村”。据说村名的来历是：荒原上打一个木橛子就叫“兴一村”，再打一个木橛子就叫“兴二村”，“兴十四村”就是第十四个木橛子所在地。付华廷回忆说：“当时这种环境，我们从甘南走到兴十四村，在大雪里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我们只能住在草棚里，盖着破被子。这种艰苦的环境让90%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36个人。”

付华廷永远忘不了此后的时光，忘不了那段忍饥挨饿、挨冷受冻的生活。他说，“当时吃不上饭，很多人包括我的母亲得了浮肿病，根本不能走路，我母亲在床上瘫痪了4年。”“家里没有吃的，好不容易有了半碗豆浆，母亲还舍不得喝，要



喂给我喝。我当时不肯喝，让母亲喝，我们两个就一边哭一边让，豆浆里面也掺着我们的泪水。从那时候起，我就发誓一定要让母亲吃顿饭，一定要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

饥饿是那样坚韧而悠久。兴十四村一不靠山、二不靠海，也不靠城市和铁路，能依靠的就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兴十四村仍然是全县出名的“三靠村”。

1970年7月，付华廷入党，1972年，23岁的他就被选为村支书。当上村支书以后，付华廷向乡亲们发誓：“我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乡亲们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决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户受穷。”

麻袋背出拖拉机

上任后，付华廷发现人力耕种实在是效率太低，他想到了农业机械化，这样就能开垦更多的土地，村民就能种粮食，能吃饱肚子。由于村子里买不到拖拉机，付华廷组装成了村里的第一台拖拉机。

上任后，付华廷首先想到的是解决吃饭问题。而要吃饱肚子就要多种地，要多种地就得多种地。这里荒地多的是，但人拉弯钩犁却效率太低。付华廷看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开荒种地的拖拉机，便产生了大胆的想法，也想弄一台。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当时拖拉机是国家控制商品，买不着，再说也买不起。他由此而来的第二个想法更大胆：自己装一台。付华廷就自己买了一本《拖拉机目录》，询问了两位懂拖拉机的师傅是否可以组装，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付华廷东挪西借地凑了几千元钱，背着一袋煎饼就上了路。四处奔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1100多个零部件一个一个用麻袋背了回来。然后村里几个能工巧匠一顿东拼西凑，拖拉机竟然组装成功。当时私自组装拖拉机属于非法，是要被处分的，县里有关部门要没收还要罚款。付华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不但不罚款了，反而被树为“一不等、二不靠、三不要、自己动手搞配套”的先进典型。当年兴十四村开垦了400多亩土地，取得了大丰收。

付华廷借着东风，一鼓作气，在废铁堆里买回废弃的农机具，连修带装，又改造出了14种农机具，并在省农机部门支持下，先后购置了8台拖拉机，基本上实现了田间机械化。兴十四村迅速在省里出了名，村民们吃饱肚子的理想很快就实现了。

治水整田多栽树

但付华廷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兴十四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因此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一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是生态环境保护。从1975年开始，付华廷带领乡亲们大兴水利，并逐渐完善。到现在，全村1.68万亩耕地拥有了583眼电机井，田间全部通了电；配套灌溉设备240台（套），节水灌溉覆盖面积达100%，全部实现了喷灌化。还修筑起30华里的环村拦河坝，能经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在省里召开的现场会上，兴十四村被称赞为“大西安岭脚下的灌溉王国”。

从1972年开始，兴十四村就坚持年年植树造林，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偷死树被抓住，付华廷要罚他1000元。那人说：“你咋那么狠呢，树是你爹啊？”付华廷毫不犹豫：“树就是我爹，是我亲爹”。至今为止，兴十四村累计造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2%，不仅调节了兴十四村的小气候，还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1995年据专门机构评估，1万亩人工林价值3亿多元。兴十四村也因此被联合国北北合作委员会列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在联合国北北合作委员会的提名下，付华廷被《世

界政治论坛》委员会授予“推进人类社会发进步奖”。

1979到1981年，付华廷带领兴十四村村民推倒了土房、草房，盖起了一排排大瓦房和当时在全国农村都很少见的平顶二楼。1982年，付华廷又从北京拉回来几卡车彩电，兴十四村成了“全国第一个彩电村”。村民们的目光从缥缈的星空转移到了外面的真实的世界。

工业引领发展路

贫困的兴十四村富甲一方，名声在外，乡亲们都很高兴。但付华廷并不满足：土地是有限资源，再拼命干也不能真正富裕起来。再说了，实现机械化后，种地用人少了，多数村民一年中有半年多闲着。怎么办？南方很多地方靠办乡镇企业致富，付华廷也看好了这条路，他先后在村里办起了小酒厂、小油坊、罐头厂等小企业，效益都还不错。付华廷还是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意识到，兴十四村周边地区有草原，养奶牛的挺多，可以建一座乳品厂。他把这想法向来检查工作的省领导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于是付华廷又带着一袋煎饼直奔上海，购买设备。在火车坐席底下枕着煎饼睡了两宿觉，到大上海又找了一家澡堂的地下室住下来，他也不觉得苦。1985年5月，黑龙江省甘南县十四乳品厂终于投产，第一批产品就达标了，当年就赢利65万元。付华廷又创造了一个记录：全国第一家村办乳品厂。

乳品厂使付华廷尝到了甜头，也扩大了他的胃口。他要依托资源办工业，而且要引进高科技、大项目。1988年，经国家化工部、轻工部推荐，兴十四村开始筹建甜蜜素厂。一个偏僻的乡村涉足高科技的精细化工企业，谈何容易！付华廷这次真是要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从县、市、省到北京，单是审批公章就盖了149个。好不容易把厂子办起来了，生产的600吨甜蜜素，却一斤也卖不出去。付华廷急得火苗直蹿脑门子，就真奔北京找当时的轻工业部部长于珍，在于部长的支持下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全国100多家新闻媒体包括《人民日报》都发布了该消息，甜蜜素很快就签订了1万多吨的合同。那一年，兴十四村仅这一项就挣了上千万元。

甜蜜素是以玉米为原料的，齐齐哈尔是玉米产区，原料极其丰富。付华廷于是想再建一座以玉米为原料的更大的工厂。他到轻工部咨询，获得一个信息：上海有一位老教授已经成功地培育出用玉米为原料生产柠檬酸的菌种。付华廷如获至宝，连夜乘火车去上海。找到老教授，说明了来意，老教授并不信任他，以交通不便和生产条件不足为由拒绝合作。付华廷急了，扑通跪在地上给老教授磕了个响头。这一磕头，感动了老教授和老伴，就这样，付华廷把老教授请到了兴十四。仅用5个半月就建成了柠檬酸厂并投产。第一批产品就达到了英国药典标准，并被美国天然食品协会确定为天然食品，进入美国市场。

从1985年建起全国第一家村办乳品厂到1994年建起全国第一家村办柠檬酸厂，付华廷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使兴十四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形成了以柠檬酸厂的生物工程产品和以甜蜜素厂的精细化工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系列，已经组建了富华集团的兴十四村已完全走上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时，付华廷仍没有止步，他又把目标瞄准了资本运营，公司上市。于是，付华廷五下珠海，三顾茅庐，请来了原珠海一家外企的常务副总经理于艳杰。当时于艳杰在珠海年薪30万元，生活与工作条件优越，但最终还是被付华廷的诚心和理想所感动。

于艳杰来到兴十四，着手组建华冠科技公司。2002年9月16日，华冠科技在上海成功上市，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家农业板块上市的公司。当年发行4000万股，社会募集资金1.38亿元。成功地引进了浙江鲁冠球旗下的万向集团这一战略合作伙伴，为富华集团成功引资6000万元，该公司成为股份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之后，又引进了哈尔滨曼哈顿多元集团等



第一代移民深情
回忆拓荒经历

战略投资者。上市后，富华集团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先后收购了黑龙江省种子公司、齐齐哈尔林机厂、甘南县塑编厂、黑龙江世纪丽园建筑装饰公司、黑龙江康吉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了建筑公司、绿化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路桥公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2005年建设了中国富华国际生态产业园，陆续与温州海螺集团、北京挑战集团、郑州泽润粮贸集团等国内大企业集团合作，建设投产了植酸酶项目、水稻精细加工项目、富华生物药业和杂粮生产等一大批项目。目前，富华集团拥有35家企事业、18亿多元总资产，是集农、林、牧、生物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形成了“生态农业、链条产业、集团推进、规模经营、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2012年，兴十四村和富华集团总资产达到18.1亿元。

沂蒙精神是动力

付华廷当了40多年村支部书记，他的梦想、他入党时的誓言如今真实地体现在村民的幸福生活和对国家的贡献中。“我这个人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会玩麻将、打扑克、下象棋，也不会什么娱乐活动，这么多年，我就是在给乡亲们办实事中品尝着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办成实事后看到乡亲们满意的笑脸时享受着无比的幸福。”

当然，付华廷也赢得了一系列荣誉：多次被中央、省、市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乡镇企业家等荣誉称号，黑龙江省“十大经济改革风云人物”，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业绩，用付华廷的话就是沂蒙精神、闯关东精神一直支撑着他。“说了算定了干，困难再大不能变。”

“我们山东人，就是不服输，别人能干好，我们也能干好。”付华廷说，“我们不能让别人看不起，说我们山东人是孬种，我们山东人的倔劲是代代相传的。我们虽然离开山东几十年了，但是我们不能忘本，正因为我们有山东人的本色，我们才能做到这么出色。”

付华廷说，这么多年来，他深知从自己父辈就带来的沂蒙精神以及先辈的闯关东精神的可贵。“如果没有沂蒙精神和闯关东精神，我觉得我们兴十四村不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生活虽然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忘本，不能舍弃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的精神，还要祖祖辈辈地传下去，我们的根在山东，我们不能忘本。”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到临沂市调研。4月9日，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副主任翟世林等一行6人到临沂市调研史志工作。临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市政府党组成员朱玉良等有关领导参加了有关活动。

在临沂期间，刘爱军实地考察了临沂市方志馆、沂蒙革命纪念馆，并召开了史志工作座谈会。

刘爱军对临沂市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临沂市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切实做到了“一纳入、八到位”，为史志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临沂市史志办积极作为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走在了全省前列。刘爱军希望临沂继续深入学习贯彻郭树清生长等领导重要批示精神，抓住机遇，趁势而上，争取更大的作为。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海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要求全市广大史志工作者要以省史志办调研为契机，不断开创临沂史志工作新局面，为推进临沂“四个全面”进程凝聚力量。

临沂市史志办认真学习贯彻省、市纪委会全会精神。2月13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学习贯彻市纪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朱海涛主任在讲话中要求，全办干部务必要进行系统学习，深入思考，准确把握当前新形势新要求，坚决拥护和执行上级党委、纪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要按照省、市纪委会全会精神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要求，立足岗位、立足本职，把学习全会精神与推动地方史志工作相结合，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相结合，与履行岗位职责相结合，明晰思路、创新举措，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工作。

市史志办“智慧临沂”安卓版手机客户端正式发布运行。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又一有效拓展史志成果服务大众范畴的新平台——“智慧临沂”安卓版手机客户端于近日正式发布运行。这是全国史志系统推出的首款多角度、全方位融合城市发展概况与民生服务信息的手机客户端。“智慧临沂”可为受众提供新闻、地情、志鉴、政务、便民等资讯。

市史志办召开纪检巡视工作动员会。3月9日下午，市史志办召开纪检巡视工作动员会。会议由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主持，市纪委巡视一组组长高秀英，副组长宋永峰、赵修玉等参加会议。

高秀英首先宣读了相关文件，说明了巡查工作的目的意义、巡查的主要任务、巡查的方法步骤，并要求市史志办全体人员积极配合巡查工作，客观反映情况，为巡查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朱海涛代表史志办党组作了述责述廉报告，并代表单位表态，一定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好巡查工作。

市史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3月19日，市史志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党组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市纪委巡视一组副组长宋永峰列席会议。

会议包括四项议题，一是宣读并讨论《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二是听取年鉴科工作汇报，研究2015年的年鉴工作。三是听取方志馆工作汇报并研究下步工作。四是讨论《临沂市志》第一卷评审会准备情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网页发布。近日，由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网页正

式对外发布。该专题由临沂门户网站——临沂在线具体承办。

“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网页以“铭记沂蒙抗战历史，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通过“民间抗战文物展览馆”“抗日故事”“老照片”“抗日纪念地”“沂蒙故事”“英雄谱”“沂蒙抗日大事记”“抗日征文选登”等栏目的设置，将市史志办历年来所搜集、掌握的与抗日战争，特别是沂蒙地区抗日战争历史有关的各类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面向社会大众展示。

《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志稿评审会召开。4月10日，《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志稿评审会召开。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临沂市政府党组成员朱玉良等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专家对《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志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议，一致认为志稿布局有序、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文风朴实、特点突出、编排规范，是一部十分成熟的志稿。在篇目、体例、资料、行文等方面指出了不足，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临沂市史志系统获得全省史志系统多项荣誉。4月14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的通报》，临沂市史志系统荣获多项全省优秀史志成果。《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大店镇志》获“优秀基层（专门）志”荣誉称号；“沂蒙史志”微信获“优秀信息化建设成果”荣誉称号；《临沭县志（1986—2007）》获“优秀市县级志书”荣誉称号；沂水县方志馆获“优秀方志馆”荣誉称号；《费县志》（康熙版）获“优秀旧志整理成果”荣誉称号。